



當代中國研究

通訊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No. 37



當代中國研究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通訊

No. 37 | 2024 年 12 月 31 日發行

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

- 星星還在那裡——研究中國面臨「典範轉型」嗎？
- 中國研究技藝的挑戰與創新
- 牆再高、浪更遠——從世界體系看中國研究的發展趨勢
- 中共的變與不變——中國政治研究，需要典範轉移嗎？

特邀

為什麼中國也有「進步勞動法規」？——從個人學術困思歷程到「威權司法權衡理論」

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專題

- 夾縫求生——中國女權運動的變遷與發展
- 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中國女權運動的自我賦權
- 勞工、生態與社群建立
- 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運動策略、價值與倫理
- 喂中國，我們想做公民倡議！——以媒體和藝術作為運動方法
- 在風險的時代撐起勇敢的空間——我們如何研究與記錄逐漸被噤聲的中國社會

師生田野紀要

- 上海遊戲展的田野觀察——獨立遊戲開發者的生存可能
- 把國家遮起來？——中國脫口秀的逃避與抵抗
- 身處以男性為主的商業世界——中國女性台商會長的獨特魅力
- 為什麼要讓我們知道這麼多？——來自中國外送平台的真實數據

工作坊演講紀要

- 農民工女性的二次流動——在台中國婚姻移民的跨國數位創業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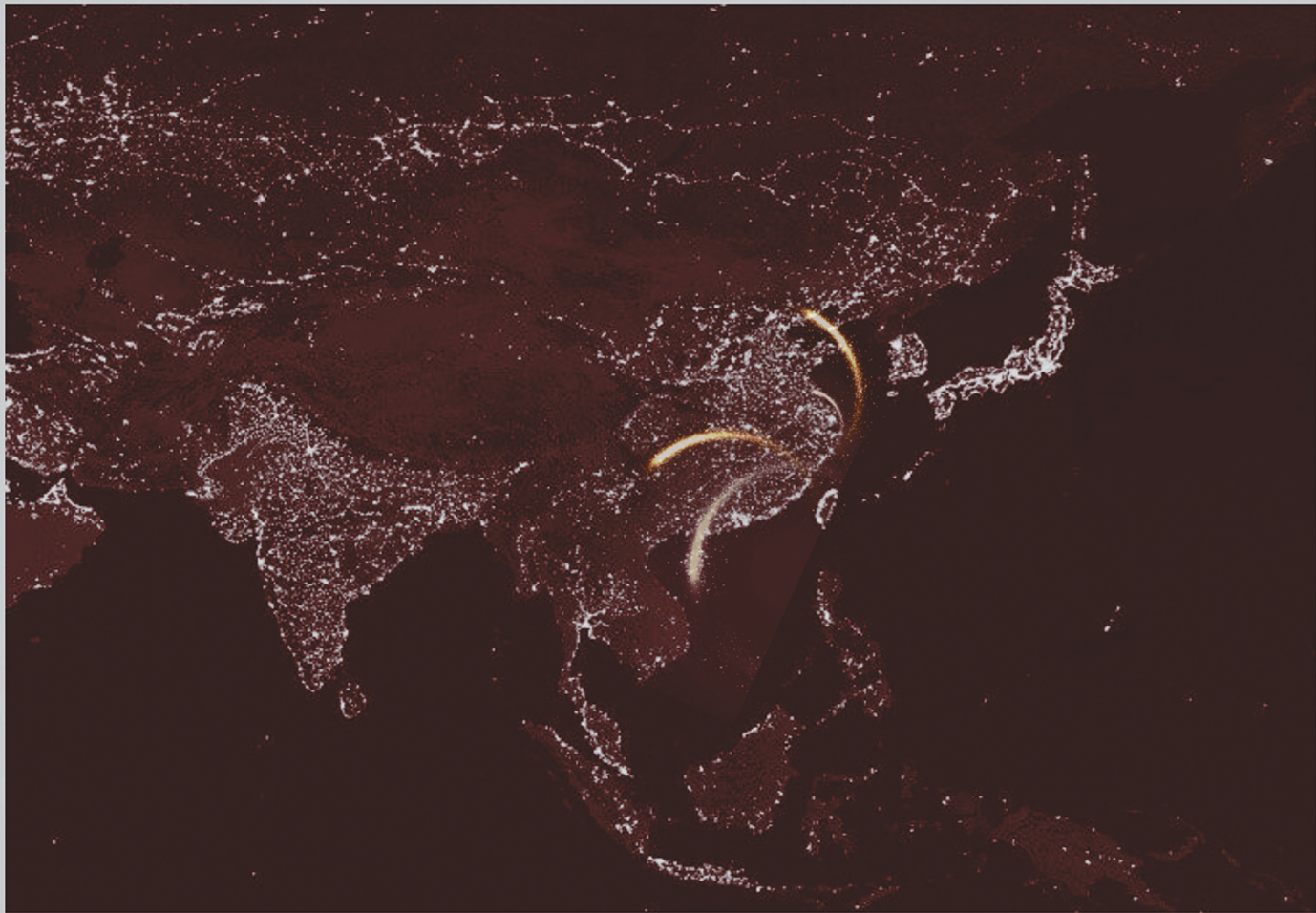
新竹郵局許可證
新竹字第0711號

雜 誌



明理見序
究真

發行 |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中央研究院合辦中國研究碩士學程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乙組 中國研究碩士學程 招生中

報 考 資 訊

報考時間：甄試入學每年 10 月報考
考試入學每年 12 月報考

詳細報考規定請參閱清大招生策略中心公告之報名簡章

學 程 簡 介

清華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由清華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辦
畢業領取雙證書（中研院中國研究學程、清華社會學碩士學位）
學程師資陣容堅強，研究資源豐富，提供赴中國田野或實習補助
並有多種工讀機會。期待對全球中國議題感興趣的你加入！

師 資 介 紹

- | | |
|-----|-------------------------|
| 古明君 | 文化社會學、當代中國文化治理 |
| 陳志柔 | 當代中國集體抗爭、社會主義國家轉型 |
| 沈秀華 | 性別研究、中國婚姻與家庭、移民研究、台商研究 |
| 陳明祺 | 組織社會學、台商社會學、中國事務實作、量化方法 |
| 林宗弘 | 社會階層化、災難社會學、比較政治經濟學 |
| 陶逸駿 | 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制度與組織 |
| 吳介民 | 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民主化 |
| 鄭志鵬 | 發展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技職教育、台商研究 |

報名簡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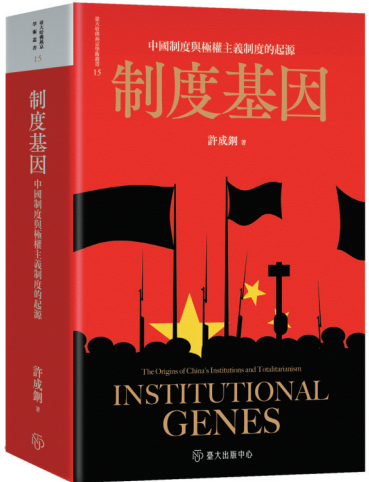
當代中國
研究中心



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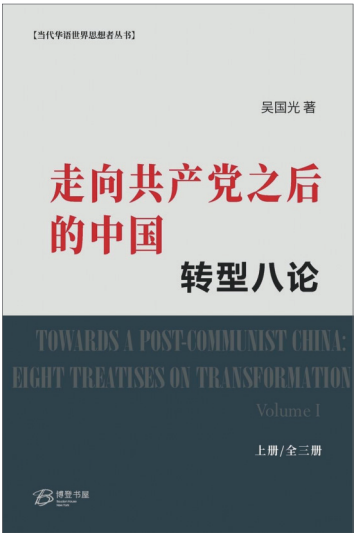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作者 | 許成鋼
出版 |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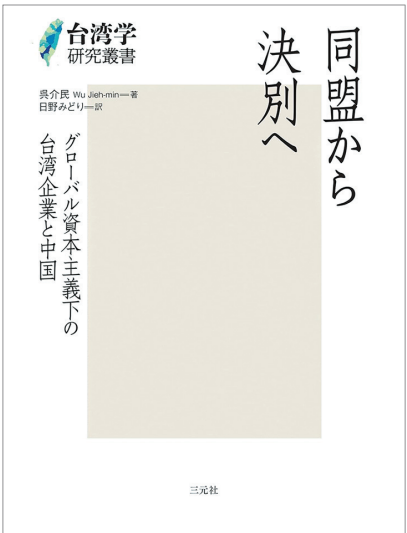
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

作者 | 吳國光
出版 | 博登書屋（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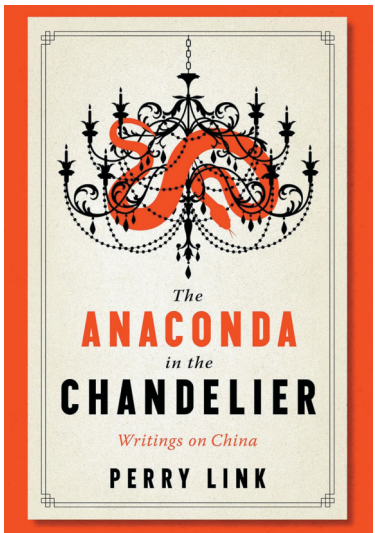
同盟から決別へ——グローバル資本主義下の台湾企業と中国

作者 | 吳介民
出版 | 三元社（2024）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Writings on China

作者 | Perry Link
出版 | Paul Dry Books (2025)



「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

- 2 專題引言／陶逸駿
- 4 星星還在那裡——研究中國面臨「典範轉型」嗎？／林培瑞
- 8 中國研究技藝的挑戰與創新／陳至潔
- 13 牆再高、浪更遠——從世界體系看中國研究的發展趨勢／黃兆年
- 18 中共的變與不變——中國政治研究，需要典範轉移嗎？／林和立

特邀

- 22 為什麼中國也有「進步勞動法規」？
——從個人學術困思歷程到「威權司法權衡理論」／王許裕民

「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專題

- 32 抗爭、創傷與韌性——會議籌劃緣起、記錄與反思／沈秀華
- 36 夾縫求生——中國女權運動的變遷與發展／陳香婷
- 41 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中國女權運動的自我賦權／小蝸
- 46 勞工、生態與社群建立／羅琪玟
- 51 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運動策略、價值與倫理／羅琪玟
- 57 喂中國，我們想做公民倡議！——以媒體和藝術作為運動方法／小蝸
- 61 在風險的時代撐起勇敢的空間
——我們如何研究與記錄逐漸被噤聲的中國社會／陳廷豪
- 64 《烏魯木齊中路》電影放映與現場討論側記／碩三同學

師生田野紀要

- 72 上海遊戲展的田野觀察——獨立遊戲開發者的生存可能／潘雅鈺
- 79 把國家遮起來？——中國脫口秀的逃避與抵抗／羅琪玟
- 88 身處以男性為主的商業世界——中國女性台商會長的獨特魅力／陳彙淳
- 94 為什麼要讓我們知道這麼多？
——來自中國外送平台的真實數據／羅琪玟、小蝸

工作坊演講紀要

- 103 農民工女性的二次流動——在台中國婚姻移民的跨國數位創業／小蝸

專題引言

撰稿 | 陶逸駿*

近年來，中國內部形勢以及世界地緣政治都產生劇烈變化。全球的中國研究正面臨重大轉型。研究社群經常談論的議題包括：資料獲取難度增加，海外學者赴中國訪問或田野研究的阻礙更多、不確定性更高，官方彙總資料編造程度也更嚴重，不易進行嚴謹的量化社會調查等。事實上，以中國現況混沌複雜，已難以期待透過直接的田野訪調或數據蒐集，就獲取充分可靠的資料。這是包括中國本土學者在內，台灣乃至全球的中國研究學者，此刻面對的現況。

挑戰不僅如此。中國與全球許多國家關係不若以往，但影響依然無遠弗屆。不易在中國內部進行研究，卻處處有中國影跡。「以何種理念、架構、方法解讀當前的中國」，亟需反省與重構。即使持續赴中國田野研究，且獲得大把資料，對中國現況「該回答什麼問題，能提供什麼新知識」，都充滿種種疑問。

過去長期累積的中國研究成果，仍富含養分。冷戰年代禁忌森嚴的艱困處境下，一些研究迄今深有啟發。數十年來通過各種方法獲得的研究資料，往往也構成中國研究社群對話的共同基礎。於此同時，網路世界和數位工具高速發展，正急促改變社會科學調查方法與理論。中國研究領域不免也深陷在此波數位革命當中。理論、現實與方法之間的張力，似乎昭示著領域內浩大的「典範轉型」迎面而來。展望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歷史時段，中國內部以及全球秩序變動的可能前景，我們如何應對這個巨變的挑戰？

有鑑於此，《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 37 期，以新冷戰下全球的中國研究轉型為主題，嘗試對當前中國研究的理念背景、問題意識、概念類型、研究架構、方法議程、潛在對話，匯聚反省及構思。面對變化，我們從陳至潔的經驗談，能夠借鑑研究方法的瓶頸與因應之道，或者依循黃兆年的梳理，發掘新穎開闊的現象和議題。但也如林培瑞所提醒：許多事情還是那樣。需要謹持共通的理念基礎，在人性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副主編

與體制的延續性中，掌握當前變局的理路。林和立相信，這種理路存在於更為深遠的歷史脈絡，而研究者需要警覺被「魑魅魍魎話術」所遮蔽。儘管中國內外劇變，但往往是議題場域延展，未必扭轉「研究典範」。研究者不妨隨時自問，研究標的有何變與不變？不變的是什麼？變動是否已經催促著某些既有基礎的根本更替？

星星還在那裡 研究中國面臨「典範轉型」嗎？

撰稿 | 林培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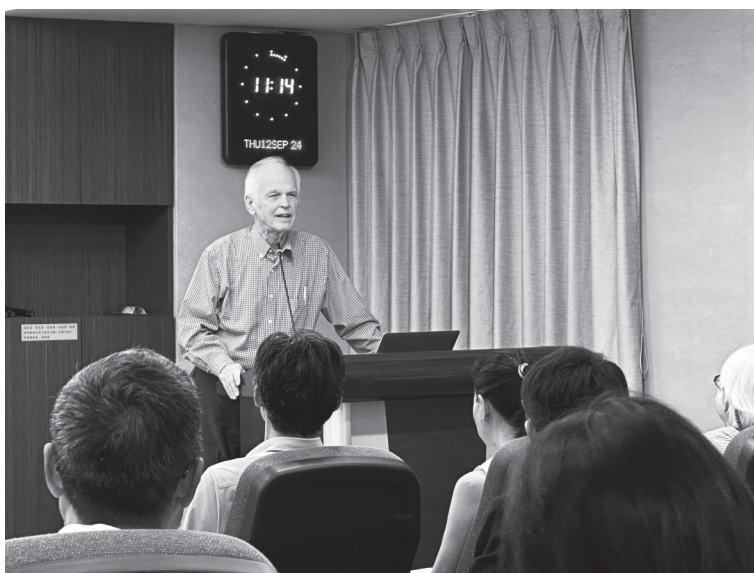
編按：中國研究在「新冷戰」下，從問題意識、概念、方法等方面都遭遇挑戰。冷戰年代，大部分國際學者無法進入中國收集資料或從事田野調查，但仍然克服種種困難，發展出精采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今天，情勢有根本變化嗎？數位工具和網路資源，如何協助新一代學者建構新的理論和方法？我們正在迎來中國研究的典範轉型嗎？台灣的中國研究社群有哪些優勢和弱點？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通訊》與《上報》合作策劃此「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第一篇特別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撰稿，他挑戰了典範轉型正在發生的說法。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都不是容易研究的領域。毛澤東死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提供了學者一些喘息時間，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政策又緊縮了許多。幸虧網路時代同時也到來了，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方便和效率。這兩個新情況（習的「返毛」與網路時代的到來）對當代中國研究都有比較大的影響，但我不認為是「典範轉型」（paradigm shift）那麼全面的改變，因為學者面臨的基本挑戰還是一樣的。

習近平的「返毛」現象

具體的問題在不同的學科裡當然不同。我研究文學，習近平返毛擋不住我讀文學作品，也不妨礙我看到評論文章。我不能到中國去訪問作家、逛書店和「體驗生活」，這些當然都是代價，但不是要命的代價。中國作家和編輯還是能出來，我在加州跟他們見面。網路同時提供了許多新的便利，例如找資料更容易。想知道魯迅在哪些文章裡頭提到過「國民性」，現在的詞語搜尋比以前的查尋索引效率高多

* 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授課，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



林培瑞教授來台參加 9 月 12 日自由的光與影活動。

了！

在其他的一些研究領域裡，不能去中國的代價更大。習慣做田野考察的人類學家現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依靠地方檔案和口述史的社會史學家也無法進行往年能做的研究。研究高層政治的學者，讀文件還是可以的，但過去常常依靠與高官做訪談來理解文件的意義。現在，這條路基本上堵住了。

但我覺得方法行不通，不是讓我們改變目標的理由。比如研究農村歷史，我們現在不能看地方志，不能做口頭訪問，但還是可以讀回憶錄或報導文學。資料也許不理想，可是不至於沒有資料。

我們也別以為原先的方法都是完善的。美國政治學家訪問中共高級官員，很容易高估訪問內容的價值，誤以為級別越高真實性越強，但實際並不然。劉曉波有一篇很妙的文章，標題為「老外看不懂中國官僚」。（不懂的原因是有許多層面的）做學者的任務是一定得發揮自己的獨立分析和判斷，做取舍工作，不管訊息的來源是什麼。

搞清楚中國官方語言和數據

西方學者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語言障礙。大部分西方學者訪問高官是通過翻譯進行的，這樣當然很難理解官方語言的氣氛，很難進入語言遊戲後面的內容，很難深入地問問題，細緻地掌握事實。對這種學者來說，我們完全可以問：進不去中國的障礙大？還中文弱的障礙大？一位外國學者在北京經由翻譯做訪問，另一位外國學者在紐約熟練地讀中文材料，哪一位學者更貼近中國？我的意思不是說做高級別訪問弊大於利。能做當然要做。我的意思是，在考慮「障礙」的時候，或怕有

「典範轉型」的時候，別忘記學術方法有許多種，客觀的研究條件變了，不等於使命的目標變了。

對台灣的學者來說，語言障礙當然比西方學者少多了。然而，哪怕訪問者和受訪者的母語是一樣的，官方的語言遊戲還是有待理解的。能理解是一門專業的技能，習近平以前、以後都得使用，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正如語言沒有絕對「靠得住」和「靠不住」的區別，官方的統計數字也是如此。改革開放時期比毛時代更靠得住，返毛時期比改革時期又往「靠不住」的方向走。這都對。但不管哪個時期，官方數字從來沒有百分之百正確過。同時，除了大躍進那幾年以外，官方數字也從來沒有百分之百胡扯過。學者用任何中共的數字，都得使用自己的獨立判斷，在自己的腦子裡過濾一下：發布這個數字的人有沒有理由把數字加大或者壓低？我的意思不是說，中共的數字都是靠不住的。我自己也經常用。我的意思有兩點：1）每次用都得「過濾」；2）「都得過濾」這個現象不是新的，不是返毛時期的特點，而是一直存在的。

我今年八十歲，開始研究中共社會是 57 年以前的事。我不敢說研究得多麼深入，但從跨時間的角度來看，我經歷過的時間比一般人長一些。有三點「勸告」，我願意斗膽獻給比我年輕的學者。

人性是永恆因素

別忘了，研究方法變了不等於研究的終點變了。一位研究天文學的人，平時用望遠鏡來觀測天空，哪天要是多雲、看不到星星，不會說，「哎呀！星星可能完全不一樣了！」不管是天文學家還是研究中國的人，都應該記得和珍惜以前的研究，應該用以前的研究來做今天研究的基礎。環境有了變化嗎？做研究更難嗎？好，認真面對新情況，盡量找別的方法，包括新的方法，來彌補目前的缺陷。但不要心裡慌，別怕星星變質了。

「星星不變質」是什麼意思？任何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會有變化，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不多的。最永恆的因素是人性。我們能夠研究朝鮮的社會嗎？朝鮮的媒體又虛假又誇張，靠得住的統計數字少之又少，學者也沒辦法實地考察。但朝鮮人還是人，日常生活還是日常生活。我們可以假設朝鮮人天天關心的問題仍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問題。返毛時期的中國亦然。

不要因為研究條件有變化而調整研究的問題。比如，我們目前無法研究朝鮮的農村，但不要因此認為「朝鮮研究」這個學科應該追求的問題僅限於金日成到金正恩的家史，或者金氏王朝的政權有多少原子彈，為什麼派兵到烏克蘭等等。朝鮮的

農村還是有人，那些人還是有日常生活。在毛時代，西方的「中國通」大大地犯了這個毛病，他們誤解中國的餘波也一直延續到今日。當年，中共說自己是社會主義社會，發表數字說明，加上文字分析，西洋學界接受中共的分析角度來理解中國，後來就很難從別的角度去理解。現在習近平又把允許研究的範圍縮小，只讓學者研究某些部分，並且給那些部分套上「習近平思想」的外衣。西方學者當然知道是外衣，但日子久了，潛移默化，會不會也接受官方的語言和概念，失去獨立提問題的能力？這個危險不能忽略。

總的來說，即使做研究的客觀環境有了變化，也不應該影響我們做學者的基本態度。習近平時代做研究的條件，與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不同，但不是絕然不同，沒有典範轉型的問題。我們也應該盡量與中國國內學界的同事保持聯繫，他們面對的問題性質，跟我們的在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他們的處境更危險。

疾風知勁草。做研究的條件更困難的時候，我認為不要修改我們基本的框架。可以調整方法，但不要改動基本的研究典範。大家也不要鬆懈，相反地，應該更加努力地獨立提出問題，更努力地去追求答案。



習近平政權的「返毛」現象。

中國研究技藝的挑戰與創新

撰稿 | 陳至潔*

編按：中國研究環境的變化，以及新型數據研究技術的進展，幾乎同時成為研究社群難以忽視的議題。然而，新型數據研究技術對於研究者，究竟是突破限制的利器，抑或使研究技藝更形黯淡，遠遠未有定論。可以想見的是：兩者之間的張力，已帶來源源不絕的壓力和動力，促使偏好不同方法的研究者精煉技藝以因應變化。「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第二篇由陳至潔教授執筆，他回顧了自身十多年來在中國研究領域的求索、困境與轉折。儘管挑戰撲面而來，但活用豐富多樣的技術方法，切入長期關注的現象脈絡，進而反省視野局限，也能夠形成因應變化的策略及議程。這些經驗扎實而具體，實用且具建設性。中國畢竟沒有靜止，現象依然錯綜紛呈，因應策略之下，挑戰背後充滿機遇。

中國政治自 2010 年代開始進入加強社會管控的時期，21 世紀頭十年相對開放的社會政策受到抑制。習近平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極為重視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固，中國政府從各方面進一步強化對社會與意識形態的控制。這個趨勢自習的第二個任期（2018 年至今）得到了加速與深化，而涉及中國的國際局勢與突發事件（美中戰略競爭、香港反送中事件與 COVID-19 疫情）更給習近平政府絕佳的理由將中國社會加以「安全化」。在習的統治下，中國政治蛻變為新極權體制（Neo-Totalitarianism），黨國全面強化意識形態與思想的控制，民眾的言論、集會、結社權利受到高度打壓，且生活在日益綿密的電子與網路監管系統之下。中共的安全化政策也深刻影響了體制內學術研究機構與學者；在國家安全法規與「反間諜法」的陰影下，國際學術交流的障礙升高，境外學者難以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或訪談工作。這些在以往被視為正常、被寬容的學術活動，在今天不僅舉步維艱，甚至會成為觸法遭捕的理由，明顯增加了研究當代中國的成本與風險。同時，中國的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國安法規導致中國學術資料庫限制國外訪問權，對中國研究學者造成進一步的困擾。與 2013 年之前相比，今日的中國更為不透明，國外學術界與政策界難以研判中國的局勢。

安全化迫使學者換題目找新方法

中國內部的安全化與中西關係的緊張化，迫使國際中國研究社群的學者開發新主題、挖掘新資料與應用新方法來應對挑戰。面對進入中國進行研究的困難與風險，學者開始關注那些「不需要進入中國也能進行研究」的議題，例如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研究、中國海外影響力的研究，或是中國對外投資的研究；這些新的研究議題拓展了當代中國研究的視野。學者也努力發掘那些「無需進入中國也能取得」的資料，例如蒐集國際組織關於中國的統計資料、中國政府與官方媒體的網路內容，或是中國社群媒體發文及相關資料。新資料的出現促使中國研究的學者從別的學科領域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與技術，而新資料與新方法的結合就可能產生新的研究途徑，為老議題注入新視角與新發現，甚至可能改寫原有的主流看法與理論。這就猶如高倍數位望遠鏡帶給天文學界，以及電子顯微鏡給生物醫學界帶來的影響。

此外，中國政治環境的惡化意外地推動中國研究的轉變。在過去十年，我目睹了中國政治的「安全化」，也親身親歷了中國研究的轉型。博士班畢業時（2008 年），我的研究興趣是中國人權法治發展與人權外交。我以質化的政策文件判讀與訪談方法進行研究，這需要認識中國的人權工作者與學者，並進入他們的專業社群網絡。在長年多次接觸後，他們接納我並與我建立了信任關係。我計劃在深度訪談的基礎上完成一本關於中國人權與國際交流的專書。在此同時，我因緣際會參與了數位人文研究項目，並初次接觸資訊科學的程式語言。當時我認為這有應用在政治學研究的可能，但並無動力與誘因去深入學習資料方法。

習近平執政初期，我仍然樂觀地認為中國會持續向外界開放，吸收各種思潮，並且相信中國的人權狀況會因為持續對外開放而不斷獲得改善。這也是我的研究工作的現實價值：我相信我的學術工作能促進與見證中國的自由化。但是習近平政府日益收緊言論空間，加強對網路內容的管制，甚至在 2015 年 7 月對活躍於司法界與網路的人權律師進行全國大追捕。在此之後，我對中國人權的前景開始轉趨悲觀，因為改變的種子已被扼殺於萌芽階段。對我的研究工作而言，2015 年的 709 大抓捕是致命的：我參與的人權工作者網絡被摧毀，人權律師被羈押判刑，他們的律所被關閉或整頓，他們的家人生活在恐懼與壓迫中，而國際人權機構在中國的活動空間被嚴重限縮。我意識到必須中止訪談工作，這意味著失去第一手資料的來

源，因為倘若我仍欲接觸被捕律師的家屬或學者，不只我可能會有危險，也會危及與我接觸的家屬和學者。我的專書寫作被束之高閣，計畫以失敗告終。在那段頗為受挫與焦慮的過程裡，我決定改變研究途徑。中國人權政治仍然是我研究的主題，但必須另闢資料來源並運用有別於傳統訪談的研究方式。

政策文件傳統解讀法面臨挑戰

中國研究很重要的一個成分，是藉由檢視黨國政策文件內容與政府發言紀錄，以理解其政策形成的原因與目標，進而評估政策實施的成效與後果，或者是藉由詮釋黨國領導人的著作與演說內容，去說明中國政府施政的整體構想與戰略規劃，因為專制政府與領導人主導了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在培育中國研究學者的訓練過程中，學生必須藉由閱讀大量中共與中國政府的文件報告，以建立對中國政治論述模式的理解程度，也就是要學習在隱晦不明的中共政府敘事中掌握重要的「微言大義」。我長期關注中共的人權論述與人權政策文件，彼時尚能藉由訪談中國專家學者，得知這些人權文件所要表達的官方認知與立場，但是 2015 年之後這條研究途徑已被封閉，這迫使我必須尋找其他的分析方法，去說明中國政府的人權政策及其實施效應。

我當時已深切感受傳統質化的政策研究必須加以改善。不同的學者在分析相同的政策文件時，常會根據個人的背景與經驗做出有明顯差異的判斷，而且幾乎無法得知誰的判斷更符合中國政府的真實立場（除非有管道能夠訪談中國高級官員或甚至國家領導人，但即便如此也無法保證受訪者會說出心裡真實的想法），加上這樣的研究成果無法被重現（replicable），因此難以學習與傳承。此外，不同的學者會選擇不同的政策文件或官方發言以佐證自己的觀點，但這些文件是否真的代表中國政府立場（或者說代表程度有多高）卻始終無法斷定。更何況受限於研究技術，質化研究的學者只能分析少量的政策文件與政府發言，這又更加突顯了所分析之文件的代表性問題。以研究方法的術語來說，中國研究中的政策分析領域存在明顯的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問題。總言之，在中國內政安全化開始影響中國研究之前，中國研究社群（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質性研究者）已經到了必須處理研究缺陷的時刻。我就是在這個時刻開始發掘新的資料並嘗試新的方法。

如前所言，我在關注中國政治的同時，也參與了數位人文的業務，這使我得知，專長為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領域的資訊科學研究者，能夠以程式語言作為工具，去獲得巨量的網路與檔案資料，並分析其內容與資料結構。我試著與 NLP 學者合作，發現他們能在極短時間內便取得數

萬筆的中國官方媒體人權報導與評論，只要是公布在網路上的都能夠獲取。我領悟到 NLP 技術能夠緩解長期困擾政策分析的效度問題：NLP 尤其能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因為當我們能夠蒐集並分析大量且較少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政策相關文本，就能有效緩解前面所提到的代表性問題。當我們有能力對文本的整體進行全面的分析，採樣偏差的疑慮就能得到控制。NLP 技術還能根據我的研究需求，對全部的文檔進行資料整理，並計算重要詞彙的出現頻率，找出與這些關鍵詞共同出現的其他詞彙的頻率與樣態，然後製成圖表。資料學者還介紹其他的分析工具，例如詞彙關聯度分析、詞彙相似度分析、文章相似度分析與主題模型等。

用主題模型處理大規模文本

運用主題模型（topic modeling）技術，研究者能夠有效降低主觀判斷的偏差，讓文本分析更具客觀性與可重複性。主題模型能夠自動從大量文本中識別出主要議題與隱含的話題結構，避免了人為標記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偏見。這種技術特別適用於政策分析，因為它可以從龐大的政策文件、社會媒體言論、報導文章等非結構化數據中，提取出具有政策意涵的主題和趨勢。主題模型的另一優勢是其探索性功能，能夠揭示原本未知的資訊或隱藏議題，這對政策分析學者尤為有用。學者透過主題模型，可以發現政策討論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關注點、探測潛在的政策衝突，以及觀察隨時間變化的政策趨勢。此外，主題模型還能有效處理大規模文本，大幅降低人力與時間成本。在數年的跨領域合作中，我開始有動力自學程式語言，這使我掌握多元的研究工具，能夠根據研究議題而選擇適合的技術，並且自己設計研究分析步驟。運行 NLP 程式碼所得出的分析結果，都是可重複的，且與之前的結果完全相同，也就是說，NLP 技術能保證研究的穩定性與一致性，這有效解決了政策分析普遍受人質疑的信度問題。

由於 NLP 方法產生了「結構化」的文本資料，我開始將 NLP 技術與社會科學統計相結合，將文本資料與其他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試圖勾勒出中國人權政策與政策效應的關聯程度。我從中體會到研究者倘若熟悉了一套新方法，就能提升學習其他方法的動機，並降低學習更多方法的門檻。新方法的應用，也緩解了我的職涯焦慮：我能繼續出版期刊論文，也在疫情期間出版了第一本專書，主題是探討習近平政府如何重新馴化與利用中國的社群媒體。等到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與各種 AI 輔助研究工具相繼問世，學習 NLP 與統計技術的時間和心智成本就更為下降。我開始運用大語言模型

去詮釋主題模型產生的結果，以進一步控制政策詮釋上的人為主觀性。我也運用大語言模型對所要分析的文本進行分類，從巨量的文檔中辨識出與研究議題真正相關的文本，而所花費的人力、時間與財務成本都很低，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低變異性）。一個整合「傳統質性政策分析、自然語言處理、迴歸統計與大語言模型」的研究途徑，已然出現在中國研究的地平線上。

田野訪談和民意調查仍不可偏廢

資訊科學與大語言模型，雖然為中國研究帶來全新視角與可能，但它們並非解決研究困境的萬靈藥。例如，對於文本或統計資料相對稀缺的議題，研究者仍需投入大量心力來蒐集和產生資料，如進行田野調查或設計具信效度的民意調查。然而，這些工作又面臨中國內政「安全化」的阻礙：受限於政府審查和監控，資料蒐集的難度與風險仍然很高。此外，新方法的出現可能在無意間加劇中國研究領域的失衡：在資料充裕或易於獲取的議題，研究活動可能蓬勃發展，而對於缺乏現成資料的議題，研究者可能選擇回避，導致這些議題逐漸被邊緣化。這種趨勢可能削弱我們對中國社會的全面理解，偏離了中國研究原本多元、跨領域探索的初衷。同時，學習這些新方法並不意味著放棄原有的方法；相反，它強調不同方法的結合與互補，以更全面、靈活的方式來理解中國的社會現象與政策動向。因此，推動中國研究的進步不僅在於採用新技術，更在於將這些技術融入於整個方法工具箱（toolkit）中，並靈活應用於不同的研究問題。研究者從掌握單一技術，到能夠運用整合多重方法的技能，這是促進中國研究這門技藝（craftsmanship）能保有活力並持續發展的關鍵。這種能力的提升，將有助於研究者以更創新的方式解決資料匱乏的問題，並避免損害中國研究領域的完整性與多樣性。

牆再高、浪更遠 從世界體系看中國研究的發展趨勢

撰稿 | 黃兆年*

編按：對於研究者而言，當前中國的確築起了更高、更厚的牆。然而，中國研究重要性未曾消退，由於中國相關經驗範圍的無遠弗屆，以至於高牆難以阻隔中國引發的種種現象。台灣對此格外有感。「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第三篇由黃兆年教授執筆，黃教授對於中國研究前景抱持較為正面的期待。不僅中國研究領域仍有豐富可能性，而相關知識的整合、普及、供應世界所需、回應地緣政治實踐，也是台灣學術社群面臨的現實議題。知識產出與行動議程彼此滋養繁盛，作為「台灣的中國研究」的重要活力來源，其實指向的更是台灣在「世界中國研究」當中的獨特位置。

隨著近年來中國政經情勢的變遷，特別是習近平領導下政治控制的緊縮，與中國有關的研究面臨比過去更多挑戰。不論是外國學者欲赴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或是獲取境內的統計數據，都變得異常艱難，導致不少中國研究者的焦慮感乃至悲觀論升溫。然而，若借用「世界體系」（world-systems）觀點俯瞰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筆者認為中國研究仍呈現出相當樂觀的圖像與想像。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也更複雜，從邊陲國家（periphery）逐漸發展成半邊陲（semi-periphery），更在部分區域和領域邁入核心國家（core），甚至在全球範圍與美國展開地緣政治爭霸。上述發展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更寬廣、多元，在理論上更靈活、創新，相關知識的供給和需求也持續不斷擴大，因此儘管近年來在資料蒐集上較為受限，但從長期、整體的觀點來看，中國研究仍是朝向正面發展的。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圖。（照片來源 / 中央社）

更寬廣、多元的經驗現象

首先，中國作為一種經驗現象，明顯地更寬廣、更多元了。近半世紀以來，中國加入了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其國際角色發生變化：起初作為外來資本與技術的接收國，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出口 Made in China 商品，以賺取外匯；其後開始有能力轉為資本與技術的輸出國，向開發中國家用基礎建設換取自然資源，並向已開發國家攫取尖端技術，以追求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逐漸在部分科技領域取得全球領先的地位。隨著中國「走出去」，中國研究也跟著「走出去」了。中國研究的範圍變得更寬廣，主題也變得更多元，不僅限於中國本身的經驗，更擴及更多世界各地與中國有關的現象。比如，過去研究關注中國本身的農民工及血汗工廠，現在則關注中資公司在海外自然資源開採產業的勞動關係；以前研究關注中國內部的言論審查和網路監控，現今則開始關注中國的大外宣、假訊息操作，乃至數位威權輸出。

在此脈絡之下，中國研究在國內外學界都面臨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範圍、甚至重新命名的議程。例如，在研究社群方面，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早從 2004 年就創設了以 China and the World 為名的研究項目，英國的艾希特大學則在 2010 年代提倡 Global China 的概念並成立以之為名的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台灣的中研院民族所亦在 2021 年組成「世界化中國」（Global China）研究群。在學術出版方面，澳洲墨爾本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已規劃在今（2024）年底以 Global China 為名舉辦年度論文研討會，而作為全球學術出版重鎮的劍橋大學出版社更自 2022 年起新增了 Global China 專書系列。在高等教育方面，上海紐約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丹麥奧爾堡大學等皆設有 Global China Studies 相關學位學程。上述研究及教學項目的名稱演變，雖不表示中國研究的領域名稱必須有所調整，但已顯示隨著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中國研究的經驗範圍已有擴大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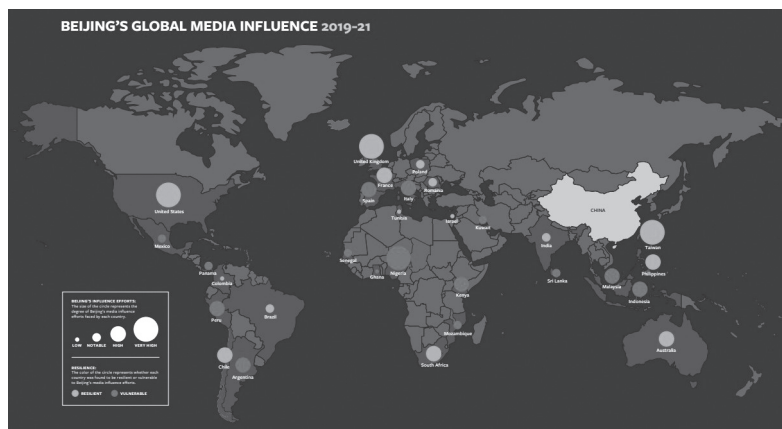
更靈活、創新的理論變項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理論變項，不再像過去一樣較常扮演依賴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的角色，而是隨著與世界關係的演變，更有機會在更多情況下扮演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的角色。如以世界體系的概念來做類比，中國以往作為邊陲國家，其狀態或變化較常處於依賴他國、受影響的地位，如今發展成半邊陲乃至核心國家，其內外作為皆更有對他國造成影響、甚至宰制的可能性。據統計，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1980年排名全球第11位，到了2023年已躍升至第2位，僅次於美國；其人均GDP則從1980年的全球第149位提升至2023年的第71位；其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亦從1990年的全球第105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75位。上述指標反映中國數十年來在世界體系之中日益升級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在此趨勢下，中國研究已然衍生出一些新興的研究方向和創新的理論概念。傳統的中國研究多是以中國為主體的轉型研究或比較研究，其宗旨在於探討「中國是如何被（內外因素）影響的」，而一個新興的研究方向則是關於「中國影響力」的研究，其目的在於釐清「中國是如何發揮影響的」。例如，中研院社會所早自2010年便開始倡議「中國效應研究」（China Impact Studies）並為之成立專題研究小組，國內外學界也陸續產出許多探討中國如何對世界各地不同層面發揮影響的研究成果。上述發展促進了中國研究新興領域的理論創新。例如，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分析架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創造「銳實力」（sharp power）此一權力概念，跨國學者應用傳統的民主輸出（democracy promotion）理論建構出新興的「威權擴散」（authoritarian diffusion）理論。這些新興理論的普及化顯示中國被視為潛在的獨立變項有其需求及合理性。

資料局部受限，但整體更豐富

近年來，中國研究的資料蒐集面臨巨大挑戰，主因是中國政府在習近平治下加



自由之家「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照片來源 / Freedom House 2022)

強了對公共空間和學術領域的言論控制，同時建立對境內數據的管制，導致外國研究者難以赴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亦不易蒐集和取得統計數據，此情況對質性及量化研究都構成一定阻礙。但如前所述，過去數十年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更寬廣、多元，在理論上也更靈活、創新，這些都讓中國研究資料蒐集的空間和場域不再僅限於中國本身，而是擴及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與社會，此部分的訪調工作較不受中國政府的干預。除此之外，由於新科技的進步與輔助，資料來源和蒐集方法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實體場域，而是得以擴展至網路媒體和社群平台等虛擬空間，這有助於研究者突破以往的地理限制，延伸可資利用的數據及資料範圍，並提升蒐集效率。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崛起，對於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造成威脅，導致更多研究機構和政策智庫願意針對中國研究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資源，這也讓相關資料的數量和品質有所提升。例如，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長期追蹤並評比世界各國的人權與民主狀態，近年卻特別針對「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Beijing's Global Media Influence）進行跨國調查並建立指標；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開發了中國科技公司海外合作網絡的資料庫；台灣民主實驗室嘗試分析中國在世界各國多個領域的影響程度並建構「中國影響力指數」（China Index）；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致力於觀測並記錄中國相關行為者的網路足跡及資訊操作動態；自由之家台灣辦公室的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計畫則為中國內部遭威權壓制的異議行動建立資料庫。這些研究資源的投入，與中國的言論緊縮相互加減之下，使得可資運用的中國研究資料來源不僅未減少，反而可能更豐富。

知識供給與需求的擴增

從知識的供給面來看，傳統的中國研究者固然仍是相關知識生產的主力，但隨著中國在不同地區、各領域及層面的影響力擴散，近年來出現越來越多「非典型」

的中國研究者，他／她們原本並非專門做中國研究，但因為所關心的議題（可能是香港的城市農業，或是東南亞的族群政治）涉及中國的影響，故而開始涉足以中國為重要個案或變項的研究，成為相關知識生產的生力軍。以澳洲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為例，他原先是一位關注氣候變遷、過度消費、永續發展等議題的發展經濟學者，過去幾年由於注意到中國政府對其他國家（特別是澳洲、北美及歐洲各國）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滲透，因而投入中國影響力相關研究，已出版了《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和《黑手》（*Hidden Hand*）這兩本重要著作。除了學院研究者以外，如前所述，各國政策智庫也為了應對中國在全球及區域的霸權競爭，而提高了中國研究的投入和產出，這相應地增加了相關知識的供給。有鑑於此，現階段中國研究可望在傳統研究者的深厚基礎、非典型研究者的創新思維，以及智庫研究者的實務邏輯之間取得交流和整合，共同營造出更新鮮而豐富的知識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研究的知識需求也有所增長。在學術領域，中國研究的讀者很可能不再僅限於傳統的中國研究學者和學生，前述「非典型」的研究者和學生也需要多加參考、引用相關研究成果。以在中國研究領域具代表性的國際期刊 *China Quarterly* 與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為例，其在 2010 年代的平均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均顯著高於 2000 年代的平均值。除了學界人士之外，中國研究的知識需求也擴及到其他公民社會、企業、政府當中的非學界人士。尤其自由世界的人們擔心中國崛起將對美國領導下的既有國際秩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帶來衝擊，因此亟需增進對中國的了解和掌握，以解除焦慮或找到因應之道。此一新興需求的有效滿足，有賴中國研究學界與各知識流通部門（包括出版社、各級學校、社區大學、公共及商業媒體、獨立書店、公民團體等）協力合作，方能將相關研究成果予以科普化與通識化，進而在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之中推廣並實踐「中國識讀」。

牆再高、浪更遠

綜合而言，儘管近年中國政治環境緊縮導致有人對中國研究的未來感到憂慮，但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及其國際影響力的強化，已然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理論上、知識供給面及需求面的「質」與「量」均有所提升。雖然中國築起言論高牆，但中國研究已經「住到海邊」去了，短期且局部的限制終究抵擋不了長期而整體的趨勢。由此觀之，全球中國研究仍有著值得期待的樂觀前景，而臺灣的中國研究享有高度學術自由，也因地緣、歷史及語言因素而具備相對優勢，可望持續幫助世界了解中國，在當代重要知識的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中共的變與不變 中國政治研究，需要典範轉移嗎？

撰稿 | 林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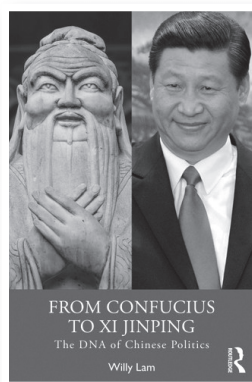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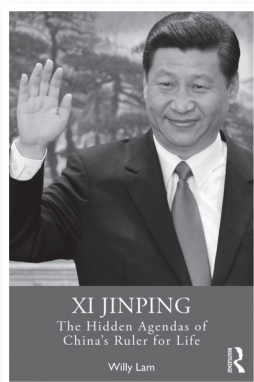
編按：林和立教授長期觀察評論中國政治，其見解影響廣泛。1989年6月，在北京與當時正援救方勵之夫婦的林培瑞相見。近年，林和立持續發表分析中國政治的英文專書。2023年8月出版《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藏議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書介中指出：「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沒有哪位中國觀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確、詳細地追蹤中國高層政治。他對數據的百科全書式掌握為其洞見奠定了基礎，世界若忽視這些洞見，將面臨很大風險。」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從孔子到習近平：中國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將在2025年3月出版。當許成鋼「制度基因」論著在台灣廣受關注之際，《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邀請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辯論。

當前，無論是研究中共黨史與理論，或是中國具體的政經政策，國外的漢學家乃至關心國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頗大的困擾，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級政府或大專院校的同意，前往進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關當局允許外來學者查閱內部資料。有不少前輩主張探究中國國情要來個「典範轉移」，用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審視那「豪華吊燈中的大蟒蛇」。

其實，雖然中共聘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管理員，高效清理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社會媒體中所謂「反黨」或破壞穩定的資訊，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與西方關注中國情況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都定期發布包括中國社會動蕩、抗議事件與罷工等較為可靠的

*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研究員、美國 Jameston 基金會中國事務資深研究員、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



統計數字。¹ 中方統計局發布的經濟數據，連國務院已故前總理李克強都深知有誤導成分，反而是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不時透露更加「接地氣」的數字與預測。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與政策。馬列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共的啟蒙者，從李大釗、陳獨秀，至毛澤東、張國燾等，都沒有充分依循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們主張的「偉大新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中國數千年農民起義，以及農民領袖取得政權後「馬上蛻變成皇朝貴族」的傳統。17 世紀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紛紛造反，而張獻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殺百萬名無辜的四川平民。由於這個緣故，近年在中國發動「半恐怖主義」襲擊路人的反社會「狂徒」，亦被稱為「新時代的張獻忠」。當然，最典型的「造反領袖」，是讓至少數千萬名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草莽梟雄毛澤東。至於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形容為「毛孫」的習近平，則繼續把中國打造成連氣都透不過的牢籠。1958 年，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就承認他的「建國大業」不過是基於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 Rebecca Choong Wilkins, China Protests Spiked 27% in Months Before Xi's Stimulus Push, Bloomberg, 2024/11/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11-21/china-protests-spiked-27-in-months-before-xi-s-stimulus-push?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author_alert&utm_term=241121&utm_campaign=author_20912245; Kelly Ng & Yi Ma, "Xi Jinping is worried about the economy -- what do Chinese people think?" BBC, 2024/10/1,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3e95lmy0x9o>

毛澤東得以「打天下然後坐天下」的要訣，相當程度繼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與愚民」。正如在延安時代無黨派知識分子黃炎培所言，中國的所謂革命家，其實絕難跳出「歷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當然，習近平自 2012 年「登基」後的作為，多少也沿襲了秦始皇以至毛澤東的法家兼「和尚打傘」教條。

研究中國政治，其實可從側面參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第一個，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衛並確保中共的合法性與主宰一切的權力，即毛與習所強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² 眼光銳利如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家」，在 1980 年代初，一嗅到來自蘇東波蘭的「病毒」，隨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並對傾向普世價值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刀。第二個「凡是」，是要把挑戰中共特權的思想與行動「毀滅於萌芽狀態」。受到幾千年儒家與法家熏陶的中國人，畢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國人不會造反，³ 有辦法與膽量的，大多會是「以腳投票」，千方百計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歸根結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參照「典範」。毛澤東、習近平的立國之道與統治模式，是極其原始粗糙的。用保衛政權江山的「兩個凡是」，作為分析基礎，已有相當解釋力。不過，海外「中國通」仍應抱持充分的謙卑態度，因為毛、習與不少領導高幹，都是虛虛實實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領導幹部，早晚成為無休止黨內鬥爭的犧牲品。中共早年勢單力薄，沒有所謂的「統一戰線」與「情報戰」，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如中共怎麼在歐美各國以捐款或其他賄賂方法獲取認同，在香港栽培特務與操縱港獨勢力，⁴ 北京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掌控貧困國家的土地與港口開發權，以「低於成本傾銷」（dumping）贏取海外市場等

2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十個明確」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飛躍述評之一〉，《人民日報》，2022/2/14，<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2/0214/c117092-32351226.html>

3 林和立，〈為甚麼中國人不會造反？〉，自由亞洲電台，2024/11/21，<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lam/china-sociology-economy-slowdown-mass-casualty-attacks-11212024132034.html>

4 程翔，〈中共是「港獨」的最大贊助人〉，自由亞洲電台，2024/11/26，<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ching/china-hong-kong-independence-sponsor-11262024121652.html>

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貴內情

頗為反諷的是，有越來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戰」的人士，包括前領導幹部與其家屬，都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外國。習近平時期，特別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潤學」背景。有興趣做田野調查的學者，不難在北美、英國、歐盟國家訪問到這類人。這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在中國境內可能預期手機與通信設備受到嚴密監控，而無法說真話，出國後才能以匿名甚或公開身分暢所欲言。因此，田野訪問與量化統計（quantitative analysis）在華盛頓或倫敦，未必無法做得更有效。熱衷於方法論，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必對「無法進入中國」過於憂愁，畢竟中共讓你看到的或在檔案館抄到的東西，都可能已被「處理」過，品質往往堪比三鹿奶粉與毒棉衛生巾。

這裡也有必要強調，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那些訓練有素的說客、外交人員、學術權威，擅於運用「黃賭毒」，還有天花亂墜的條件與好處。口口聲聲說 Never bet against China 的權威大學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內部材料」證明「習近平並未效仿毛澤東或史達林『定於一尊』、中共絕對不會走下坡、絕不會垮台」云云。這類親共「權威」在政治權謀上固然只是「兩個凡是學」的初學者，論學術程度，和「永遠黨中央核心」的習近平，恐怕也難分高下。

為什麼中國也有「進步勞動法規」？ 從個人學術困思歷程到「威權司法權衡理論」

撰稿 | 王許裕民*

編按：王許裕民老師是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輔修人類學）學士、碩士，多年前追溯族源並回歸賽德克族並改姓王。2024 年獲得美國 Emory University 政治學博士之後，隨即任教於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研究領域包括威權政治、比較政治經濟學等。部分研究成果已經或即將發表在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Political Behavior* 與 *Journal of Politics* 等著名國際學術期刊。裕民老師長期關注中國勞工及司法議題，擅長運用與梳理中國的經驗數據，並且熟悉美國主流學界前沿的推論方法。對當前中國研究領域的師生——無論是否志在學界，都展現了審慎的研究策略與工具包。中國政治體制長期透過「權衡」維持「適應性」，但在近年「黨領導一切」、「行政下沉」的現實背景中，特定治理場域的「權衡」還如何可能？不同領域學者各有關注，而司法裁量與「黨管政法」的矛盾，無疑是理解這個普遍現實問題的關鍵角度。

我對政治學的研究興趣——主要在威權政治、政治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社會領域——源自於大學時期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交換生經驗。那個學期，我選修了清華社會學系沈原老師的勞動社會學；另外，得益於清華與北京大學的地緣優勢，我經常往返兩校，每週會到北大政府管理學院聆聽朱天飊老師的政治經濟學導論課程。沈原和朱天飊兩位老師對教學的熱忱與對學生的關懷，極大地影響了我的學術興趣發展方向，使我從原本專注於政治哲學研究，轉而投入經驗研究領域與比較政治研究。

交換結束後，我在母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繼續攻讀碩士學位，並與林宗弘老師一同前往深圳龍華進行短期田野調查。適逢童涵浦老師、周嘉辰老師和政大的蔡中

* 國立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助理教授

民老師剛回台任教，我有機會在他們的課堂上系統性地學習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時，我也在不同系所修習量化統計課程，補充這方面的訓練。後來，在吳文欽老師及周嘉辰老師的共同指導下，我以「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勞工力量與再分配」為研究主題，順利完成碩士論文，也以碩論投稿參與了美國政治學會年會（APSA），參與會議的經驗讓我更堅定自己選擇美國博士班的方向。在幾個學校選擇下，2018 年我前往 Emory 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如願在 Jennifer Gandhi 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

Emory 政治系博士班的修業規定，是要在前兩年修完所有課程，並分別於二年級下學期與三年級上學期交出兩篇論文。第一篇論文的發表形式，採用較為彈性的海報（poster）形式進行；第二篇論文，則需在全系師生面前進行嚴謹的學術發表與答辯，最終由全體教授投票決定是否通過。政治系在我入學前幾年改變了資格考規定：不同於傳統的博士班資格考以開文獻書單方式，讓學生花幾個月的時間研讀，然後進行考試，我們系以寫學術論文作為考核「是否能成為博士候選人」的標準。這套新的考核方式，是促使我當初選擇 Emory 政治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認同這種制度設計背後的用意：鼓勵學生盡早「把手弄髒」，從知識消費者轉為知識生產者，更早投入研究寫作，讓學生提早具備獨立完成一篇論文的能力，而有「現成的」工作論文，也能促使學生更快進入曠日廢時的學術審查過程，而這些文章及其延伸討論，也能為日後的博士論文奠定基礎，成為博論的主要核心章節。

對我而言，讀博士班最嚴峻的挑戰，莫過於如何在自己的研究興趣與導師及系上的傳統強項之間進行磨合。Emory 政治系的研究重點領域在於制度（特別是法院）、威權與衝突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擁有多位形式理論領域的師資，能夠開設三門完整的賽局理論課程，同時也特別重視將因果推論應用於實證研究。這與我過去對政治經濟學，以及不平等與再分配的研究旨趣並不很契合，因此，博士班一開始的挑戰，對我來說是「怎麼讓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系上不會太過於格格不入」。我當初申請文件的研究自述，寫的是「希望可以進行威權與再分配之間的研究」，當時一些學術前輩聽到我對「再分配」有興趣，曾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可以考慮換方向，認為再分配的研究討論已經差不多了。可能是受到這些話的影響，我在博士班第一年時，並沒有將心力放在原先感興趣的再分配議題上，而是偏離軌道去探索其他領域。儘管我投入了諸多心力嘗試不同方向，但導師，也就是後來的指導教授



2018 年剛抵達美國。第一次到 Emory 政治系的系館。

Jennifer Gandhi 的回應始終冷淡，未能獲得她的積極肯定。這種痛苦與掙扎相當難受，儘管我博一的修課與成績都表現不錯。事後來看，這可以說是我博士班危機感最強的時期。

在博一升博二的暑假，我不斷思索尋找能獲得導師認同的研究方向。在一次偶然中，我發現了一個新的跨國勞動法資料庫，而就我讀到的現有威權與再分配文獻，似乎尚未系統性地探討威權國家之間勞動法保護程度的差異。這個發現為我開啟了研究的可能突破口。尤其過去系上老師和畢業生做了很多跨國人權的研究，從他們的研究中，我認識到統治者在思考是否簽署國際人權條約時，會考慮國內司法體系的有效性。順著這個脈絡，我隱約意識到可以將國內司法體系的角色，連結到獨裁者制定「進步勞動法規」的策略考量中，藉此探究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我連夜完成資料整理與初步分析，得出一個有趣的發現：獨裁者面對較高层次的不平等時，只有在國內司法獨立程度較低的情況下，才較傾向透過制定進步勞動法規來因應。除了這些跨國量化證據，我想到也許可以用中國的《勞動合同法》為個案，透過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來充實我的理論觀點與跨國相關證據，最後形成一個混合研究方法的論文。

博二開學前，我跟導師 Gandhi 見面討論這個研究問題、理論構想，以及一些初步發現，她聽了後眼睛立刻為之一亮，認為這個研究很 promising，並鼓勵我下次見面時，把想法與研究發現寫成初稿。十月中跟她討論初稿，她非常罕見地說 it's good，我也就順勢邀請她指導這篇文章，並發展成我的二年級論文。同一學期，我修習了 Renard Sexton 教授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課程，讀了大量使用次級國家證據與因果識別策略的實證論文。Sexton 鼓勵我不要只看跨國相關證據，應該挖掘（dig into）中國內部有什麼有意思的脈絡，可以更有利地驗證我的理論，因此我利用期末報告的機會，基本上完成了一篇同時具有「跨國證據」與「中國個案闡述」的論文，輔以一些初步次級國家研究設計的構想，並寄給導師。隔年一月初，Gandhi 正式邀請我加入她的 working group，安排我於第一次聚會時報告與討論這篇研究論文。至此，我終於找到在 Emory 博士班的著力點與方向，這篇文章最後成為我的二年級論文，並為日後進一步發展成博士論文提供基礎，也順利地在畢業前發表於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期刊上。在我目前的出版著作中，這篇文章對我的影響最為深遠，也格外地有意義。這篇文章融合了我關注的勞工與再分配議題、指導教授專精的威權政治制度研究，以及政治系傳統優勢的司法政治領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篇文章，我很有可能無法順利完成博士學位。

儘管我很早就確立了「司法」在我論證中的關鍵角色，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裡，我始終難以用理論說清楚「法院」的具體作用。我的導師和系上專攻比較司法政治的 Jeff Staton 教授不斷引導我思考：法院的獨特功能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非得是法院不可？此外，當時文章的主要論點認為，法院能夠減輕經濟菁英的損失，但這又衍生出兩個關鍵問題。首先，導師直接質疑：勞工真的會這麼容易被這種策略「忽悠」（be fooled）嗎？其次，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我在一場亞洲政治線上研討會發表文章時，中國勞工政治專家 Manfred Elstrom 在評論時表示，按照我的理論預設，勞動立法的讓步，與法院後續的妥協最終會相互抵消，這就很難理解獨裁者、群眾和經濟菁英究竟能從這個策略中得到什麼實質好處。

這些尖銳的理論問題困擾了我很久，始終無法突破。這個停滯的過程讓我把注意力暫時挪至發展其他研究論文上，比如探討台灣 2010 年縣市升格所導致的原鄉鎮市去分權化，如何影響到地方公共財提供，以及以美國地方的消費稅公民投票為背景，使用問卷實驗研究為什麼人們會支持累退稅。後者的問題意識在於，累退稅在當今不同層級政府稅收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我們對其背後的民意支持基礎卻知之甚少。更重要的是，回顧大多數民調結果，美國社會似乎對一個更為「累進」的租稅體系展現了廣泛的共識，那我們該如何解釋：為什麼以增加累退稅為主租稅公投的提案能獲得多數的支持？這兩篇文章分別是我的三年級資格考論文與博士班一年級美國政治的期末報告的延伸，除了呼應我對於政治經濟學與再分配政治的興趣，也是回應讀博當時的主要挑戰。我的導師，以及系上其他老師，都督促我盡量運用次級國家資料，搭配因果識別（causal identification）策略，來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在台灣讀碩士時，我得到的訓練，大多是問一個比較政治經濟的研究問題、思考新的理論解釋，並運用跨國數據進行驗證。然而，這樣的研究方式，在回歸單一國家研究，以及因果辨識革命的浪潮下，顯然是不夠的。這些文章的寫作思索，讓我得以跳出舒適圈，完成必要的「技術升級」，儘管過程之中仍多少有些抗拒心理。後來這些文章相繼在我畢業前順利地在比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與政治行為（*Political Behavior*）等期刊上獲得刊登。

博士論文的研究議程部分，我當時先擱置完善理論的工作，將心力轉去探討下游端的問題，也就是進步勞動立法的後果到底是什麼？當獨裁者制定一個「紙上看似極其進步」的勞動立法，然而其立法效果往往在司法執行過程中被妥協與打折扣，那最終是幫助促進政權穩定，還是其實損害了政權穩定？寫作這篇文章的動機，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回應當時導師所提出的理論問題，即「勞工能輕易地被這種（進步立法、妥協司法的）策略給忽悠嗎？」在理論無法突破的困境下，我當時認為回應這個問題的方式之一，是直接運用經驗證據，研究「群眾如何對於這個策

略做出反應」。如果說勞工會因為意識到「進步勞動立法存在規範上與實際執行上的具體差距」，從而降低對政權的支持，那某種程度說明這個獨裁者策略有其侷限。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既有的中國社會調查問卷中缺乏測量「社會與勞動政策施程度」的題項，我選擇轉向實驗研究的途徑，設計了一份嵌入實驗處理的線上問卷。在這份問卷中，我嘗試分析受訪者在勞動合同法通過後，接收到不同的勞動爭議判決趨勢資訊時，對政權支持程度的影響。這些趨勢包括「勞工敗訴案件變多」以及「勞工敗訴案件變多，但雙方部分勝訴案件大幅增加」。我使用「政府信任」相關題項作為測量指標，觀察隨機分派的資訊如何影響受訪者對政權的支持程度，進而「因果地」確立進步勞動立法施行效果與政權正當性之間的關聯。研究過程之中，更多的是學習撰寫預分析計畫（pre-analysis plan）、如何申請研究經費、與中國的問卷廠商交涉，以及動用人脈網絡幫忙註冊相關帳戶與付款。同時，我也摸索怎麼拿捏中國問卷的敏感程度，以及處理運用網路問卷研究中國民眾態度時，可能面臨到的各種風險，特別是當問卷公司突然反悔，認為問卷過於敏感不能發放時，必須要事先想好備案，才能在資料蒐集卡關時，不會手忙腳亂與花大量的時間進行危機處理。

除了「被妥協的進步立法如何影響政權支持」的研究，我也試圖從改善跨國資料中對於群眾威脅（mass threat）的測量方式，來提高論文的學術貢獻。儘管群眾威脅被認為是決定許多重要的民主轉型與威權統治現象的關鍵因素，然而翻閱文獻，卻會發現學者對於這個關鍵概念的測量莫衷一是。一些學者，例如 Acemoglu and Robinson，主要是用不平等程度來衡量政權所面臨的群眾威脅程度；這種測量方式與內戰文獻中將「憤恨」（grievance）視為內戰發生的主要因素不謀而合。另一派文獻則主張使用「組織動員能力」來衡量，受到比較福利國家與抗爭政治理論的影響，認為勞工的權力資源是推動福利再分配擴張的重要因素，因此更關注有組織勞工的潛在力量等變數。最後還有一派，直接使用「實際發生的社會抗爭與運動數量」，來衡量政權是否遇到來自底層的威脅，這種做法符合比較政治學裡使用跨國抗爭資料庫來研究國內抗爭因素的思路。

我認為這些變數各有優缺點，但應該存在一個測量方式，可以整合這些不同的途徑。不平等的測量問題，在於沒有考慮「憤恨」如何轉化為具體的「集體行動」，這也是其他學者主張採用「組織動員能力」的原因。然而，使用組織動員能力，也沒有回答為什麼群眾有誘因要組織抗爭。此外，使用抗爭數量的測量，僅考量到實際發生的威脅，卻沒有考慮到很多未發生的潛在威脅，事實上也能對政治現

象產生作用。我認為這三種主要的測量方式，本質上意味了如同國家能力或司法獨立，群眾威脅是可以且有必要透過「貝氏潛變量模型」，藉由不同途徑下的可觀測指標，計算這些可觀測指標反映的潛變數程度，進而構建一個整合的群眾威脅潛變數。某次與導師見面提到這個想法，她的第一反應是這個途徑聽起來很聰明（clever），剛好我同一學期正在修貝氏統計的課程，讓我有信心與動力往這個方向嘗試。

於是，在博三升博四的暑假，於回台灣隔離期間，我開始著手蒐集不同的可觀測指標，聚焦於「憤恨」與「組織能力」這兩個影響群眾威脅大小的重要向度。我認為，唯有在測量時同時考量「動機」與「能力」，才能更精準地捕捉群眾威脅背後的理論基礎與互動關係。此外，我也系統性整理了文獻中常見的貝氏潛變量模型，並利用不同模型估計出各種群眾威脅的潛變數，並以再複製 Milan Svolik 的經典發現——群眾威脅與軍事介入的倒 U 型關係——來闡述新的測量方式的用途與貢獻。這項研究的初步結果於 2022 年亞洲政治研究方法會議（Asian Polmeth）上發表，並獲得與會者的寶貴回饋。評論人建議，我可以考慮選擇更能反映階層概念結構的潛變量模型作為主要模型，因為根據我的理論框架，群眾威脅是由「憤恨」與「組織能力」這兩個向度共同構成，而這兩個向度又是由多個不同的觀測指標所反映。這一建議為後續研究提供了方向，也進一步強化了研究的概念結構與測量之間的聯繫。

投入這份研究的過程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研究過程促使我重溫許多比較政治經典文獻，橫跨政體轉型、威權政治、勞工與社會抗爭，以及比較福利國家理論，在這些文獻中穿梭，讓我宛如沉浸在一場豐富的知識饗宴中，而閱讀的過程也彷彿經歷了一次「資格考試」。此外，我也從中對於經驗研究的概念測量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與把握，特別是在因果革命的浪潮中，這段研究經歷讓我得以短暫抽離對因果關係的執著，認識到因果識別僅僅是經驗研究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嚴謹的實證研究始終繞不開對「什麼是好的概念測量」的探索與追問，而對測量精確性的追求也間接影響了其他研究實踐，特別是在設計問卷實驗時，更會自我要求確保實驗處理清晰且精確。對我而言，整個研究過程中最迷人的部分，是嘗試運用一個簡潔的理論框架來指導經驗指標的選擇與測量模型的設定。這種在理論與經驗之間反覆打磨、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僅充滿挑戰，也為研究帶來了無窮的樂趣。

這些「插曲」固然帶來意義與回報，最終還是得返回到論文寫作的主軸與步調。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將次級國家數據運用於論文研究中，也意識到勢必得蒐集並分析勞動爭議的訴訟判決資料，以更有力地支持我的理論觀點。在此之

前，我曾考慮蒐集中國地方的勞動立法制定、司法獨立，以及群眾威脅，嘗試在中國各地方之間發現與跨國證據相似的結論。然而，這裡的難題是「中國各省或城市之間並沒有可以很好測量司法獨立的指標」。既有研究主要是仰賴一些比較間接的指標，例如法院經費支出的多寡，這是哈佛大學政府學系的王裕華教授在其第一本專著所採取的方式。但這個測量的問題在於，它或許可以反映一個地方的法制環境健全與否，但要用來證成法院經費越多、獨立性也越高，這個推論就會有些問題且失真。採用法院經費支出作為自變數，也會面臨比較嚴重的內生性問題。某種程度上，如果研究者轉向單一國家研究，是為了運用更細緻的當地脈絡與數據來做更好的因果推論，那麼，僅只是在中國次級國家單位再現跨國經驗相關證據，並無法完全解決在跨國證據所面臨的經驗難題，也無法提供更多實質意義上的新發現。

基於這個判斷，我認為博士論文的決勝點，還是在「多大程度上我能夠運用勞動訴訟的判決資料得出什麼新的發現」。在我博士班時期，剛好趕上中國裁判文書資料的爬蟲大數據並整理分析的風潮，取得這些資料並非難事，但同樣的資料，研究者是否能提出新的理論視角來分析資料，變得至關重要。除此之外，習近平在其第一任期於全國範圍進行多種「司法改革」，也為經驗上「利用這些改革在各地方採行時間的差異，來捕捉與測量法院的變化」提供機會。由於「司法獨立」是我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我採用了2014年起的「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省級統管改革」，其主要改革內容是將地方法院的人事與財政依賴，從原本的地方政府上收到省層級來管理，企圖讓地方法院獨立於地方政府的干預。此外，改革在各省與地級市之間的實際施行時間有所不同，讓我得以使用「交疊雙重差分法」進行分析。

上述三篇文章的修改與再投稿（R&R），耗去我博五上學期絕大多數的時間，直到博五下學期，才開始仔細分析這些資料。當時我的主要目標是完成一篇足以在就業市場上展現實力的論文，我從博士論文中擷取不同的經驗證據，仔細斟酌如何將各項研究材料組織成一個連貫完整的論述。一開始，我希望將跨國量化資料與裁判文書的分析拼成一篇文，但這麼做無異於讓同行可以直接攻擊「司法獨立不是外生」。此外，當時我的裁判文書分析證據顯示，人財物省級統管改革可以提高勞動勝訴的機率，某種程度上無法很好地對照跨國證據。因此，我又試著將跨國證據與實驗證據結合，企圖講一個進步勞動立法的原因與後果的故事，但論文委員Staton認為我的實驗證據好像只是附上去（attach）的，只是一時之間我也沒有更好的想法。

完成論述的突破口，是當我放下「就業市場論文」，將精神投注在撰寫求職信與研究陳述的時候。求職信需要以很短的段落介紹博士論文的核心精華，我意識到

當我描述「不獨立法院」的功能，已經不再僅是「幫助減輕經濟菁英成本與損失」的作用，而是說法院有裁決彈性，可以在瞬息萬變的威脅環境做出改變。當群眾威脅變大時，法院可以改做出親勞工判決；當資本的力量變大時，則做出親資方判決，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維繫獨裁統治的利益。我因此突發奇想，何不將「勞工抗爭的資料」與「裁判文書的資料」進行合併，如此便可以從實證上去探討，當勞工抗爭數量越多時，「不獨立的法院」是否越會做出親勞方的判決；而當資方力量較強時，比如位於高新區的法院，勞工則較有可能敗訴。

我後來將這個理論概念化為「威權司法權衡」(authoritarian judicial balancing)理論。幸運地，我也發現統計分析結果證實了我的理論猜測。然而，這段時間對我而言並不輕鬆——因為女兒剛出生，白天她醒著時我幾乎無法專心工作，因此經常熬夜到凌晨三點，努力將分析出的實證結果與跨國證據整合，並與 Gandhi 討論如何進一步完善。Gandhi 對我的研究發現表示相當感興趣，並建議我在「就業市場論文」中強調這一理論與發現的重要性。然而，當時文章的結構是先呈現跨國證據，再討論次級國家證據；Gandhi 認為，應該反過來安排，才能更好地突出文章的亮點。經過與導師的討論，她協助我重新調整了文章的結構，並完善了論文的呈現方式。至此，「就業市場論文」終於塵埃落定，而當時已是八月中旬左右，距離一般來說的就業市場申請的 9/15 大限，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事後看來，當初的靈光一閃相當關鍵。我認為「威權司法權衡理論」解答了困擾許久，以致很長時間不敢直視的理論挑戰：勞工能這麼輕易地被忽悠嗎？根據我的理論，勞工未必無法從這個獨裁者策略中得到好處；當群眾威脅激增時，法院可以轉向勞工。這個策略也不是獨裁者、群眾，以及經濟菁英利益之間的相互抵消，而是取決於「威脅環境」的變化。最後，法院的獨特功能是什麼？威權司法權衡理論，有別於既有文獻強調威權法院在合法化、官僚監督、鎮壓，以及充當可信承諾機制的角色之外，進一步揭示了「法院」在分配衝突下具有獨特的「權衡功能」。

「司法權衡理論」還解答了我回顧中國個案時一直面臨到的困惑。為什麼我們看到在金融危機發生時，法院被指示在判決過程得對企業多「讓利」；但同時卻有許多精采的質性研究顯示，法院往往被要求扮演積極的司法角色，積極介入維穩過程、迅速做出裁量與消解集體行動。我們該如何理解中國司法的雙重面貌，一方面被長期詬病為地方保護主義的爪牙，而另一方面又能化解糾紛，為工人提供補償？我認為司法權衡理論能解釋這個看似相互矛盾的動態過程。總的來說，這個理論認為「不獨立的司法」具有「裁決彈性」的特徵，導致法院在面臨不同的威脅環境下，能根據統治者的偏好做出改變，最終促成政權穩定。這種權衡功能也解釋了為



景色優美的國立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

什麼獨裁者傾向在「司法更不獨立」的條件下，透過制定「進步勞動立法」來回應與日俱增的群眾壓力。

時至今日，六年博士生涯的光陰轉瞬即逝，令人難以置信。出國攻讀博士學位，不僅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更重要的是在母系認識許多重要的摯友兼合作夥伴。讀博中間有所起伏與挫折，但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都化為重要的經歷與資產，督促自己繼續向前。讀博士班，更多的是訓練自己成為「獨當一面的研究者」，研究卡關與難題，都得靠自己花時間沉澱並一一擊破，導師與系上老師在大多數時候只能就一些基本方向給予建議。即便像母系同質性相當高的學術社群，系上老師對於研究該怎麼做，研究風格與品味也都有所出入。出國讀博士的這段時期，除了學習，收穫更多的是耳濡目染老師們的研究素養。Gandhi 對於論文極度講求「前端」（front end），問題是否重要以及理論是否有意思，對她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前端」不夠有說服力，即使端出再好的資料與因果識別策略，仍然無法過她那關。她曾說過，一個學者之所以被人記住，鮮少是因為她／他做了什麼實證研究，而是因為提出了什麼有意思的理論與概念，因此有沒有「自己獨特的聲音與品牌」很重要。在博一比較政治的討論課上，我們曾討論 Milan Svolik 2013 年刊登於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的文章。她問：這篇文章在因果識別革命的浪潮下，雖然僅使用跨國資料佐證其理論，為什麼時至今日仍然是篇好文章？原因是，該文所傳遞的理論洞察力已經足以讓讀者信服，因此經驗證據是否為因果，顯得不是那麼重要。

此外，系上另外一些年輕教授，比起追求 big ideas，更多是走如何做嚴謹的實證研究路線，從他們身上能學習到「如何登上學術頂級期刊」的一些訣竅。例如，

在思考開展一個學術研究或議題前，會先像下棋一樣想到後面好幾步，評估是否有好幾種不同的經驗素材，可以鋪陳出好幾篇學術文章的潛力，以奠定自己在該領域的一席之地。縱使研究取向各異，這些學者都分享一個共同理念：有影響力的研究問題和理論貢獻，不應侷限於特定次領域，而應該是能夠引起廣泛學術社群的共鳴與重視。我出國攻讀博士最寶貴的收穫，可能不在於掌握最新文獻或研究方法——這些訓練固然重要，但同樣可以憑藉自身努力在台灣習得——而是能夠親身浸潤於這些學者的思維與研究素養之中，藉此提升自己的學術視野，最終走出屬於自己獨特的一條路。

離開學生身分的我，在不景氣的就業市場中，很幸運能有一些面試機會，最後落腳在台北政經學院這個具有強大發展潛力的地方。我未來的研究，將以博士論文研究為核心，往外拓展兩個主要方向：首先，我計畫更深入探討「獨裁政權如何運用法律策略來使其統治基礎正當化」，以及這種策略的實際效果為何，並且從司法改革的角度，剖析非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其次，我將開展「再分配主義政治宣傳」（redistributionist propaganda）的研究議程。這奠基於我與母系學弟楊承風即將發表於 *Journal of Politics* 的研究成果。這項研究的起點，源於我們在開放式問卷中發現的一個有趣現象：當被問及中國民眾為何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時，受訪者的回答往往與官方宣傳高度一致，例如「和諧社會」、「社會穩定」以及「共同富裕」等。這一發現使我們意識到，在威權政體下，政策偏好可能不僅來自於個人的利益考量或對公平的感知，也可能是受到政府單一旦壟斷的宣傳影響而形成。我們進一步將這一現象與「作為社會公平的民主理解」相關文獻相結合，提出一項推論：政府圍繞再分配主義進行的宣傳，可能誤導中國民眾高估本國的民主程度。我們通過實驗研究驗證了這一推論，並進一步在跨國社會問卷數據中發現了與該理論一致的經驗規律。我計劃進一步探究這類宣傳如何影響民眾對民主的定義、形塑其再分配政策偏好，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可能產生「反效果」。這兩個研究方向既延續了我目前的研究成果，也契合了我對威權政治的長期研究興趣。我期望這些研究能在政治學及中國研究領域中帶來新的洞見，進一步推進我們對威權政體運作及其社會影響的理解與認識。

抗爭、創傷與韌性 會議籌劃緣起、記錄與反思

撰稿 | 沈秀華*

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舉辦了「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多元力量」國際會議，聚集來自中國國內外的公民行動者、台灣學界師生與社運工作者百餘人，分享與探討在變動中的中國和國際局勢下，中國公民行動者所從事行動的議題、案例、經驗、困境及可能的應對方式，以及學術工作者如何才能研究與理解當代中國公民行動及轉化，尤其是近年來於中國境外新興的各種倡議行動。

女權、性別、社區、媒體、勞工、世代、創傷、風險、照顧、記錄、海外與離散等，是兩天會議中的主要關鍵字，這些關鍵字都與 2022 年底在中國發生的白紙運動有緊密關聯。中共政府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的強制封控，累積上越加嚴厲的社會監管與打壓，引發了雖然沒有組織，但卻在中國各地群起以舉白紙，沒有說什麼卻能夠填入無數對中共極權的指控，以及期待改變現狀的集體抗議行動，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與中共的強力驅散或逮捕。在習近平的高壓治理下，許多人原本以為中國社會的抗爭空間已死，受白紙運動的激勵，以海外為主的新一波中國公民行動興起，他們「想繼續做點什麼」，透過實際行動支援受鎮壓的白紙運動，並且期待能拓展中國公民空間，他們探問：不平等的根源在哪裡？要改變什麼？能做什麼？所訴求的價值與理念為何？行動媒介與策略是什麼？極權國家暴力對社會與社會運動者所造成的創傷，應該如何面對？如何評估運動風險與安全措施？如何在風險考量下，為運動留下紀錄並傳承經驗？

當前國內外學界與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往往聚焦於中共的所作所言。極權政府所擁有與能運作的權力當然極大，但若僅看到中共政府的治理威力，會落入助長宣傳其政權無敵的框架。中國社會中主張民主與自由的抗爭精神並非已死，因為若是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已死，就不會有白紙運動與其他行動的出現。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國家無論如何盯人監控，仍會有不服從的芽苗在縫隙中尋找陽光而生長，「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多元力量」國際會議，就是基於社會不可能全然為國家所壓制與代表，試圖探討當代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以及中國海內外公民行動的進展、困境與展望等樣貌。一方面凸顯極權政體中抗爭縫隙的存在，以質疑極權治理的適當性，另一方面也務實地看到抗爭活動與精神的形成和生存的艱困。公民

與國家政府所握有的權力和資源遠遠不成比例，尤其在極權政體下，國家暴力是日常，即使是境外的不服從與抗爭都可能需要付出極大的人身犧牲，凸顯極權下的公民行動格外的不容易與可貴。

隨著近年來有不少中國公民行動者因為越加緊縮的公民空間而陸續流離海外，離散中國公民行動成為一種政治認知、宣稱與認同；因為壓迫而離開、流離，進而聚集行動。中共建國以來，因為政治暴力已有多波離境中國的遷移浪潮，在海外控訴中共政權的聚集也沒有少過，包括從國共戰爭中挫敗流離到台澎金馬或泰北、滇緬邊境的國民黨軍政社群，1960 與 1970 年代間因為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逃離人潮，以及 1989 年六四運動武力鎮壓後所引發的逃離。長期來中國公民運動對政治抗爭的定義相對窄化，主訴求往往是反抗中共政權，忽視中共威權固然是造成中國國內其他如性別、生態、勞動、社區、障礙、城鄉、族群等不平等的關鍵問題所在，但父權主義、資本主義、種族與國族主義、殖民主義等也是核心問題，民主運動需要同時反思上述各種結構力量與其交織所造成的壓迫框架。近來一些新興與新世代的中國公民行動，逐漸意識到社會不平等與壓迫的複雜交織性，不僅是民主運動需要融入對其他社會不平等議題的論述與倡議議程，個別如性別、勞動、族群或社區運動等，都需要與民主運動以及其他運動做橫向連結，這也是本次會議以「性別、世代、多元力量」作為次標題的脈絡。

本輯通訊摘要與記錄這個會議的交流和討論內容，議題包含女權／性別、勞



會議海報。

動、生態、社區等，以及以多元媒體、藝術作為傳播與記錄運動理念和行動媒介的實作經驗。在閱讀這幾篇紀錄時，可以注意各個運動的倡議議題、策略、訴求與其轉變，誰是行動者、行動與行動者所面臨的困難和應對可能，離散於海外的行動者如何與中國境內的在地議題和相關社群保持連結，以及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者如何與全球相關議題產生關係。與會者的分享證實了，雖然是以海外為主要動員場域，中國公民行動仍在，並且為了突破壓制與噤聲而充滿創意，同時吸引一些年輕世代相繼加入。當代中國研究不應再假設中國公民社會已死或不重要，需要的是持續關注中國國內外公民社群與其行動的發展，才能在下一個類似白紙或其他公民行動出現時，不至於只能驚訝回應，而是能從所累積的觀察與研究中論證國家與社會關係裡，社會力量之所以強韌的基礎與脈絡。

跨越運動議題，當前中國國內外的公民行動都面對風險／安全壓力與創傷安頓的問題。中共打壓任何具有號召性的異議行動，不只對行動者本身，也擴及相關社群與親近的親友，這使得參與或籌劃行動充滿風險與門檻，多數行動者往往只能在遮臉匿名中行動；匿名中的行動可能因為突破風險而激勵人心，但更多時候可能是無法公開言說的挫折與恐懼經歷。風險評估也導致許多運動不敢留下公開紀錄，讓研究與傳承中國公民行動更加困難。這次會議的籌組過程，最花心力的是如何安排一個讓中國公民行動者能夠信任、感到安全的分享空間，說明了不僅是異議運動本身，任何與運動有關的活動都有風險考量，以及因此需要額外投入的工作份量。在風險與工作強度評估下所沒說出的是，中國公民行動者時常面對的孤立狀態，以及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全的交流空間，對他們的工作與個人都是無比珍貴的充權經驗。

近年來，我一直覺得「創傷」是理解當代中國公民行動與一般中國社會時很關鍵的切入點。台灣或其他社會的轉型正義工作經驗告訴我們，國家暴力會造成極深的無力感與集體社會創傷。在威權壓制下，原來所信仰與投入的公民行動和社群遭遇摧毀，行動者要隱身、放棄原來的志業，甚至毫無容身與喘息之地。公民行動與公民行動者在當代中國社會是極其少數的一些事件與社群，這些行動者不容易在社會中尋得同溫層，同溫層幾乎只存在於他們的運動網絡內，運動被禁止即包含行動者個人與社群生活也被破壞。從這幾篇會議整理中，能看到無所不在的創傷情感與經驗，共同反映出在面對壓制之下，個別運動社群內部的彼此不信任，如何在不易相互信任下又要跨越議題與社群，進而建立連結的困難，以及直視運動創傷療癒的重要性，但又會因此影響到行動能量的矛盾中。然而，創傷經驗也帶動行動者與其社群更有意識地將許多社會運動組織所忽略的「照顧」、「照料」議題帶入新一



與會者大合照。

波的中國公民行動中，與會的行動者多次提醒集體行動中相互溝通與照顧的重要性；由此來看，集體行動不僅是要改變社會，也在轉化行動者本身。創傷視角提供直視威權暴力的壓倒性影響力，同時也看到抗爭力量的能動性與韌性。

長期來台灣學界、政策圈或社運圈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往往以六四民主運動或人權律師為主要對象，女權／性別、勞工或其他社會運動，只是少數相關領域的社運團體或學者有所接觸，這次會議打破這個常態，探討中國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的交織性，其中顯示性別平等價值與女權運動成為連結新一波中國公民運動的重要結節，這也表現在年輕女性是白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的現象中。這個會議希望讓台灣學界與公民圈對艱難發展中的中國國內外的公民行動以及趨勢有所認識，引發相關的交流、連結與研究，也期待這個會議打下的基礎，能讓我們延續相關的活動與討論。

夾縫求生 中國女權運動的變遷與發展

講者 | 沈秀華*、熱田敬子**、馮媛***、Sam****

記錄 | 陳香婷*****

沈秀華教授首先開場介紹，本研討會背景為中國政權底下的中國國內外公民社會的運作模式。1979 年經改後，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變化，國際上的當代中國研究一度常發問：中國是否有公民社會？中國公民是否有反抗意識？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中國人民的不同聲音？近年來，國際社會見證到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越加嚴厲控制的趨勢，中國國內公民表達以及反對的空間越加困難，但也見到 2022 年底中國國內的白紙運動以及海外中國社群要求民主、自由與平等行動的出現。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藉由今日的研討會，邀請中國國內外各議題的行動者，探討緊縮的公民空間下，中國國內外公民行動是如何運作？也藉此連結台灣本土脈絡，理解雙方的公民社會及運動策略。

台灣沒有「不必了解中國」的特權，但民間對於中國的想像，往往僅停留在美化或醜化的兩極觀點。美化中國的論述，包含如台商基於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又享有中國政府提供台商的優惠，相關論述進一步形成對中國極權的支持力量。醜化中國的論述，則來自台灣民眾對中國社會內部的不甚了解，將中國與中共劃上等號，認定中國只剩下中共政權，忽視中國國內外仍有中國公民在爭取自由與民主，以及其中所展現的公民行動意志與力量。本研討會旨在了解，中國人民如何在極權下保有能動性？中國公民運動與公民社會儘管是少數，但仍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早稻田大學綜合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Femizemi & Café 董事

*** 中國女權行動者，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

**** 中國女權行動者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沈秀華開場介紹本場研討會。

值得關注，不僅站在台灣本位下要了解中國，也有助於因應目前國內外學者難於進入中國研究下，我們能持續地了解中國公民行動者的發展並且記錄下他們的運動樣貌。

中國女權運動的歷史進程

熱田敬子是研究中國現代女權運動的日本學者，曾以東亞女權運動為題出版著作。作為本次系列講座的第一位講者，她和聽眾分享日本官方主流的社會機構經常打壓及攻擊女權運動，使婦女權益倡導行動無法進入眾人眼光。儘管如此，她無數次地從中國友人身上學習到繼續堅持的力量。

「我此時想跟大家報告，在『某人』沒完沒了地執政的時代，在這艱難的情況中，我們做了什麼事呢？這些好消息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前《婦女報》記者、「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馮媛指出，在地行動不完全限於中國境內，在互聯網時代中已有不同抗爭方式；而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婦女始終是公民社會中最活躍、最勇敢的引領者」。

婦女運動在中國的歷史，始於 1995 年於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自 1989 年六四事件後遭到國際孤立，因此開始對於提升婦女地位展現積極作為。1992 年鄧小平南巡，一心急於發展市場經濟，在申請「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主辦國之後，才發現也要舉辦 NGO 論壇；因此，當時中國政府一方面控制非營利團體，一方面又鼓勵公民社會發展，民間組織從此開始活躍。這些留存至今的非營利團體，時常省略過往遭受打壓的辛苦歷程，僅傳述美好記憶，事實上卻沒那麼簡單。

隨著時代變化，婦女運動的倡導主體也在變化。在過去，民間多由學者身分及



1995年9月4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開幕式全景。
(聯合國圖片 Milton Grant)

機構名義引領教育與倡導研究；相反地，現在民間則多以「藝名」和「化名」表達立場。此外，個人化也取代了過去的組織行動。有的人以同一個藝名行走江湖，在社運圈聲名遠播；也有人依據不同事件變換不同化名，只為保障自身安全。在這個時代，國家立法及倡導動員同樣都在網上進行，而民間倡導可輕易觸及國家與國際層面。馮媛指出，他們曾為了家庭暴力個案而在地方辛苦倡導，卻未能見到國家責任轉為積極。當農村婦女、重病患者、輪椅使用者等遭受非典型家庭暴力時，地方政府部門都推諉責任，馮媛等人努力四年後，最終才讓個案在近期取得低保。

2018年中國 #MeToo 運動開始密集出現，曾有中國高校畢業校友集體發起「向母校寄信」的行動。馮媛解釋，若在校學生向校方抗議，有可能會被學校控制成績，或扣留畢業證書，而這次畢業校友的行動最終讓學校通過反性騷擾機制。儘管該機制至今尚未公布生效，但這些行為仍有社會方面的積極作用，促使法律往好的方向改革。此外，去年中國青年行動者投入「月經貧困」議題，在公益創投項目中申請相關補助，也在《增值稅法》修訂之際，倡導衛生巾免稅或降低稅率的論點。無論是否成功，這些行動都讓社群了解稅收是公共資源的一部分，藉由社群動員、訊息分享達到倡導的目的，使民眾了解自身權利。在中國雖然沒有參與民主社會的機會，「但是我們要從這件事情開始練習，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練習結果」。此次的「練習」讓《增值稅法》修法建議文章的點擊率達到千萬，連署人數逾一萬人。修改法律無法一蹴可幾，提升社會意識的過程仍仰賴公民社會的力量。

馮媛最後指出，《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4年公布後，僅於2005及2022年兩次修訂，雖然仍有許多條例不夠理想，但她認為「修改了好的地方，多於倒退的地方」。中國公民行動者也透過國際機制達到人權目標，例如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審議會議、可持續發展目標（永續目標）國際評估等，其參加人數都超越了馮媛的預期。在城市及農村裡，願意參與女權運動的人數越來越多，儘管仍遠遠不夠，但馮媛內心感到欣慰，因為「婦女仍然是在中國的公民社會中走在最前列的」。

海外女權行動社群

有感於過往國內組織 #MeToo 運動的行動者被抓捕，中國相關組織活動被迫縮減，Sam 於是在海外成立了一個不受審查限制的女權開放空間，鼓勵參與者分享自己的經歷，作為反抗父權政治的女權行動。Sam 認為，說話及思考需要藉由鍛鍊才能互相聯繫，而這個空間與行動一方面能夠協助夥伴們共同關注公共事件和性別議題，另一方面則能支持全世界中國女權公民的社群，補充中國公民社會的海外圖像。

Sam 指出，這個空間重點在於堅持女權理念，以及不受言論審查的開放環境。每次活動的舞台及主題設定都會回應時下關注的事件，例如烏魯木齊大火，觀眾從關鍵字就能知道是一個政治話題的活動。除此之外，每場活動也圍繞著行動主義的主題，現場會張貼與事件有關的行動宣傳，例如為白紙運動被抓捕的朋友發送訊息表示支持，或是創作新聞熱播及小品談論，鼓勵大家透過行動參與表達對行動本身的肯定及支持。

組織者的韌性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對抗爭風險的抵抗力。在活動過程中，若參與者以嘲諷習近平為主題，容易在生活中受到警察騷擾，尤其在中國境內更是如此。Sam 苦笑道，海外行動者甚至得隱藏內心真正想法，對外宣稱舞台上分享的嘲諷橋段只是節目效果，以求自保，但回到中國仍有可能被懲罰，國內家人也可能因此被騷擾。有論者稱，當對行動者的騷擾數量增加，騷擾就會失去力量，但 Sam 不這麼認為。警察騷擾仍會對參與行動者造成顧忌及風險，海外夥伴參加女權活動時需要有更多的韌性來對抗各種騷擾與風險。

為此，Sam 曾組織一系列活動，讓公民運動者談論應對警察的經歷，以及互相提醒注意事項，避免譴責造成社群的撕裂與分化。Sam 指出，儘管被警察騷擾的當下很害怕，但大家講起經驗都像是「脫口秀演員」上身一般，把事情寫成稿件、寫成段子分享給大家。經過這陣子的組織過程，成員們逐漸敢於討論政治敏感的事件，培養出公民運動的韌性及抵抗力。

不可諱言的是，社群組織工作的侷限在於難以代替以人為主的行動主義及集體行動組織。Sam 曾經向觀眾宣傳寫明信片給白紙運動逮捕者的活動，以達到轉化現場觀眾成為關注中國女權及公民運動的行動者目標，但事與願違，明信片的回收數量遠少於現場參與觀眾的人數。Sam 發現，社群組織活動圍繞著行動主義，但無法替代真正集體行動的組織，它僅是另一套策略，也就是說，從吸引觀眾關心女權運動及政治反對，到成為行動者之間，仍需要組織者做額外的工作，串聯這些轉變的過程。



講者熱田敬子與馮媛。

女權公民運動的未來圖像

在講座的提問時間，一名學生分享了自己參加海外示威活動的經驗，由於在活動中看見記錄者，因此擔心自己是否也被記錄。他詢問 Sam 在海外組織活動時，是否過濾參與的行動者？以及全球行動者是否及如何透過倡議活動與國際對話？

Sam 回應，國際對話需要先學習彼此的語言，利用常用語言建造安全談論的空間，因此夥伴們利用此理念組織活動，在不斷被網暴、被騷擾的男權及威權社會中，撐起一個可控範圍的安全空間。在組織過程中，確實會擔心陌生人是否安全，也會猜想「順直男」會不會破壞安全感，這些都是組織者的負擔。然而，夥伴們後來覺得，與其建立安全空間傳遞訊息並造成自身風險，不如換個想法，透過舉辦活動建立勇敢的空間，讓參與者走出舒適圈；組織者也會鼓勵觀眾往前探索，著重於理念傳達，而非審查陌生人。至於在技術層面上，由於活動採取公開系統售票，所以會希望參與者都能預設自己參加的風險，除非是小型活動才會進行適當篩選，否則皆無審查過程。

沈秀華最後提問，當女權議題及性別議題逐漸被大眾看見，對中國公民運動來說有何意涵？馮媛總結，女權公民運動者不可能沒有風險地抗爭，只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風險，並承擔自己面對的困境。例如，即使官方婦女組織的微博被刪除了，也只能勇敢面對並持續推動他們想要做的事情。中國女權運動只能被願意睜眼、張耳的人看見及聽見，對於視若無睹的人是沒有辦法的。公民行動者會針對前者繼續努力，持續影響更多的人。

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中國女權運動的自我賦權

講者 | 小白*、Nelly*

記錄 | 小蝸**

2018年，中國的#MeToo運動首先在大專院校中開啟，隨後蔓延至媒體、演藝圈及體育界等各處。當#MeToo在社群網絡空間不斷地被轉發、被標籤，社會中的每一隅儼然皆成為中國女權主義實踐的重要場域。講者在本次的講座中，試圖探詢#MeToo運動之於中國女權及多元性別運動的意義？如何在中國國內及海外持續支持女權及多元性別運動？身處在性別與國家暴力夾縫中的人們應該如何自處？

#MeToo 運動——講述、傾聽與自我賦權

#MeToo是一場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小白明確地指出，#MeToo是一場女性的社會運動；而且，相較於過去由傳統媒體、知識分子或有經驗的行動者主導及策劃的社會運動，#MeToo是一場民眾除了圍觀與提供支持以外，還能夠主動參與和行動的社會運動。正如小白所言：「講述自己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參與和行動」，而且，#MeToo是一場參與門檻極低的社會運動，因為「#MeToo事實上是由千千万萬個女性分享自己的日常體驗所組成的」。那些過去女性認為沮喪、難以啟齒的日常生活經驗，隨著#MeToo運動而成為巨大的、自我肯認的價值。女性透過講述及彼此傾聽，獲得了自我主體性的確認，相信自己存在的價值，也意識到自己的身分認同與訴求，並且匯集成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在#MeToo運動中，人人都是這場社會運動的主體，每一名女性都是這場社會運動中的「造浪者」。小白如此評價#MeToo運動對於她的意義：「對於我這一代女性來說，#MeToo運動不但加深

* 中國女權行動者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12 年中國女權行動者，抗議上海地鐵二運於微博貼文中將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歸責於女性穿著。（照片來源／中國數字空間）

了我們對於性別的認知，也讓我們得到了自我賦權。……我們既要求社會變化，也要求女性在社會運動中的位置得到確認，不再成為議題的跟隨者，而是變革的主導者。」

身為 #MeToo 運動的當事人之一，小白認為比起被社會歸類為「受害者」，自己更希望能被稱為「倖存者」。這是由於「受害者」一詞除了承擔身體的恥辱之外，往往還隱含傳統社會對弱者的否定評斷，彷彿當事人之所以成為 #MeToo 運動的一分子，是因為自己的弱小而致，而不是因為從受傷中倖存的勇氣使然。成為「倖存者」之後，這種價值取向的改變將會告訴當事人，懷著傷痕生存下去的勇氣是高貴的，而那些偶爾出現的軟弱或悲傷是十足珍貴的。儘管小白自嘲自己打了一場「失敗的」性騷擾訴訟，她也認為自己能夠堅持站在法庭上，完全是社群支持下所創造的奇蹟。「什麼是運動的成功呢？個體在其中的勝負並不重要。真正的勝利是我們始終堅持，沒有浪費這個為社群奉獻的機會」。

小白曾經一度以為，中國司法層面上的改變終能為 #MeToo 運動帶來曙光，¹但在經歷庭審之後，她終於明白司法的改善並不全然等於女性權益的提升，反而是女性的身體被國家與社會更進一步地異化。「社會允許女性以性騷擾為案由進行起訴，並非是政府下定決心解決性騷擾這個問題，而是政府要成為女性身體的裁判，將女性講述自己生命體驗的權利，收割為政府的判決」。國家能否對女性的身體行使正義？小白針對父權制政府提出了更本質的懷疑，並且拒絕女性話語權被國家收編。也就是說，司法層面的改變雖然代表 #MeToo 運動的影響力來到權力的最高處，但 #MeToo 運動仍舊尚未「成功」，也不應該僅僅止步於此。

1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8 年 12 月發布通知，將「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列為新增民事案件案由，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 號》。又，中國政府在 2020 年 5 月頒布的《民法典》，其中第 1010 條是有關預防及制止性騷擾的重要立法。

從 #MeToo 運動支持者的口號變遷來看，小白認為這反映了年輕人對司法權威系統由信任轉變為不信任的結果，以及年輕人對於權威書寫個體歷史的抗拒。不過，小白也強調，這些對國家、對權威的質疑及消解，並不代表 #MeToo 運動的消極，而是行動者將 #MeToo 運動的重點放在對生命體驗的剖析，以及對個體權利的捍衛。作為單純的個人，我們是否仍相信社會中存在公平及道德？是否相信自己能在求助時保持尊嚴，並成功尋求正義？小白的分享為在座聽眾帶來無限的反思。

在日女權連帶會——我們恐懼但依然行動

中國公民對於長期疫情封控的不滿及怒火，隨著烏魯木齊火災的發生，引發中國各地、甚至遍布全球的示威抗議，宛若星火燎原。2022 年的「白紙運動」成為許多當代中國青年生命中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白紙運動成為她們的政治啟蒙，也成為出走海外的原因。對於 Nelly 而言，「直面極權政府並且直接行動的可能性」是她從白紙運動的震撼中所學習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給予她接下來參與更多行動的動力。但是要創建一個「後白紙」的社群，如何可能？在嘗試策劃幾次行動之後，社群內的分歧及爭吵讓 Nelly 意識到，過於模糊與廣泛的共識很難產生可持續的社群連結。「一旦做具體的行動，就會發現每個人的方向太不一樣了……有的人希望延續『六四』一代的精神，將某些名人放在運動最中心的位置；有的人想要行動更加激進；有的人則想更加溫和且非暴力的往前走」。

讓彼此關注某項特定議題，似乎是一個更有效的行動方法。例如，白紙運動中的厭女言論及口號，讓許多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女權主義者「現身」，並開始透過網路平台進行關於酷兒與女性友好的討論。² 許多中國女權主義者也在 2023 年東京的國際婦女節遊行中，透過中文標語的舉牌彼此「認親」及結識。於是，Nelly 及六名志同道合的夥伴決定創建一個社交媒體帳號，作為中國離散行動者的媒體平台，成為在日本的女權與酷兒活動訊息集散地。

就在 2023 年的六四集會前夕，八九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受到性騷擾指控。儘管在六四的集會場合下理應為了人身安全而保持低調，但 Nelly 及夥伴卻決定在這個時候做一點什麼事。「在女性手中的白紙上被 P 圖『500 一晚』的時候，在運動

2 關於白紙運動過程中的性別議題討論，亦可參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通訊》第 35 期「白紙專題」。

現場充斥著侮辱女性的髒話的時候，在看到人權鬥士的妻子們、民運中的女性們的勞動被遮蓋，並被當成男性們的功勳章註腳的時候，我們的努力與憤怒都在不斷的積累」。

接著，Nelly 及夥伴在六四集會前一天迅速分頭寫文案、做海報、做傳單，並在六四集會當天將呼籲「反對性騷擾」的牌子帶到集會現場，然後悄悄地穿梭在人群中散發傳單。原本擔心發不出去最初只印一百份的傳單，後來因為現場響應熱烈，又加印了兩百多份。她們雖然在集會現場遭遇質疑，但許多素未謀面的行動者自發性地站出來一起聲援 #MeToo 運動，給予彼此十足的支持。儘管如此，這場行動卻是她們憑藉著憤怒並壓抑恐懼而生的勇敢。她們害怕參與行動的身影被中國國安記錄，擔心在行動的過程中遭遇男性暴力，恐懼一個小失誤將會導致再也無法回中國，或者可能影響中國家人的安危。Nelly 及夥伴在集會時利用口罩與帽子將自己包裹得嚴實，活動結束後隨即到廁所換另一套衣服，只為了避免身分遭到辨識。

2024 年 3 月，在日女權連帶會發出一封公開信，針對日本明治大學勞動研究所在一場討論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國際研討會中，邀請當時陷入 #MeToo 指控的滕彪作為貴賓一事，提出抗議，並且呼籲明治大學及研討會參與者應重視性別平等的對話。除了網路行動之外，女權社群夥伴也在明治大學校園內透過舉牌及發放傳單等方式提出訴求。這起行動對於在日本的離散行動者而言是備感壓力的，身為年輕又缺乏日本法律知識的外國人，女權社群夥伴極有可能遭到校方起訴，甚至因此無法進行簽證，被迫失去工作及學業，但是她們也不想就此放棄。

於是，在日女權連帶會接受了其他富有運動經驗的女權行動者建議，透過召集律師、學者、普通民眾等百人的公開連署，以獲得群眾支持的基礎打造更加安全的行動可能性。「在我看來，中國女權行動者可能有五成的精力都用在討論我們如何去應對審查、如何去保護自己。這段時間我們原本可以做更多有價值的事情。我們究竟耽誤了多少時間和生命浪費在這件事情身上？但沒有辦法，而且審查會帶來我們之間的不信任，這是我們非常大的沉沒成本和機會成本」。

結語——我們在努力的過程中綻放光芒

小白指出，#MeToo 運動「是一種珍貴的自我賦權，女性不再指望政府給自己一個答案，不再迷信對權威的幻想，而是堅定地對父權制進行指認，做提出問題、製造麻煩的那個人」。她也認為女性的運動往往也是關於「如何照料」的運動，是一種由最樸素的關心所支持的運動。許多運動背後所體現的，實質上是一種日常



在日女權連帶會於 2023 年國際婦女節東京遊行活動中，聲援白紙運動被捕女青年。（照片來源／在日女權連帶會 IG [feministchina_jp]）

的、對人的照顧。正如同那些願意提供小白支持的陌生人一般，「這樣的運動，不是由多麼偉大的理念所支撐的，而是由關心與照顧他人的心情所驅動的」。此外，正因為威權政府預設人們只會為了私利而反抗，因此更難以預料人們會出於對他人的關心及照料而做出行動。換句話說，這種最日常的情感反而成為中國公民行動者的最佳武器。「今天無論在哪裡，當我們討論反抗，當我們討論堅持時，我希望強調的是，當下這個時代的女性如何做出了自己的行動，如何給我們提供了智慧與經驗。這些智慧與經驗可能是微小的、不被重視的，但也是珍貴的，因為這是女性的」。

Nelly 及夥伴在日本的活動雖然遭遇許多阻礙及挑戰，無論是面對無處不在的國家權力，或是網路上不堪卒睹的語言暴力，她們始終不願意放棄任何發聲的機會。「我們很多夥伴都是非常害羞、非常內向的「i 人」，很怕在公共場所引人注目，但就是這樣的人一次又一次站上街頭，勇敢地面對不確定的風險，和無處不在的誤解與侮辱」。除了示威行動之外，Nelly 及夥伴近期開始投入線下活動及聚會，透過真實的互動連結離散的酷兒女權社群夥伴，累積社群認同感。不過，Nelly 也反思目前的社群組成，包括成員及議題範圍仍無法囊括所有的族群，因此，幫助身邊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是未來社群想要努力的方向。「行動者、反抗者無法做到永遠是完美無瑕的、專業的，我們踉踉蹌蹌、跌跌撞撞地在不斷的錯誤及反思中往前走，但這些挫折不會打消我們想要努力嘗試的初衷」。

勞工、生態與社群建立

主持人 | 吳介民*

與談人 | Chen Li**、J***、綠****

記錄 | 羅琪玟*****

「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多元力量」研討會的第三場次，邀請來自台灣、香港及日本的中國行動者，分享各自在「勞工、生態與社群建立上」的離散實踐經驗和困境。

離散狀態如何推展組織工作？

Chen Li 過去曾在廣東從事勞動調查，目前從事台灣勞動組織研究及工作，首先簡要梳理了中國勞工 NGO 的發展脈絡。2000 至 2014 年間，以北京及廣州等地為中心，勞工 NGO 與關注勞動議題的行動者網絡以「公民社會理念」逐漸發展。Chen Li 指出，那般難以重現的行動者網絡榮景，較多是以「個案式服務」介入工人勞資爭議等事件，並沒有草根的團結基礎。就此而言，勞工組織作為外來者，與勞工仍然存在斷裂，團結的動能經常不是來自工人本身。

部分勞工組織工作者雖然也意識到問題，試圖更進一步關注「工人集體智慧」，但隨著 2014 年以降的政治打壓，加上公益資本化發展，勞工 NGO 空間大幅縮減，直至今日絕大多數都已結束運營或被迫轉型。Chen Li 提到：「勞工 NGO 沒有足夠時間積累工人團結的集體力量，就匆匆被抹去了。」不僅如此，許多人甚至處在離散而無法回國的情況下。那麼，如何持續開展組織工作？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 中國勞工研究者

*** 港漂社群協作者

**** 社區與社群工作者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工人教育」是 Chen Li 及其社群認為當前可行的策略。所謂工人教育，並非由「外來者、組織者或知識份子」作為教育者（這些人有足夠文化資本得以看清宰制關係），而是汲取工人客觀上所處的權力關係位置，以及主觀上的記憶、關懷等集體性與公共性經驗，以此作為團結的文化基礎，共同反抗資本主義的宰制。這些是過去勞工 NGO 較少著力的，同時也是離散狀態下可以蒐集並理解的。



會議主持人吳介民。

離散狀態下，雖然難以和工人面對面互動，但仍然可以透過網路接觸與理解。以短影音平台抖音及快手為例，當中就經常有工人分享情緒與生命經驗，即便內容相對細碎零散，但海外行動者仍可將相關經驗整理為與工人和行業相關的知識。以網路為載體的互動，也能夠減低語言／方言可能帶來的互動障礙。此外，Chen Li 也提及，年輕一代工人更為關注工安等勞動議題及權益，加上面對比上一代更嚴重的「原子化」，海外行動者可以此為契機，在提供支持網絡或經驗之際，與工人合作從事組織工作。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成令方教授則分享，或許可藉由「心理諮商」賦權。Chen Li 最後呼籲：「作為跨境移動者有種責任，就是在這種全球向右轉、保守民族主義愈演愈烈的當下，我們要清楚地指出問題真正根源，竭力於各地社會中的基層組織，不要讓其陷於保守排外的循環中。而是共同認清當代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問題，形成跨境的團結的陣線」。

離散行動者能否在地化？

J 目前在香港參與社群協作，他從自身的社群經驗出發，分享「港漂中國行動者」如何參與香港社群。J 協作的社群定位是「一群在港的，關心中國的社交、共學和行動網絡」，主要關注「性別、勞工、中港」等廣泛公共議題並採取行動。他們的社群成員不侷限於中國背景，參與者也包括香港本地人與台灣人等；關注議題上也是如此，香港在地議題也在討論範疇中。以香港外籍家務工議題為例，社群將這個勞工議題帶入港漂視野展開討論，並且邀請外籍家務工參與活動並分享自身經驗，或者加入家務工的活動。社群成員在過程中親身理解外籍家務工的生活，同時藉由成員中的新聞工作者，將議題透過媒體帶入公共視野當中。

與多數海外離散社群不同的是，港漂的中國議題行動者並非「由白紙抗議看見

彼此」再轉化為組織的運作模式。事實上，在香港的中國行動者社群一直存在，較早的一批可追溯到 1989 年。無論是選擇或被迫來港，資深中國行動者一直都是帶著自己的議題及資源，與香港本地的社運組織、社群連結和互動。

然而，港漂中國行動者要進入香港在地社群並不容易，尤其在 2019 年後，他們與香港本地人間存在微妙的互動。以勞工議題為例，許多港漂行動者因對香港議題不熟悉，起先並不被大多數香港本地 NGO 接受；2019 年後，隨著香港本土社運人士流失，以及本地新一代行動者對勞工議題興趣減低，港漂行動者才得以加入香港本地勞工機構與運動。就白紙運動來說，雖然在 2022 年當下，許多香港網路輿論對白紙運動抱持嘲諷心態，不過嘲諷之後，香港本地社群也開始想理解發生了什麼事，進而與港漂中國行動者聯繫。

J 接著強調，港漂行動者不能忽略「在地化」的重要性。實際上，港漂行動者進入香港社群或運動後，他們過去在中國公民社會的經驗，成為香港在地勞工議題開展的助力。以平台工作議題為例，港漂行動者過去參與女權及性別活動的背景，使之關注到南亞裔女性外送員在性別、階級、種族與宗教上多重身分的交織。不僅如此，關注香港外送員議題，也來自於港漂行動者過往對「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關注。總的來說，港漂行動者作為「外來者」推展了「在地」議題。J 相對樂觀地指出：「這些行動者，自己作為他者來到了香港，而他們服務的對象，這些外籍家務工、外賣員、清潔工勞工群體本身也是香港社會的他者。這些行動者在『作為他者』及『服務他者』之中，以他者的同理心，將與自己在中國公民社會的在地實踐經驗，用於香港的在地運動，主體性地拓展了香港本地議題的實踐和運動方法。這種不同地區之間的經驗及技能的攜帶，其實正是他們對於社會運動 global local 特性的一種體會與實踐，也是在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可以去探索的一個路徑，並為全球所借鏡。」

離散行動者如何扎根？

社區／社群工作者「綠」長年於東京生活，從事社區營造、地方創生、在地經濟等活動，除了分享對「在地化作為社會運動」的看法，也以自己在「後白紙」社群的失敗經驗，以及對「沖繩議題」的關注，說明對東京中國公民行動的觀察與反思。

綠提到，「在地化」是反思全球化資本主義對經濟、社會及政治等面向上造成的破壞與影響。經濟層面上，尋求更加在地且可持續的經濟活動方式；政治層面上，強調自治及草根的民主實踐，反對中央集權和國際霸權；社會層面上，則探索

新的組織形式，以及人與人的連結方式。其中，「社區」是承載一切的基礎，綠表示：「在地社區的建設本身，也就是在建設公民社會，在建設民主的基礎。」綠也認為，不僅在日本，對於任何政治活動與表達都不被允許的當前中國，「社區建設及營造」是草根可以進行公民教育和民主實踐的重要途徑。因此，社區作為在地化及社會運動的部分內容，兩者相關性大。

在幾次海外「白紙」相關集會後，「想繼續做點什麼」以維繫好不容易找到的彼此，綠與其他夥伴嘗試「做社群」。然而，過程中由於政治光譜上的左右對立，世代及性別觀念上的對立，都讓社群運作極為不易，甚至內部挑戰多於外部挑戰。經歷激烈爭執，綠以「灰飛煙滅」描繪社群分裂的遺憾，並反思：「面對社群當中持不同觀點的人，我們是否本來可以更好地調和這些矛盾？因為分裂成不同的小組，各自做行動很容易，也確實是當下可行的一個策略，但是如果一場左、右撕裂的運動，最後只是實現了左、右撕裂的民主社會，我覺得這不是我想看到的一個健康的未來。」綠認為，或許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極權社會，即使離開中國來到海外，過往被壓抑、甚至創傷的經歷沒有被治癒，造成了離散社群在獨立思考及批判性思維，以及「好好說話」的理性對話兩類能力相對匱乏。

綠因此從「社群建設」的內部及外部兩方面，提出對未來的期許與倡議。首先，在社群建設的內部，持續推進「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的共學及練習，作為療癒與自癒（self-care）的部分，不僅學習和他人溝通，也提供自己一個非暴力重新連結的機會。

其次，在社群建設的外部，同時推進建立「跨越國境」及「本地議題」的行動者網絡。東京離散社群的衝突及對立，可能不是東京獨特的問題，而跨越國境的行動者網絡建立，或可使離散中國行動者有機會分享各自的經驗。至於在全球後資本主義及東亞社會共同背景下，與日本本地行動者的連結和互動，各國的公民社會及社群可以互相啟發。以「沖繩反美軍基地」的議題為例，沖繩議題是日本左翼社會運動重要的關懷之一，涉及歷史認知、國際及國內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等內涵，綠認為複雜程度可類比巴勒斯坦。然而，沖繩因台海局勢緊張所須承擔的不確定性及風險，絕大多數沖繩以外的日本人、中國人與在日本的華人行動者，對此都是一無所知，因此造成大家在觀點上的撕裂。綠認為身為中國人有其責任，主張應從了解及感受當地人的視角與體驗出發，引入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相關技法，是當前複雜地緣政治現狀下行動者可以從事的工作。



全球公民社會的概念圖。（本圖由 GPT-4o 繪製）

結語——從離散到連結跨境：行動者與全球公民社會

2022 年底的白紙運動與海外聲援行動，是中國離散行動者看見彼此的重要時點。為了不讓對中國政治及社會的關心曇花一現，離散行動者想方設法推動社群建設。在東京離散行動者綠的分享中，建立新的社群並維繫困難重重，但仍希望持續透過非暴力溝通等方式賦權增能；過去從事勞工調查的 Chen Li 則嘗試以網路為媒介，持續理解工人、向工人學習。

不過，社群建設不僅是內部的事，「如何扎根於在地」才是社群能否持續推展的關鍵。在「在地化」過程中，「地緣政治」成為重要因素之一。吳介民提到，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行動，是當前跨境與全球性的公民社會、社群及弱勢者間的連結，運動已持續幾個世紀，不同的是，近年地緣政治成為前景變項。從香港協作者 J 的分享中可見，港漂行動者由於香港局勢的變化，在香港社會運動社群及行動中漸漸找到戰鬥位置；綠也以沖繩議題為例，說明面對日本當地社會重要議題，不同群體在台海軍事化風險的感受差異造成分裂，同樣也需要更多的溝通與對話。

離散作為一種狀態，並未完全限制行動者。新自由主義的衝擊是當前全球共通的議題，行動者及社群以此為契機，開展既可跨越國境，又可深入在地的關懷。本次活動作為其中一個小小的節點，讓來自不同地方、不同世代、關注不同議題的行動者，得以相互認識、聯繫與交流經驗，顯示跨公民社會的接觸與互動雖然困難，但十足寶貴。

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 運動策略、價值與倫理

主持人 | 沈秀華*

與談人 | 黃長玲**

記錄 | 羅琪玟***

「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多元力量」研討會，最後一場邀請到不同世代、關注不同議題，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參與公民社會的行動者，分享各自在參與和行動過程中的價值、衝突與思考。

「經驗傳承」或「指手畫腳」？

台灣作為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可以對中國公民社會提供什麼樣的價值或支持？長期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的台灣工作者小布，分享了工作過程中經常面對「提供經驗協助」與「尊重主體意識」的衝突。

小布首先提到，中國公民社會在遭受長期打壓後容易有「經驗斷層」。面對經驗斷層，通常會透過外在環境，包括中國流亡海外的前行動者及他國海外行動者，協助傳承、提供或保持經驗。

不過，一方面中國國內近年變化迅速，一兩年沒有關注，經驗就未必能再傳承；另一方面，小布也直言：「台灣經驗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絕大多數的狀況下，應該是沒可能有參照的價值，講白話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因此，在工作過程中，尊重中國行動者的主體意識及價值選擇更為重要。傳承也好，尊重也好，兩者在實際執行時都存在高度緊張——「傳承」多了，就是「指手畫腳」。那麼，傳承的意義是什麼？比起切實地給予什麼行動上的建議，小布認為，讓行動者知道每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個世代都有許多不考慮自身安危、願意站出來的人，自己並不孤單，對行動者而言就是重要的鼓舞。

「風險意識」也是小布認為在行動上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小布以白紙運動為例指出，某些行動者並不知道自己可能面對的是什麼，「一股熱血就做了下去，等到他要承擔這個後果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這個後果這麼的強。對我來說，其實聽到這句話我就覺得滿悲傷。」但這之中也存在兩難，一方面需要透過經驗傳承讓初階的新進行動者知道，如何評估風險、如何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如果講得太具體太直接，他是不是就會離開？」不僅如此，小布也提醒所謂的風險意識，除了控制風險，「評估風險」更加重要，但卻較少被討論。比如，在行動過程中戴上口罩，可以降低風險保護自己，然而這並不是風險評估。又如有些人自身的安全意識足夠，卻因為他人安全意識不足而受牽連。小布指出：「保護自己，同時也是保護自己的夥伴。」總的來說，讓行動者了解參與或組織行動可能會有什麼風險，進而自行選擇並承擔，無論在倫理或價值上都是重要的。

「白紙」的另類解讀與價值形成

現居美國的 Kevin，以白紙運動開場。他以民眾高舉白紙為例，說明中國公民社會「去政治化」的影響：雖然高舉白紙有抵抗言論審查的特殊意涵，但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能也是對於「我們想要的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們反對的是什麼？」等價值的缺少討論。「另一層意義上來說，你真的要大家在上面寫你要什麼，大家不一定真的能寫出要什麼。」這個情況與中國政治光譜的混亂也有關聯，Kevin 以過去接觸的中國勞工 NGO 經驗指出，有些中國勞工機構的人員甚至主張「中國勞工的問題主要就是政府太強大，如果我們讓市場更強大，勞工就可以有保障。」

不過，2020 年美國 Black Lives Matter 反種族歧視，以及近期聲援巴勒斯坦等運動中，海外留學生從事件中受到刺激和啟發，漸漸思考屬於自己的政治與社會價值。這些價值並不是表層的，是否要反種族歧視、是否要支持巴勒斯坦，而是應該有更深的思考與意涵。

Kevin 也指出，由於中國國內不太有公開談論政治的空間，使得許多離散社群對於「如何溝通」感到焦慮。常見的情況是，發現想法不同就不聊、不溝通，或者是以爭吵來溝通。Kevin 笑稱：「至少我的經驗中，我從來沒有因為一個爭論把別人說服過。」那麼，應該如何溝通？溝通通常有兩個目的：其一是「聆聽」，想要了解對方的想法；其二是理解組織者的立場。Kevin 認為，溝通未必是觀點上的說

服，而是可以聊聊組織方式等，將「非同溫層」的人帶入同個社群中。

自由與歸屬的矛盾？

《莽莽》雜誌的成員 Yizhen，在學校中曾經接受過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於學院與社會行動場域間的斷裂有強烈感受。Yizhen 經過探尋與摸索，梳理出屬於自己的答案：「各種的行動方式，拆分開來可能涉及到你想要覺察出一個議題或者問題，也包括對我們研究對象或者是致力於受益群體的觀察和理解；針對行動的部分，可能有包括對實證證據的挖掘，和可能的解決方案的回答總結。」這個思考，既是研究框架，也是行動思維。

相應的，作為行動媒體，與其他行動者／研究對象間不免仍有距離。Yizhen 經常感覺到自己與行動者間的立場並不相同，例如：行動者可能會有個「宣言式的口號」，《莽莽》雖然也有這個成分，但更多的是拉開距離，提供「獨立思考」的可能。然而所謂的獨立，其實也帶著主觀濾鏡。Yizhen 解釋：「研究者或者媒體報導者，並不是一個反映外在現實的東西就是完完全全的呈現，但正因為有那樣一個折射，讓光折射進來的角度，那個角度才足夠珍貴。」

那麼，這類的行動帶著什麼樣的價值？Yizhen 表示，離散所帶有的「流散」與「流動」意思，隱含了在全球行動網絡下走到哪裡都可能有你的夥伴，有可能接觸到多元的議題，同時也可能得面對「追求自由」與「尋求歸屬感」的張力。

「『自由』對應的是學術，或者媒體，或者嘗試用語言去卯釘在很多想法裡面，卯釘我自己的一種『沉思』狀態；那『歸屬』，當我與他人建立對話，我找到共鳴、找到很共同的價值，那這個其實是『行動』對話所帶來的。」兩者雖然同樣重要，但狀態的切換需要經歷許多心理上的波動，需要不斷探索並尋找內在思考與外在行動的平衡。

堅持對威權的反抗

呂頻以「想去改變在威權和性別壓迫的制度下的『人的命運』」說明自己投身女權運動的初衷。在威權／極權體制與父權體制交織下，女性的生命沒有意義，身為女性不會有任何成就，只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遵循女性既有的命運，呂頻不甘於此而進行反抗：「（女權運動）它讓我感到了自由，它讓我感到了自我實現，以及它可以讓我不斷學習。」

呂頻接著提及過往的天真：「我對女權運動有所有浪漫的想法，我覺得這就是一群最理想主義的女人所組成的，最友愛平等的這個文化，而我就是願意被這個目

標所推動著。」在這個想像下，「當我們的國家要打壓我們的運動，要讓我和我朋友相互就離散的時候，那麼我的承諾就是，不管在哪，我就是要去建立這個運動，並且和我的朋友們在一起。」呂頻看似雲淡風輕地講述過去曾經的執念。然而，面對女權主義內部分裂，尤其親身經歷最親密朋友的疏遠，以及參與者過度將自身的問題投射於運動當中，皆可能傷害運動組織者。呂頻希望做一個「正直的人」，同時面對保護自己及不把自己的脆弱投射到夥伴身上的難題，領悟到「小事追隨理性、大事追隨心靈」。

「女權運動有很多人想參與，但女權運動的組織者卻是這麼稀有。」身為一個「沒有回報，又可能承擔更多風險」的組織者，對個人而言並非基於理性的最佳決策，但呂頻仍然持續尋找更多的組織者。面對離散狀態是否轉向關注在地議題，呂頻也提供不一樣的思考：「加入民主的活動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而能夠堅持對威權反抗的人可能就比較少。」基於自身對於生命的需求，呂頻選擇堅持反抗威權，同時也保留空間「我覺得這個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素樸的渴望與行動

黃長玲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與「台大婦女研究室」召集人，首先提及曾經考慮踏入中國性別研究領域，但先後因為「反送中」和 COVID-19 疫情爆發而無法進入。不過，過去曾於世界婦女大會及福特基金會支持下，以演講、培訓等方式與中國學界交流互動。這些活動雖然看似面對學界，過程中經常遇到參與者在提問環節請教非知識性、更為實務的問題，例如：課程中怎麼和學生互動？開課的時候怎麼避免學生負面的舉止？遇到某種情況時應該怎麼做？黃長玲在這樣的過程中，感受到中國民眾想讓中國社會變得更好的「素樸」渴望。因此，每當面對宣稱「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時，黃長玲會開玩笑地表示，實際上那只適用於民主與民選體制下，因為民主就是「有一半的人自作自受，另外一半的人就池魚之殃」。沒有人喜歡活在威權／極權體制下，以此形容今天的中國，對中國民眾並不公平。

對於行動議題，黃長玲表示絕不鼓勵任何人去當「烈士」，但可以有當「鬥士」的決心：「體制就是銅牆鐵壁，可是牆倒眾人推，有力氣的時候就多推兩下，沒有力氣的時候就稍微休息一下。不要停、一直做。」黃長玲接著笑稱，呂頻是中國女權主義的第一健筆，20 年來第一次看到她的天真與低士氣。黃長玲認為，行動過程中一定會有「運動傷害」，無論是勞動或性別運動，參與者都是平凡的人，「平凡人有平凡人的喜怒哀樂，平凡人有平凡人的各種優點、缺點。所以在這個狀



另一種公民社會想像的概念圖。（本圖由 GPT-4o 繪製）

況之下，我很想要講，不用針對自己太嚴苛，但是也不用對別人太嚴苛。」

面對經驗斷層的焦慮，黃長玲以閱覽百年前中國女性雜誌的經驗指出，當時雜誌中討論的問題就和當前討論的問題相似，例如：「什麼男人都都不做家事，什麼育兒負擔。當時看到的時候，我真的有一種超寫實的感覺。」又如 2014 年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占領國會，其實早在民國初年中國婦運者為了爭取參政權，就曾揚言要「武力攻打國會」。黃長玲認為：「沒傳承才是常態。為什麼？因為這是人性，人會關心自己的處境。」然而也不必過於擔心，「我們沒有解決的問題，今天只要我們還想追求一個公義的社會，總會有人想要出來解決。」當前最重要的目標是集結，而且要「一直做，不要停」。

結語——「離散」作為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

遭受嚴厲打壓之下，「離散」似乎成為某種不得不然。新一代的行動者為了維繫社群，將社群內部的「療癒」視為社群培力與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礎。來自香港的小草回應，有些行動者過於簡單地將社群工作理解為心靈療癒的支持網絡，強調：「我們在意情感勞動的價值、我們在意 care 的價值，所以我們願意為這個社群內的其他成員去付出情感勞動，而不僅僅只是把行動者工具化。」Yizhen 高度肯定社群內給予 care，尤其當經歷過緊密聯繫的共同體解體時：「需要把自己放在一個運動的情景中，可能需要在它之中去回溯我自己在習得這一切之前，就感受到了和他人和世界的關係，我覺得是能夠從中看到我內心的衝突是怎麼演變的。」此外，即便每個人的節奏不同，都是珍貴的探索過程。呂頻則提醒，面對社會運動的殘酷與

有限能量，對個人的療癒必須有所節制，「否則會把這個運動變得私人化」。

最後，離散狀態下行動者何以認同？一位過去在香港關注中國女權運動，現已移居台灣的與會者，表達了自己在離散狀態下的認同迷茫與痛苦：「我其實已經找不到那個所謂身分，究竟是有一個邊界、有一個地域，像一個地方的公民社會運動？還是一個已經跨越地域的、一個全球，我們常說我們去抵抗一個全球的反性別運動？」Yizhen 嘗試以「我在做什麼，就是什麼」回應，表示自己也正以「我在行動」作為行動、社群與信任的依憑。面對行動社群的聚散，呂頻則回應「接受他們的離開，但是我在這裡，也許他們會回來」。

離散狀態或可作為「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但與會者觀察到，當社群遭受的外部打壓愈趨嚴酷，社群內部對待彼此的方式也經常愈加殘忍。在這樣的情況下，同時面對來自社群外部與內部的壓力，使得離散社群與行動者網絡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與談人黃長玲、呂頻和主持人沈秀華。

喂中國，我們想做公民倡議！ 以媒體和藝術作為運動方法

講者 | 志偉*、鄭宏彬*、王楚禹*、海月*

記錄 | 小蝸**

距今四年前，公民記者張展以一句「人命重要還是人權重要？」質疑武漢封城的正當性，隨後遭到國家追捕。2024年5月刑滿出獄，8月又再遭上海警方拘留，至今人身自由仍受限制。同年6月，獨立記者黃雪琴、勞權運動者王建兵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判刑數年牢獄。試想，如果「不要謊言要尊嚴」、「不做奴才做公民」也是犯罪，中國公民行動還有開展的可能性嗎？本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邀請了數名身處國內或離散在海外的中國公民行動者，從自身經驗出發，討論如何利用媒體與藝術作為運動方法，爭取公眾利益、揭露社會問題，並在全球遍地開花。

1979 年至今中國當代藝術家的運動

王楚禹認為，若要討論當代中國公民行動者如何以藝術作為運動方法，不能忽略 1979 年中國藝術家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組織的首起示威行動。當時的中國藝術家因為策展內容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題材而遭到取締，於是畫家、詩人及作家聯合起來在北京天安門遊行示威，並高舉「藝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兩大標語。¹ 這起遊行不僅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起點，同時也是未來中國公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濫觴。1989 年 2 月，藝術家肖魯在中國美術館利用兩聲槍響完成了自己的藝術

* 中國公民行動者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1 王楚禹所指的應該是藝術團體「星星畫會」1979 年 9 月 27 日於北京中國美術館外圍欄上所舉辦的第一屆「星星美展」，展品的風格及內容前衛，不符中共當時宣揚的美學規範。這場展覽遭到公安取締後，星星畫會成員便與北京各民間刊物負責人組織在天安門的示威遊行。詳見攝影師池小寧拍攝的《星星美展紀錄片》，或見 Andy Cohen, 2020, 〈池小寧和他偷運得來的攝影機〉, M+ 雜誌。 <https://www.mplus.org.hk/tc/magazine/the-story-of-chi-xiaoning-and-his-smuggled-camera/>。



堅果兄弟在北京 798 藝術區設立的農夫山泉超市。（照片來源／微信公眾號「色彩房」文章《農夫山泉往事》）

作品，這起事件一度驚動中共中央，促使展覽遭到查封，並再次激起中國藝術家的抗議行動，場面宛若八九民運的前兆。在此之後，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中國當代藝術家也做出行動上的選擇，逐漸從美術館及畫廊走向社會現實，以更加真切且更具反叛性的創作實踐，直面中國迫切的社會議題。

2010 年後，藝術展覽空間伴隨政治審查趨嚴而逐漸限縮，鄭宏彬決定以公共空間作為藝術創作的場域，同時尋求「創造性傳播」，試圖在政治審查的威脅之下，透過創作實踐的過程，將公共議題及公共訴求傳播出去，創造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我們做的這個業務項目，或者說是這種藝術行動呢，都是要

追求一個特別現實的結果。」例如，堅果兄弟在北京 798 藝術區的展間以「農夫山泉超市」為名，展示及販售數千瓶從陝西榆林小壕兔鄉當地取得的污染飲用水，最終在主流媒體的關注及調查報導之下，促使地方政府正視水污染問題，進而著手改善當地的水資源系統。這類型的社會性創作雖然偶爾也會有傳播效果不彰的時候，但這並不會影響藝術家的行動。相較之下，鄭宏彬意識到近兩年的行動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家的壓力，因此在外地進行藝術工作時，他會為了隱藏身分及足跡，刻意選擇無須登記身分的民宿，並且在完成藝術行動後立即離開當地。或者，在某些可能涉險的社會議題當中，鄭宏彬會藉由樸實無華、看似毫不稀奇的藝術行動，對社會怪象進行暗諷。具體而言，調整行為策略是行動者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同時也是藝術家腦力激盪過後的創意實踐。

離散的公民行動者——記錄及創作是療癒自我與社會的旅程

2022 年 10 月北京四通橋事件過後，一群中國青年聚集在柏林某處酒吧，在酒水及激昂情緒的交融狂歡之下，毅然決然要一起做點什麼，最終催生了《莽莽》雜誌的誕生。志偉指出，《莽莽》是由具有媒體或運動經驗的離散行動者共同創立的雜誌，其框架及運動策略很大程度地參考了流散港人創辦的雜誌《如水》。

《莽莽》首先希望記錄行動、參與行動和發起討論，並連結社群；再者是為華語寫作者提供創作平台，賦能行動者。宛若蒲公英一般，《莽莽》在全球各地播種、開花。除了在各地的飛地書店，以及柏林藝術書店 Hopscotch 與 Motto，透過刊物和講座分享運動經驗、與地方社群互動之外，《莽莽》團隊近期也在蒐集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全球聯合放映的數據，並且積極與不同社群的公民行動者展開連動合作，甚至規劃在未來舉辦公民記者工作坊，展現了超越發行刊物的目標，積攢、提升整體行動者社群能量的野心。除此之

外，志偉也強調，《莽莽》團隊「不是八九民運的星火」，因為許多行動者的動因來自於個人，或是特定的社會議題，整體講求的是社會文化性質層面的改變，相較於民運人士時常使用的「反共」或「革命」的標籤，都不是《莽莽》青年行動者的想像，同時也異於他們的運動策略。《莽莽》的標語：「高牆內外，野蠻生長」，如實反映著這群行動者跨越政治阻礙、記錄公民聲音的社會實踐精神。

抱持「藝術是可以給所有人的，是可以為了所有人的」信念，海月在 2023 年年末於東京接連舉辦三場 #MeToo 系列展，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人關注華語圈內的性暴力事件，另一方面想要透過藝術行動撫慰在性暴力事件中受傷的人們。在這個系列展當中，海月首先利用多元語言記錄性暴力事件的足跡，接著邀請參與者透過木板畫表達情緒，最後再藉由行為藝術展現受害者的憤怒，以及無懼社會目光之後的浴火重生。海月的藝術行動不止步於此，他平時也會帶著工具包，如同「打游擊」一般，隨時隨地展開木刻版畫工作坊，和參與者一起練習表達和溝通。今年三月，海月還藉由一個小型工作坊蒐集日本職場女性的困擾，在日本婦女節遊行時發放印刷品，建立與地方社群的連結。此外，海月也向溫哥華的行動者取經，在日本當地舉辦「酷兒女權脫口秀」，但卻曾因為觀眾太捧場而遭到鄰居投訴及房東警告。「所以我們決定，下次就換一個更大的地方，然後我們一定要笑得更大聲。」在與談尾聲，海月表示希望未來能經營一間華文書店，打造一個能夠容納各種人群及活動的場所，在據點中實踐交流對話及公民教育，而且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人與人



《莽莽》雜誌第二期。每期的各篇文章都提供免費線上閱讀，也在各國特定通路販售紙本。

彼此之間的信任紐帶，構成一道安全網。由於中國境內的環境已經不夠友善，海月期望在海外構築一個良好的土壤，異地培育出更多公民行動的可能性。

就教公民行動者——如何才能遍地開花

近期，獨立記者江雪一篇有關白紙運動參與者的經歷及處境的報導，遭到外部質疑其採訪倫理問題，引發了如何兼顧媒體記錄與行動者安全的討論。此外，致力於抗爭報導的獨立記者，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要如何支撐生活，是極大的挑戰。那麼，公民行動者社群如何回應這兩個困境？志偉認為，和傳統的媒體人相比，具有豐富公民行動經驗的《莽莽》更傾向於依照行動者的需求給予保護，並且借鏡《如水》雜誌第十期有關「流散媒體如何對抗國家機器」的文章內容，強調獨立媒體不一定要追求客觀中立，而是假定對某個議題有興趣的讀者會自行去觀察不同立場的報導，因此獨立媒體實際上應該要帶著立場去把一個問題講清楚、講明確，將主流媒體以外的聲音表達出來、記錄下來，那就完成了使命及任務。至於獨立記者的寫作困境，志偉指出目前已有像「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這種項目提供寫作者訓練資源，《莽莽》未來也會策劃針對初階寫作者的公民寫作培訓記錄坊或工作坊，作為支持寫作者的行動。

在過去的中國公民行動當中，藝術時常被作為運動的工具之一，2015 年的「女權五姐妹」事件便是一起令人印象深刻、結合藝術的女權行動案例。對於中國行動者而言，以藝術作為運動工具的特殊性在哪？又為何如此常被採用？鄭宏彬及王楚禹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藝術提供了幽默、震撼、易理解的感知路徑，能夠讓一般民眾更願意響應；其次，過去中共沒有將藝術視為可能的抗爭工具，而且許多藝術家是在前線公民行動者（包括勞工運動者、女權運動者及維權律師等）被捕之後才走出工作室到社會現場工作，因此至今還能夠被看見。海月則提出，由於藝術是具有想像力及創造力的力量，因此更容易為自己、他人和社會進行創造性的破局，學會表達、創造可能；再者，藝術所附帶的公共性、協同性與感染性，三者的交織能為社群帶來更廣泛的行動、社群內部的療癒，以及更多的交流與對話，可以突破異溫層的牆壁和偏見。

綜上所述，四位中國公民行動者的經驗，呈現出有別於傳統公民行動的多元面貌，他們或藉由媒體寫作，或結合藝術的行動，表達自身對中國社會與行動者社群的關懷和反思，所付出的心血使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然而，他們在行動過程中或之後所可能承擔的政治風險，也不容我們小覷。有關於中國公民行動者，甚或是中國研究者應如何在行動過程中或之後維護人身及資料安全，仍有待未來更進一步地討論。

在風險的時代撐起勇敢的空間 我們如何研究與記錄逐漸被噤聲的中國社會

主持人 | 沈秀華*

與談人 | 陳健民**

記錄 | 陳廷豪***

沈秀華教授開場時表示，面對中國政府逐漸收緊與控制公民社會，在中國進行運動或研究都成為與「風險」為伍的事。在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中，包括運動組織和行動者在運動推廣或議題實踐中，紛紛面臨了在「安全」與「風險」問題下，不能說、不能露面、難以記錄的困境。沈秀華指出：「它（中國政府），不用在場但卻影響了我的安全」。威權政體對公民社會的壓制令當前中國研究與運動遇到重大挑戰，一方面是進入中國進行各議題的田野研究變得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是在考慮安全下，許多有關中國的活動與資料都變得隱密、甚至沒有保留下來。在很難到中國國內進行研究，又有中共與國際社會極速緊張化的關係以及對台灣的越加打壓下，近年來的很多中國研究，尤其是台灣的中國研究走向，轉往對「中國影響力」的研究，例如中國對台影響力工程、銳實力等相關課題的研究。然而，沈秀華始終認為加入「離散」視角對切入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有一些中國社群在中國境外甚至內部持續推動議題，希望改變中國社會，「中國不只有威權政體……還有很多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們……一些交織性的議題存在著」。學術社群的眼光在威權政體之外，也應看見中國內外的公民行動，對當前的中國進行多元的研究與分析。而像這個會議（指「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多元力量」），透過行動者能在相對安全的空間分享他們的倡議工作，以及學界師生透過聆聽與互動來學習，希望能創造一些互信與共感。我們「除了在『安全的空間』之外，我們還需要創造一個『勇敢的空間』」，讓在威權體制中被噤聲的中國行動能被看到、甚至記錄下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來。

沈秀華接著拋出疑問：如果交流也是一種支持的方式，如何讓每次珍貴的互動與交流超越僅是當下的活動，而能成為可以被傳承與記錄的經驗，乃至於可以成為將來可參考的經驗，讓中國公民社會的運動與未來的中國研究得以持續走下去？

陳健民教授延續「離散」的概念，指出胡溫時期的中國其實也有「場內／場外」的運動格局。當時「場外」的行動者，比如港、台、美的華人社群，透過培訓、基金會與研究的方式，支援「場內」的行動者、NGO，彼此之間建立了緊密且深刻的互信模式與默契。過去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了「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透過沙龍、講座、培訓等活動，讓中、港、台的 NGO 與行動者彼此交流並建立網絡。陳健民描述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經驗：某一次他帶著一群中國與香港的 NGO 夥伴參觀台灣景美的人權紀念園區時，一名工作者看見過往監獄與拘留所的歷史實況後當場痛哭，因為這是他首次可以想像那些因為運動而被警方帶離的夥伴，可能遭遇到什麼樣的對待。

我是誰、我如何書寫「中國研究」

現場一名與會者提問，「我們如何書寫」的問題涉及了研究反身性的問題，一個人的認同在研究過程中是否會受到「被研究者或是其他人的認同，乃至研究成果」的影響？沈秀華在回應中首先肯認人的交織性與多重身分認同的可能，也認為不同的身分確實會影響研究者在面對同一問題或經驗現象時，發展出不同的理論視角與研究論述。舉例而言，當前台灣社群對於中國的認識和興趣，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抗和緊張局勢，從而發展出以中國影響力為目標的研究重心。

另一名與會者提問，當前香港的研究空間是否因為港版國安法而有所限縮？陳健民教授回應指出，目前港版國安法對公民團體最大的壓迫主要集中於人權、政治相關的運動團體，這些組織面臨著被直接解散的風險。至於沒有直接相關的團體，乍看之下還有正常運作的餘裕，實則也逐一被清查過往的歷史紀錄與發言，一旦被發現曾參與 2019 年的抗爭，或者和特定團體、運動者有接觸，輕則將難以申請各式官方經費，重則被強制解散，所以實際上在香港，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互信、倫理與責任——研究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思與行

一名參與者對於「研究」中國公民社會，提出根本性的質疑與反思，他認為當前對於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普遍呈現出研究者逕自向公民社會、行動者與組織單

方面求取資料，研究成果對於公民社會的積累、成長與行動卻幫助不大，甚至公民社會的行動者也無法介入研究者的詮釋過程，這種研究其實不啻於單方面的剝削與無酬勞動，反映了社會與學術社群之間的權力不對等。



沈秀華及陳健民對談。

面對這項深刻的批評，清華大學社會所吳介民教授回應指出，學界對於研究者將「社會」視為研究對象，並（不自覺地）進行剝削式的資料索取，或許沒有形成統一的文本，但卻散見於各種討論與學理反思中。吳介民以自身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動者的角度，分享在「研究者／被研究者」之外的研究想像。他認為關於運動研究的經驗更多時候是「互為主體」的實況，由於本身也深度地參與，基於倫理與情感，反而不忍深度書寫內部的情節。

一名與會者指出，研究者不只該反思如何讓研究回應學術，也應牢記「不要擅自為被研究者代言」，更重要的是，從事中國內部抗爭者的研究時，不能只強調行動者的「樂意被看見」、「想要被理解」，卻忽視可能有的未知風險以及當前中國公民運動缺乏經驗傳承的現實。研究者在建立互信的過程中，應該主動並充分告知年輕世代的中國行動者參與研究的風險，這既是研究者的倫理，同時也是深化雙方信任與關係的重要工作，畢竟當前的行動者未必意識到自己具有 NGO 的身分，更有可能只是當下出於良知而做出的行動，並沒有設想到後續的安全隱患；身為研究者，善盡提醒的義務，是不可迴避的倫理問題。另一名與會者從實際的資安層次提問，在緊張的中國局勢之下，有志於繼續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研究者，是否應該正視研究過程中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的問題，否則不僅無益於協助中國公民社會，反而令行動者陷入「被拖後腿」的風險中。

在熱烈的討論中，沈秀華指出，所謂的風險其實具有雙向性，在當前的中國，不只被研究者，研究者也同樣面臨風險，在這種「冒著風險的互信」之下，期待行動者之間看見彼此，領悟到「有人跟我一樣正在為了更好的社會努力著」。

座談會的最後，在逐漸收束的討論中，眾人紛紛同意在當前的研究場域中，一名好的學術工作者在進行研究時，不只關心「對社群重要的問題」，也應將自己的學習與積累的成果，和所研究的社群分享，讓雙方都在研究的過程中受益成長。期待本次座談來自各方深刻的對話和回應，能夠成為未來中國研究社群、公民社會在風險與安全隱憂中，構築「勇敢空間」的重要基石。

《烏魯木齊中路》電影放映與現場討論側記

記錄 | 碩三同學

「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多元力量」國際研討會結束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於6月1日進行了《烏魯木齊中路》的紀錄片放映及現場討論，來自世界各地關注中國離散議題、公民社會與女性主義的與會者一同欣賞電影和參與討論，並邀請其中一位擔任主持人，引導觀影者發表感想。

紀錄片拍攝及敘事

對於紀錄片拍攝及敘事，來自政大的老師首先比較這部片與《備忘錄》：¹

我剛好去年在政大放了那個《備忘錄》，我覺得兩部片有一個滿大的落差，《備忘錄》沒有那個那麼強的旁白敘述，就是它讓影像有比較多說話的空間……[烏魯木齊中路]的旁白敘述給我有一種壓迫感，就覺得它好像有一個比較大的、比較一致的論述傾向，所以我自己看了有點驚訝。當然可以理解，在那個現場會覺得要用一個方式去把故事說清楚，但是可能已經隔了一年多，回頭再看的時候，我反而覺得那個旁白的這個軸線，我覺得有點太強烈。可能兩部片放在一起對比也不是很適合，但的確就是因為它都是事後用很多短視頻去把它拼接起來，然後重新去敘述那個當下的狀態。

一位海外的白紙運動參與者對電影做出回應：

我是在中國的行動者志偉，我也曾身處在這個白紙運動爆發期間。我主要在義大利和德國那邊活動，我們在海外組織集會去聲援。這是我第五遍看這個紀錄片。第一遍看的時候會覺得涕泗橫流，非常的感動，整個就感覺就回到了運動

¹ 《備忘錄》是由窮山惡水電影小組拍攝、以2022年上海封城為題材的紀錄短片。



《烏魯木齊中路》電影放映現場。

那個時候；第二遍看的時候會覺得有點意猶未盡；第三遍、第四遍的時候才會開始重新去審視這部片，它這個敘事跟我們當時的敘事是完全一致的嗎？第五遍的時候會再思考一下，好像這部片有很多不滿、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好的地方，很多朋友第一次看都能感覺到，但是我覺得它很多不足的地方，第一個是在敘事上，它在敘事上其實很缺少。這個火災其實最早死的是維吾爾人，裡面的幾位遇難者都是維吾爾人。但是對於新疆事件，它幾乎沒有很多的敘述。當然這跟素材有關，這個導演他可能沒有辦法接觸到裡面的素材，所以我們在全球映後的時候，一般會放一些新疆集中營之類的相關內容，去補足這樣一個視角的不足。

三種白紙運動與運動原因討論

來自中國各地離散的民運人士發表了對於幾種「白紙運動」的差異，例如志偉表示：「他其實過度地把「白紙運動」去跟國內的「反清零運動」及「海外聲援活動」放在一起，但事實上在我們當時組織活動的時候，這三個運動的脈絡，它的傳播方式、動員策略可能都不太一樣」。

一位台灣的白紙行動者對於區分不同的「白紙運動」發表了觀察：

我白紙的時候在台灣，然後也有在自由廣場辦一個活動。我看完紀錄片，覺得上海的整個行動的脈絡、事情的經過還原的很好。但是也看得出來這是一個有點「反賊主旋律」的影片吧；也呈現的比較是一個「中產的上海」，作為城市視角的一個觀點。

但我不覺得這有問題，因為我覺得就是導演如實地拍出他所感受到的、經歷到的，這是對的。影片中其實也帶到當時富士康的抗議，富士康工人的抗議歸結為「薪酬問題」及「富士康工人反抗封控」，但是這一點其實與我們後來跟一些富士康工人做的訪談是有出入的。基本上，他們的問題主要還是圍繞在長年勞務仲介、非正式雇傭，以及薪酬上的欺騙問題。

關於封控的話，其實富士康的工人更早一波有一個大逃亡，應該是 11 月底或 10 月底的時候，那時候工人的訴求其實與白紙會有一定的矛盾性，工人的訴求是因為工廠不夠嚴格的執行封控、不夠科學的且有效的管理可能生病的工人。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談白紙的話，這個階級性也是其中需要注意的。

對於不同種類的白紙運動，中國女權主義行動家呂頻分享了看法：

我覺得確實有兩個白紙運動，一個就是富士康的工人與城中村居民的白紙運動；以及發生在北上廣大城市裡面，比較有資源的城市居民的一個鬥爭。我覺得這兩點之間肯定是有關係，都跟 COVID-19、清零是有關係。一個鬥爭迅速的政治化，甚至喊出了「新聞自由」這樣的一種口號；而另一個運動始終停留在解決他們的勞動條件、吃飯這麼一個基本、沒有那麼可見的政治化。

呂頻認為這兩個運動都是在回應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後的中國社會，值得被讚許的點是，這兩次事件並沒有被中國政府無所不在的預防性鎮壓所取消。然而，也需要看到運動的後續發展，包括北京及上海組織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會因此被中國政府識別；縣城內持續不斷的抗爭是身體性的、不是非暴力的，雖然運動並沒有政治化，但在維持「不被黨國所決定的」、「非確定性」方面，也同樣值得被讚許。

一位來自東京的白紙運動推廣者分享了在東京發起集會運動的經驗，指出海外的白紙運動是兩者的「中間態」，從混亂的集會開始，到學習香港人組織街頭運動，擬定出「多元化、盡可能容納各種政治光譜」的運動策略。東京的活動現場確實也出現關心中國的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群，包含諸夏獨立、法輪功、新唐人及綏靖派等不同政治主張的人員。但是當白紙運動降溫、封控解除時，這些過去集結的人

群也開始分裂，如女權及部分民運的支持者產生矛盾。

主持人最後總結三場白紙運動的脈絡，並且提出可以參考左玥寫的〈白紙抗議集結的三股力量：理解中國 2022 社運抗爭局限與革命性〉。主持人雖然並不完全同意左玥的觀點，仍然認為有助於了解三種運動的區別。

一位現場聽眾對於地方政府在白紙運動的角色，提出個人的猜想，認為在中國網格化管理如此嚴格的地方，白紙運動得以爆發可能蘊含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角色。中國的運動參與者則回應，年輕人上街是「流水化的」，不是什麼組織帶領的，接著提出了一個描述當下年輕人狀態的二維模型，² 認為白紙運動參與者可能是由「潤」³ 及「躺平」⁴ 的人所組成。

一位來自中國的女性參與者重新整理了大家的意見，認為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各有不同的原因，但都表達了對封控的反抗，以及白紙運動之所以能持續一段時間，地方官員在其中確實可能扮演了某種角色：

因為中國的基層政府到地方政府，從省一級到市一級，他們被封控政策、被解封之前的各種應對疫情政策，已經折騰得精疲力盡。可以說是官不聊生，堪比民不聊生，除了物質上豐富等一些特權以外，他們有更多非常悲慘的遭遇。有的為了執行政策甚至面臨跟家人幾個月的分離等等，他們只是敢怒不敢言。所以這裡頭我覺得也有他們的原因，雖然他們是那個作惡的環節當中重要的一員，但同時他們也是直接受害，情況可能不亞於普通人。

這位參與者也強調，這場抗爭突然被看到，與話語權、載體、教育程度、國際連接都有所關聯。

2 二維模型的水平軸為「不合作—合作」，縱貫軸為「積極—消極」，因此區分出了四個象限。積極且合作者為「卷」（無意義競爭）、不積極且合作者為「韭」（韭菜，被收割）、積極且不合作者為「潤」（run，移民）、不積極且不合作者為「躺平」。

3 潤是英文 Run 的諧音，大致上有「跑路」、「移民」的意思。潤學為中國迷因用語，主要描述離開中國、移民的各種方法。

4 躺平是 2021 年中國的流行語，表達與世無爭、不思進取的生活態度。更具體的話是描述 1990 及 2000 年出生的年輕人「不買房子、不買車子、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孩子、維持低水平消費的生活方式」。

白紙運動的傳播工具與符號

討論到白紙運動的發展時，運動參與者也注意到了社會運動發展的方式與符號有關：

我覺得那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我想到說社會運動需要什麼？或者說一個成型的、能夠有影響的敘述是什麼？這種敘述其實就是符號。

比方說白紙運動有一張白紙，這個白紙就是符號，符號背後代表著身分認同，代表著動員策略、口號選擇。如果我們想到台灣的社會運動的話，野草莓、野百合、太陽花、青島，大家都會有些符號。想到太陽花就會想到黃色的這個顏色……我們提到反送中的時候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當時在 2022 年底，10、11 月的時候中國的行動者，尤其是在海外的行動者，其實我們很難找到這種現成的符號資源。那麼這種符號資源，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往往是因為我自己在組織集會的時候，我們要選口號、我們要選歌、我們要選怎樣的海報，都是非常切實的。

那當時唯一能用的資源主要是兩個：第一個是六四時代留下來非常老的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非常老舊，已經無法反映當下行動者所期望的東西了。

第二個是彭立發留下來的口號，⁵ 這個是我們用最多的，同時也是我們自己在思考、掙扎的。我們將之作為身分認同是很糾結的。

……白紙這樣一個符號出來之後，大家就非常的狂熱、激動，我們終於有一個自己的口號。我們也發明了很多原創性的口號，後來在海外的行動者當中有一定程度流傳。當時我在柏林的時候，大家會提出有一個很常見的口號，叫「體制不變，悲劇重演」。

白紙運動爆發後過一段時間，大家才有時間沉澱出我自己到底要幹什麼、我們組織的訴求是什麼？還有左翼的夥伴他們就提出另外一個口號，叫「拒絕菁英主義，尋求普遍共情」等等，這樣的口號終於開始一點一點去流傳下來。酷兒女權的夥伴也開始把自己的訴求明確，去說「父權不死，暴政不止」。

這些口號是在白紙運動，或者浪潮稍微有一些平靜時，比方說 11 月底至 12 月

5 「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不要謊言要尊嚴，不做奴才做公民」，是 2022 年 10 月 13 日彭立發（網名：彭載舟）在北京四通橋上掛起的橫幅，被視為中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少見的公開抗議活動。

初的時候，這些口號在海外才被總結出來，大家才把它變成符號。大家也會有各種彩色的設計，藝術設計也開始流傳。我覺得這個符號化的過程反映了我們在海外的一個政治化的過程。

當討論到「白紙」作為運動的符碼時，參與者表示這來自於會被刪文的微信環境，「白紙代表的是沒有東西說，你要如何扣帽子」，是一種創意的展現。一名台灣的白紙運動者分享自己的經驗指出，當時曾使用李文亮、⁶吹哨者作為符碼，顯示台灣及中國在社群媒體上對於議題接收速度的落差還是相當大。其他台灣參與者則分享，當時曾使用「哀悼烏魯木齊死難的同胞」及「聲援國內的抗議者」的形式進行，並表示海外的運動者可以不用侷限在白紙的符號上。

除此之外，會中也討論到海外運動人士的消息來源往往是 Telegram 上的交流，「當時的策略就是 Telegram 群，行動完立刻解散。這樣的話就不留下任何的證據。Telegram 開加密，基本上就是聊完之後你也不知道這個人在哪，你也不知道他是誰」。深圳的白紙運動者補充，他們同樣缺乏街頭經驗和運動策略，有人在微信發文或現場發海報，但也有過到現場後，才發現沒有人出現。原因是網路上真假訊息難辨，並且擔心是警察藉此釣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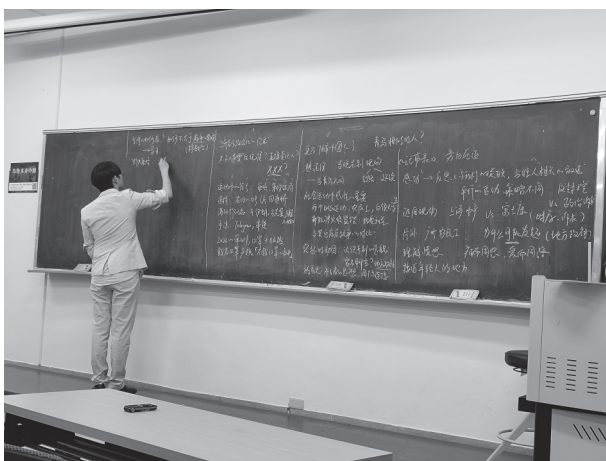
「白紙運動」對照「青島行動」

本場放映會舉辦之際，台灣立法院的爭議正持續蔓延，⁷ 因此台灣及中國行動者將兩個運動進行比較。一名曾親自去白紙運動現場的中國交換生說明兩者時間和動力的不同：

我想把這樣的事情，聯想到青島東路。因為我當時去（白紙）的時候是星期天的晚上、星期一的凌晨。跟我一起在路邊的人，他看到我這樣來，便跟我聊了

6 李文亮醫生於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微信的私人聊天訊息中發出「類似 SARS 病毒」等文字警告，成為最早向外界披露嚴重傳染病的醫生，被稱為「疫情吹哨人」，轄區派出所曾命令他簽署自白書，自白病毒陳述並非事實。李文亮後來不幸感染病毒過世，官方追封他為烈士。疫情後仍然有許多紀念活動，但也持續遭到中共打壓。

7 新一屆立法院在 2024 年 2 月 20 日開議後，中國國民黨及台灣民眾黨聯合提出「國會改革法案」，由於內容引發爭議，包含國會擴權、民主失衡、中國介入等多項議題，導致 5 月 17 日院會中激烈衝突，以及後續立法院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被視為太陽花運動後最具規模的街頭社會運動。



與會者討論的黑板筆記。

兩句。他說：「哎呀，現在都沒人了，因為大家都是社畜，要上班、要上學的。」我理解的是，大家只有在週末那樣短短的時間，有空去做這樣一個抗議，然後一到工作日，中國人就非常自覺的回到家裡，要準備新一週的勞作及工作了。可是我上週五就有去青島東路，也知道大家在青島東路立法院聚集是週二及週五的事情，我就覺得很好奇，覺得也是工作日啊，也是週二、週五晚上，但是會有那麼多人，下班以後也要趕過去。可能台灣這邊發展社會運動是非常成熟的一片土壤吧。

在場的與會者也包含台灣的 NGO 組織，分享了 NGO 視角的青鳥行動，指出台灣的 NGO 之間彼此有信賴感，也有充足的聯繫，因此可以在線上群組討論後迅速分工，在一個晚上搭建出許多舞台，同時也注意到「大台」⁸的問題：

NGO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都很有意識，譬如說要讓更多人、更多 NGO 發言，而不是主辦的哪個團體，比如經濟民主聯合。他們一直想到的事情是更多的 NGO 可以發言，同時也希望有公民論壇。

即便是在舞台上，可是在現場你會看到，因為人來的真的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他沒有辦法看到舞台上說話的人，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最外圍的地方，有更多非常草根、非常有創造力、非常豐富的表演、音樂，甚至在那邊會有人幫忙按摩。

8 2019 年的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強調去中心化的組織方式，沒有統一的領導，被稱為「無大台社運」。

接著也分享濟南教會、⁹ 志工、準備食物、醫療緊急通道等多樣分工，以及 NGO 對於「退場機制」的討論。

一位參與者嘗試比較「青島行動」與「白紙運動」，認為其中一個關鍵點在於「青島行動」有成熟的生態、有 NGO，有「大台」及退場機制，而白紙運動當下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街頭策略」：

就是一群人，他們到了現場以後成為了一群人。在到了現場之前，他們認識嗎？他們也不認識，他們之間什麼聯繫也沒有。他們就是懷著那種對於專制的認識，以及切身的那種體會，然後走到了一起。那一天就突然出現在了一塊，然後進入那個現場。他們有的可能後來有通過 Telegram 這樣的形式，保持聯繫，但是更多的可能也就是回歸了生活。

此外，青島行動的公民「信賴感」很重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而白紙運動的現場是從零開始。

主持人在活動最後摘錄所有討論並做總結，包含海外的白紙運動可能早於中國國內的廣義形式的白紙運動，從簡單的聲援到初步的組織化，再到後來女權與民運的對立。這也補充除了農民工與大學生的「白紙運動」外，海外推動中國議題運動的各種形式。此外，在白紙運動中「性別和女權」成為其中一個關鍵字，從影片中可看到參與者的氣質與口號，其實與女權分不開；甚至海外的社群中，很快出現民運與女權人士的對峙，也與過去女權行動派，¹⁰ 以及近十年來中國網路上對性別的關注無法脫離，認為這是理解白紙的另一條線索。

至於白紙運動為何能被大家看見？其一在於中國疫情三年的封控抗議是全球罕見的；其二在於影片中白紙運動參與者的特殊性，例如有上海的經濟資本、有對外網絡，北京的抗議有記者的社群和支持網絡，這些都成為白紙運動能被看見的關鍵原因。

9 發言者表示，濟南教會是台灣抵抗威權重要的據點，加上優越的地理環境讓後續的食物、志工、醫療等服務，有據點可以運營。

10 中國的青年女性主義推動者，從 2012 年起，以行為藝術等方式在公共場合表達性別平等的訴求，與媒體合作、公開問責、抗議性表達為其特色。

上海遊戲展的田野觀察 獨立遊戲開發者的生存可能

田野地 | 上海市*

撰稿 | 潘雅鈺**

如果想要考察電子遊戲產業，又苦無領路人的話，那麼主動前往一個聚集遊戲開發者及相關從業者的場合，或許是明智的選擇。在參與過台灣電子遊戲產業的展覽活動，並且與台灣遊戲開發者對談之後，我不禁接著好奇：中國遊戲市場有何特殊之處？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如何鑲嵌於中國市場？於是，當第 21 屆中國國際數位互動娛樂展覽會（ChinaJoy）即將在上海舉辦的消息映入眼簾，我片刻都沒有猶豫，手起刀落，便已經購入一張來回機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凱米颱風竟於 7 月 25 日凌晨登陸台灣本島，導致我原定當日中午班機被迫取消，於是「頭鐵」¹的我決定豪賭一把，改買當日下午航班，一邊聽著機場地勤延遲廣播，一邊懷抱著焦慮的心情在候機室內等待。在預定起飛時間的一個小時後，一輛滿載的波音客機終於趁著凱米颱風不注意，順利地從桃園機場起飛。好佳哉（hó-ka-tsài），否則就打亂了我規劃已久的田野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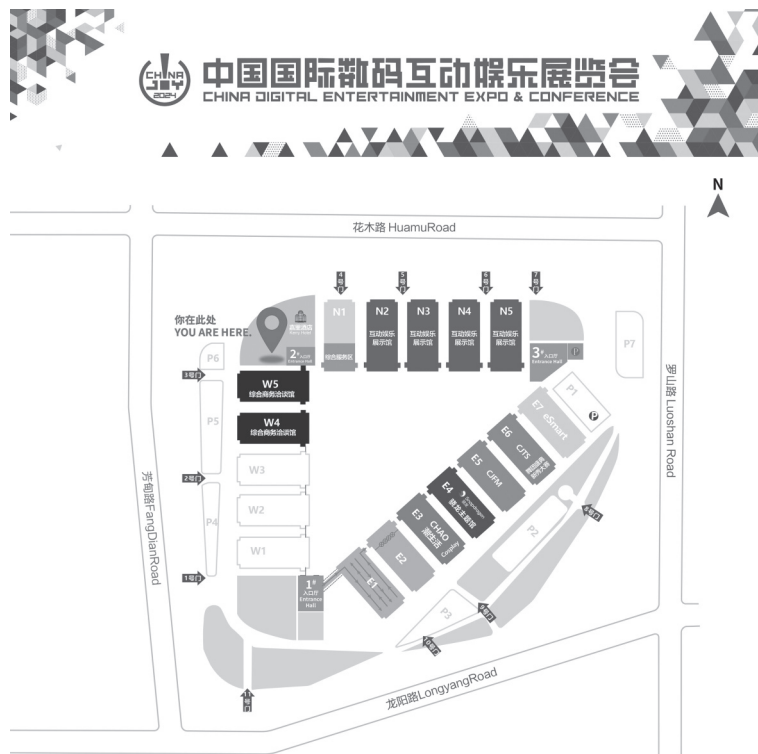
中國一年一度的最大遊戲盛會——上海 ChinaJoy

隨著電子競技運動在 2003 年末被中國政府列為第 99 個正式開展的體育運動項目，以及 SARS 疫情逐漸趨緩，首屆 ChinaJoy 順水推舟地在隔年 1 月於北京舉辦，也是中國首次舉辦的大型遊戲產業展覽會。自第 2 屆始，ChinaJoy 轉為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展會規模也逐年擴大。以本次田野經驗為例，第 21 屆

* 田野日期 2024 年 7 月 26 至 29 日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1 「頭鐵」是中國的網路流行用語，顧名思義是指一個人的頭就像鋼鐵一樣堅硬，時常被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性格固執、倔強，即使面對困難、錯誤時仍堅決不改變原本的決定。



2024 年 ChinaJoy 場館規劃圖。N 館及 E 館為 B2C 展區，W 館則為 B2B 展區。兩個展區互不相通，玩家必須分別購票才能進出。

ChinaJoy 於 7 月 26 至 29 日舉辦，展出面積達 13 萬平方公尺，B2C 及 B2B 展區的參展企業超過 600 家，參觀人流則達 36.7 萬人次，與首屆 ChinaJoy 相比，規模可說是成長了整整 6 倍以上。²

除了展覽活動之外，ChinaJoy 官方也舉辦「中國國際數位娛樂產業大會」（CDEC）及「中國遊戲開發者大會」（CGDC），邀請中外遊戲從業者座談討論，目的是傳授遊戲產業新知，並為遊戲產業從業者建立一個線下的交流平台。由於行程及預算的考量，我僅參與 ChinaJoy 的遊戲展會。³ 在長達四日的 ChinaJoy 盛會中，我於 7 月 26 及 28 日分別持普通早鳥票與 VIP 玩家票前往 B2C 展區，7 月 27 日則持專業觀眾證前往 B2B 展區。

第 21 屆 ChinaJoy 開幕首日，我在上午九點抵達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在正

² 首屆 ChinaJoy 於 2004 年 1 月 16 日開幕，布展面積為 2 萬平方公尺，分作兩個展廳，連三日的盛會一共有 100 家中外廠商參展，僅吸引了不到 6 萬人次參觀。

³ CDEC 於 7 月 25-26 日舉辦，CGDC 則於 7 月 26-27 日舉辦，兩場研討會不但撞期 ChinaJoy 的遊戲展會，而且光是單日聽課證就要價 1,800 元人民幣。

式進入館內之前，官方便在館外場地以白鐵柵欄圍成一道 S 型的排隊通道，持一般票券的玩家得頂著豔陽徒步大約 1 公里，並且在「預檢票處」經保安檢查身分證件及報名資格之後，才能依序排隊進入有遮陽屋頂的 1 號入口廳，不過在這裡迎接玩家的是又一道的「」字型排隊通道，最後才是安檢處與正式檢票處。⁴ 持中國身分證者可以刷證逕行通過管制閘門，持台胞證者得走人工通道，檢票員會透過手中的掌型機器輸入台胞證號後，才啟動管制閘門。此外，每一位進場的玩家都必須在管制閘門前透過機器掃臉，留下出入紀錄。

持普通票及 VIP 票的玩家可出入 N2 至 N5 館、E3 至 E7 館共 9 個 B2C 場館。大部分的場館由全球知名互聯網企業與遊戲企業插旗，包括中國的網易遊戲、騰訊遊戲，日本的萬代、索尼、任天堂，以及歐美的育碧、暴雪娛樂。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獨立遊戲作品掛靠在合作發行商的展位，或是由獨立遊戲開發者自行租用小型展位經營。不過，後者往往位於展館兩側邊緣，願意駐留並體驗遊戲的玩家也遠不如在大型展位闖關領贈品的玩家來得多。

這次的田野，我是有備而來，特地要來尋找在 ChinaJoy 參展的台灣遊戲開發者。我好奇，台灣遊戲開發者如何看待中國遊戲市場？又如何與之互動？然而，當我懷著忐忑的心情走近中國遊戲公司 4399 的展位時，除了失望以外，更多的是詫異。儘管在這裡找到台灣獨立遊戲作品的掛靠展位，但除了負責看顧展位、發放活動闖關贈品的工讀生之外，這裡找不到任何一名遊戲開發者。這與我在台灣參與遊戲展覽活動的經驗完全不同。在台灣，無論是參與台北國際電玩展、G-Eight 遊戲展，或者是更小型的遊戲社群活動，玩家通常都能在展位上與獨立遊戲開發者近距離互動。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完全忽略了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前往中國參展所必須負擔的成本，始終以在台灣做田野的思維評估此次前往中國的預期收穫，實在是太過於粗心。⁵

4 相較之下，持 VIP 票券的玩家是從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西北邊的 2 號入口大廳入場，不需要頂著豔陽高照在館外排隊，能快速進入館內通過安檢及檢票口，但好處也僅止於此，與普通票的價差約兩倍。具體而言，2024 年 ChinaJoy 的超級早鳥普通單日票為 150 元人民幣，普通單日票是 180 元人民幣，VIP 單日票則是 350 元人民幣。

5 在上海尋找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失利後，我轉往訪談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他們都告訴我，參與線下活動的移動成本實在太高，平時都得算著口袋裡的錢，再三衡量，另外還得看看合作發行商是否願意贊助。至此，我才茅塞頓開。

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與中國市場

俗話說的好，山不轉路轉。當我發現田野限制時，我立刻將此次的田野重心轉移到中國的「獨立遊戲」開發者身上，並試圖探問中國遊戲市場的制度環境為何？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如何投入獨立遊戲製作？

我在場館內尋找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時，曾一度迷路，不知道應該從何找起。這是因為 ChinaJoy 未在 B2C 展場中規劃獨立遊戲專區，也未在展商名單上標註獨立遊戲作品，因此我只能在 9 個展館內實施「地毯式搜索」，最後發現那些看起來相較「寒酸」的展位，往往是獨立遊戲作品。誠如前述，由於獨立遊戲作品的展位散落於展館兩側邊緣，玩家注意力又容易被展館的中間舞台吸引，因此獨立遊戲作品特別容易被忽略，展位總是門可羅雀。不過，位於 N5 館的「ChinaJoy Express」展區則因為設計鮮明，⁶ 且提供 47 款遊戲作品體驗（其中不乏獨立遊戲製作），從而吸引不少玩家駐留，我也終於找到幾位願意提供寶貴意見的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

從遊戲展覽的場館規劃上，不難看出台灣與中國遊戲市場對於獨立遊戲作品的態度差異。即使台北國際電玩展的整體展覽規模不比 ChinaJoy 來得盛大，但是分別在 2014 及 2016 年起，於 B2B 與 B2C 展區設立獨立遊戲專區，讓從業者和玩家能明確地識別獨立遊戲作品。2024 年台北國際電玩展在 B2C 一共邀請了 16 個國家、123 家獨立遊戲團隊、超過 150 款獨立遊戲供玩家體驗。相較之下，同年舉辦的 ChinaJoy 僅在 B2B 展區設置獨立遊戲專區，並提供 120 個獨立遊戲項目展示。另從參展費用來看，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小希向我透露，在 ChinaJoy 的 B2C 展位中，一個僅能擺放一台電腦的展台，光是「友情價」便需要耗資 3 千元人民幣；⁷ 相同大小的展位，在 2024 年台北國際電玩展中，則僅要價 3 千元至 1 萬元新台幣不等。⁸ 由此看來，台北國際電玩展對於獨立遊戲作品的支持度及友善度更

6 據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阿山所述，「ChinaJoy Express」是 ChinaJoy 官方首次新增的獨立遊戲展區。（訪談於 2024 年 8 月 3 日）但據我觀察，ChinaJoy 官方並未將「ChinaJoy Express」對外宣傳為獨立遊戲展區；同時，該展區也存在不符合獨立印象的遊戲開發團隊，所以我仍然認為 ChinaJoy 未擁有一個完整的獨立遊戲展區。

7 訪談於 2024 年 7 月 27 日。另一名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夢夢告訴我，他以原價 5 千元人民幣才租用到與小希相同的展位。（訪談於 2024 年 7 月 29 日）

8 台北國際電玩展有提供獨立遊戲開發者優惠的參展方案，以 2024 年為例，官方依照報名資格、展示規格、官方聯宣曝光的差異，提供獨立遊戲開發者四種方案：學生方案 3 千元，標準開發者方案 1 萬元，進階開發者 3 萬 2 千元，發行商方案 6 萬元。

高於 ChinaJoy。⁹

考量 ChinaJoy 場館規劃的不同，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更願意待在 B2C 還是 B2B 呢？似乎取決於開發者更想接觸到的客群是玩家或是廠商。不過，每一位開發者都向我強調「尋找合作廠商」的重要性，以及期望透過這次的參展接洽到更多合作廠商。合作廠商除了能夠提供一筆預付款，支持遊戲開發團隊持續營運之外，同時也協助遊戲作品的行銷宣傳、本地化工作，並且處理最困難的「版號」申請流程，讓開發者能專注在遊戲開發事務上。

根據中國政府出台的《電子出版物管理規定》及《網路出版服務管理規定》，任何媒介與形式的電子遊戲於中國市場發行之前，都必須事先向地方出版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後，才能再報請國家新聞出版署審批，並在正式獲得「遊戲版號」以後，始得發行。一般來說，版號的申請流程大多得耗費 2 至 3 年時間，倘若不幸，還可能遇上政府停發版號的特殊狀況。¹⁰ 因此，考量申請版號需要複雜的手續、長期的等待時間，以及高額的委託費用，許多獨立遊戲開發者選擇交給合作廠商處理。

有鑑於國內版號申請的限制，許多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優先選擇在海外數位平台上架遊戲作品。全球最大的電腦遊戲數位平台 Steam 不但為遊戲開發者提供簡易的上架程序，更僅收取大約 100 美元的低廉手續費用，對資金有限的獨立遊戲開發者而言，絕對是實惠的選擇。此外，對中國遊戲開發者而言，在 Steam 上架遊戲，不但不影響中國玩家購買遊戲，同時也能夠在全球市場中試水溫，而且最重要的是能規避內容審查。¹¹ 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小鳥直言，即使他們的遊戲作品獲得不少國內玩家的正面回饋，但開發成員都心知肚明，遊戲內容根本不可能在未經修改的狀況下過審，因此他們早就放棄「申請版號並在國內數位平台發行」的念

9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台北國際電玩展與同年 7 月舉辦的 ChinaJoy 一樣，有四天展期，而且最終累積入場人次同為 36 萬人次，市場熱度並不輸給 ChinaJoy。

10 例如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 2018 年 3 月 29 日發布《遊戲申報審批重要事項通知》，聲稱因機構改革，全面暫停所有遊戲版號的申請及發放，一直到同年 12 月 19 日才解禁，改由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審批與核發版號，但僅限於國產遊戲，一直到 2019 年 11 月才准許進口遊戲經審批後核發版號。

11 中國國內發行電子遊戲的內容限制可見中國《電子出版物管理規定》第 3 條，以及《網路出版服務管理規定》第 24 條規定。

頭。¹²

結語——田野的倫理考題

我在這次 ChinaJoy 的田野過程中，雖然未能依照原定計畫觀察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與中國市場的互動，仍舊獲得許多啟發和收穫。首先，隨著原先的田野目標宣告失敗，讓我擁有了慘痛卻珍貴的田野經驗，提醒我未來必須更謹慎地規劃田野，如此才能確保取得研究所需的特定資料。相對地，我對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前往中國市場的抉擇，也更加好奇。為什麼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決定進軍中國市場，卻不親自到中國市場參展？經濟成本是他們的唯一考量嗎？又有哪些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會選擇親自到中國市場參展？為什麼？

其次，結識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讓我能夠進一步地以當地遊戲開發者的角度，理解中國遊戲市場的制度環境如何引導他們的行動。我看見他們在嚴峻的政治環境中尋找縫隙，試圖透過遊戲作品發聲，實現中國社會裡愈來愈隱微的自由與公正；也看見他們擔憂國家機器的現身，因此再三斟酌說出的每一句話，生怕對話會帶來任何差錯。相較之下，曾有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再三強調，他並不擔心中國市場的審查，甚至認為中國市場比起台灣更加自由。¹³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台灣與中國獨立遊戲開發者的想法落差？中國市場的審查制度如何對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發揮影響力？

最後，我在這次的田野過程中，明顯地觀察到身分與性別可能為我作為研究者本身，以及我未來的研究帶來的影響。身為一名女性研究者，出現在以男性從業者為多數的田野地中，似乎更容易接觸報導人，也更容易在請教問題的過程中被包容，但這種好處偶爾也會帶來不適感。例如在 B2B 展區，一位中年男性對我露出善意的微笑，慷慨地給予贈品，也大方地回答我好奇的問題，但我明確地察覺到，在他眼眸裡倒映出的是一道無害、無辜又無知的女性形象。當我前往 B2C 展區，另一名年輕男子滔滔不絕地訴說遊戲開發的歷程，以及他的從業心得，最後甚至用「我考考你」展現濃烈爹味，指教我的生涯規劃。

身為一名台灣籍的研究者，「應不應該主動揭露身分」是本所乙組學生必經的

¹² 訪談於 2024 年 8 月 1 日。

¹³ 來自 2024 年 5 月 25 日及同年 9 月 6 日的田野筆記。然而，若回顧近年來台灣獨立遊戲發行概況，具知名度的《還願》及《守夜人：長夜》兩款遊戲分別在 2019 與 2021 年承受中國市場的影響力，因為「辱華」、「具殖民主色彩」等理由於全球遊戲數位平台下架，蒙受商業利益損失。

田野倫理考題。我在這次田野中發現，有些遊戲從業者在聽到「台灣人」之後，會頓時露出疑惑及不解的表情；也有的人先是口頭答應訪談邀請，但在發現我是台灣人之後，又在微信上委婉地回絕。然而，台灣人身分有時候也會成為研究的優勢，讓某些遊戲開發者更願意討論中國遊戲市場環境、創作初衷及遊戲審查制度，甚至與我建立較強的信任連結。

綜上所述，透過這次的田野經驗，我將重新規劃未來的田野安排，例如計劃與台灣獨立遊戲開發者共同前往中國市場參展；此外，這次的訪談經驗是尋找下一步研究對象，以及修改訪談大綱的基礎，進一步最佳化我的研究設計，推進研究進程。



位於 N5 館的 ChinaJoy Express 展位，一共展出 47 款中外遊戲作品，大部分為獨立製作。

把國家遮起來？ 中國脫口秀的逃避與抵抗

田野地點 | 上海市、北京市*

撰稿 | 羅琪玟**

「問題的答案就在你遲遲不願意做的事情裡。自由也是，它就在你不願意掙脫的枷鎖裡。」

——張駿¹

「我覺得所有脫口秀演員都喜歡電動車，也很像電動車，自由、接地氣，也是唯一一個能在城市裡鳴笛的東西了。」

——邱瑞²

2023 年 5 月，中國著名脫口秀公司「笑果文化」³ 旗下脫口秀演員 House，因在線下演出中以「作風優良，能打勝仗」描繪自己看到兩隻狗追松鼠的畫面，⁴

* 田野日期 2023 年及 2024 年暑假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 1 脫口秀演員張駿從脫口秀節目《脫口秀與 Ta 的朋友們》淘汰後，在社群平台小紅書發表的文字。
<http://xhslink.com/a/WutQ71uBE2NW>
- 2 脫口秀演員邱瑞在《脫口秀大會》第五季的文本。邱瑞，2022 年 11 月 23 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 10 期（下）〉，《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WwGIRl_WOZ8?si=sdn-srTOFHXCfhT2&t=1210
- 3 公司全名為「上海笑果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 4 引發爭議的演出片段外流錄音檔，取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s://youtu.be/CWO5rsepI2U?si=sg9zhGeRWQ_Kuayn。實際上，脫口秀俱樂部一般會以「禁止錄音」為觀賞守則，因此有人錄音且音檔外流，在本次事件中便存在爭議。

被指稱影射、詆毀及貶損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與上海相關部門先是發布通告說明演出內容對社會影響惡劣，無限期暫停笑果文化所有演出活動；接著，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不僅沒收笑果文化「違法所得」132.53 萬人民幣，更處其1335.38 萬人民幣罰款；最後，每年夏季及秋季上檔、由笑果文化製播的線上脫口秀綜藝《脫口秀大會》也只能偃旗息鼓。

這並不是笑果文化及旗下演員首次捲入大規模風波。2020 年，笑果旗下演員卡姆、嘻歪 CY 及編劇李國慶，因涉嫌吸毒與容留他人吸毒先被處以行政拘留，後亦面對牢獄之災。雖然多名員工涉毒，但整體而言大致歸咎為員工個別行為，笑果文化並未受到太多波及。反倒是同年底線上節目《脫口秀大會》第三季中，演員楊笠多次從女性視角表達對生活觀察的段子，遭受嚴重網暴，更曾被以「多次辱罵全體男性宣揚仇恨，煽動群眾內部矛盾，製造性別對立」、「不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發展」為由遭受舉報，⁵ 代言工作也因此被撤。⁶ 但與此同時，不僅有研究指出這些表達有助於從男性主導的話語權撐出女性表達的空間，⁷ 有利於女性賦權；2022 年，位於紐約的中文女權開放麥「女子主意」也以脫口秀作為社群建立及維繫形式；⁸ 近年脫口秀的舞臺上也愈來愈多關注社會議題的表達，以及處境不利群體的現身。然而，要怎麼一邊表達對社會議題的看法，甚至作為賦權方式，又一邊確保自己不會踩到政治紅線？透過 COVID-19 疫情期間線上節目《脫口秀大會》第五季的文本、House「翻車」後在中國線下俱樂部的 3 次觀賞經驗，以及近期網路上廣受討論的線上與線下活動文本，都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可供觀察的資料。

缺位的國家、無力的人

2022 年 3 月，上海因 COVID-19 疫情封城兩個月。作為設立於上海的喜劇公司，笑果文化旗下的編劇和演員大多身處上海並深刻經歷封城。當年度的《脫口秀大會》一直到解封後才轉移至山東錄製，成為節目開播五季以來首次不在上海錄

5 令狐卿，2020 年 12 月 29 日，〈脫口秀演員楊笠被舉報，「被冒犯的感覺」可以是進步的起點〉。《狐度觀察》。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578163

6 青青子，2021 年 3 月 25 日，〈楊笠代言英特爾被下架：到底是誰在製造「男女對立」？〉。《新京報》。<https://news.sina.cn/gn/2021-03-25/detail-ikkntiam8041598.d.html>

7 Zhao Wen, 2021. *Engaging with female stand-up comedians in Rock & Roast 3: Genres, Gender and Women's humor*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Lund University.

8 女子主意的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nvzizhuyi/>

製。

有趣的是，儘管網路上對疫情相關言論實施嚴格審查，但在《脫口秀大會》第五季前兩期突圍賽中，「疫情」卻成為演員最頻繁談論的主題。57 組演員中，有 18 組談論到疫情相關經歷。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因線上節目走紅的脫口秀演員于祥宇，在前段時間發布的影片中表示，⁹ 自己在專場巡演中逐漸刪除疫情相關的段子，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些城市這些事情還是不能提。」甚至在提到「回老家的時候有疫情，大家都在戴口罩」，也被「建議」改為「東北的冬天很冷，大家都在感冒，所以需要戴口罩。」兩相對比之下，更顯得 2022 年在線上節目中能夠公開闡述疫情話題的珍貴。

風波之前、疫情以後——忠誠為主、潛隱的發聲為輔¹⁰

初步分析這 18 份演出文本，可以歸納比較出演員所觸及且安全的談論邊界。舉例來說，2 位演員提到了擔任樓長與志願者的經歷，另有 1 位演員表達了對體制的感謝：

我把我當樓長的那個經歷拍成了視頻、發在了網上，播放量也就 1000 多萬，然後那個被央視轉發了，然後小小的火了一把〔觀眾歡呼〕。¹¹

這個疫情剛有苗頭的時候，我爸媽還專門從山東去上海照顧我，被我稱為「最老逆行者」〔觀眾大笑〕。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菜，好在我們小區會給 60 歲以上的老人發菜，我就靠他們發的菜活著，又過上啃老的生活〔觀眾大

9 完整內容可見「脫口秀大雜燴」的存檔影片。<https://youtu.be/A1JM5Qk06nM?si=3v9ty2O4pHQ5gip5>

10 本文運用這個詞彙是受 Albert O. Hirschman 在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970) 一書中，離開 (exit)、發聲 (voice) 與忠誠 (loyalty) 的張力影響。然而，這些演員運用對體制「忠誠」的表達，是不是其實是運用更潛隱的文本 (hidden transcript) 反諷？此處可能不適合進一步詮釋，尤其說者與受眾的聽感都需要納入考量。此外，57 組演員中，另有 39 份文本雖經歷疫情封控但不談論疫情相關經驗，是不是可視為 exit？本文希望將其視為策略，無論是希望更好的在競技類綜藝中脫穎而出的策略，或 James C. Scott 在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 中提到的「不受統治」的策略。

11 拉宏，2022 年 9 月 6 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 1 期 (上)〉，《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9gNMJalGdF4?si=2zAa2oADMMVFhqGG&t=3004>

笑〕。12

談及體制時，演員往往只提及相對正向的經驗，更以對體制「表忠誠」的方式表達。相比之下，觸及政府層級的演員採用了更為隱晦的表述方式：

我決定搬去上海，全職做一個脫口秀演員，上海是全中國最先進的幾個城市之一，治理水平非常厲害，那還能出什麼岔子呢？〔觀眾大笑〕不會出任何問題的。時間快進到今年上半年〔觀眾大笑〕，我在上海居家隔離的時候，我爸媽給我打電話，我以為他們來關心我，他們說「還搞笑不？」〔觀眾大笑〕¹³

張駿這段文本，先以疫情前上海治理水平佳為引，再以「時間快進」巧妙抽換時空，以「不言明，但聽者自明」的方式，不僅成功引起觀眾共鳴並表達和官方所欲傳達正向形象不相符的內容，也避免了直接批評體制。除此之外，其他的負面經驗文本則不直接論及國家／政府／體制，例如：

我之前一個人在上海居家了兩個月，怎麼說呢，我現在特別熱愛社交。〔觀眾大笑〕因為一個人居家真的非常難熬，我之前完全不會做飯。
總之我平時都是點外賣，真到自己做的時候才知道和別人差距有多大。別人都會一些拿手菜，會說這個菜我特別拿手，我只能說這個菜我非常棘手。〔觀眾大笑〕除此之外，我還會一些燙手菜和切手菜。〔觀眾大笑〕¹⁴

這類文本不僅將疫情期間的負面經驗歸因於個人，也極力形塑這些「說故事的人」無力的形象，可說是對疫情現況的無奈，也是對未來的無力：

那海外的公司還請我，說預約3年後可以約了，到時候疫情肯定已經結束了。

12 程璐，2022年9月6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1期（上）〉，《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9gNMJalGdF4?si=zAfT0n3jjHfjDUg7&t=240>

13 張駿，2022年9月6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1期（上）〉，《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9gNMJalGdF4?si=WolGoIviiz8efXNQ&t=1572>

14 烏鳥，2022年9月17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2期（上）〉，《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q-fjZfrNZXI?si=8lm2lhZIRf4uZQE&t=3814>

快別那麼說〔觀眾大笑〕，呼蘭也跟我說過，大盤不可能跌破 3000 點的。

〔觀眾大笑〕一切皆有可能。〔觀眾大笑〕¹⁵

我最近最大的感悟呢，就是很多事情是我們個人不能把握的，好在復工了，現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聽天命、盡人事、幹好活、笑著走。」〔觀眾大笑〕¹⁶

嘗試總結《脫口秀大會》第五季突圍賽中演員對疫情相關內容的表述，大致具有以下特點：首先，主要策略是盡可能不觸及政府與體制，即便提及，也僅限於「小區」層級。當話題進一步涉及更高層的體制時，適時運用「潛隱文本」隱晦的表述尤為重要。其次，多數演員僅將疫情當做「背景」，並將封控期間的生活困境歸因於個體而非系統性問題。此外，這些個體都是相當無力的。總的來說，這些論及疫情的文本大多以個人生活經驗為中心，不涉及直接評斷或批判社會狀況，而「笑點」就更少設計在與國家／政府／體制相關的敘述中。然而，即使文本不論及國家或政府，國家及政府卻無處不在。

風波以後——多元發聲、不需要忠誠

2023 年 House 風波以後，中國脫口秀產業陷入大幅停滯，直到 2024 年初才又陸續浮出水面。比起多檔脫口秀綜藝回歸的消息，線下脫口秀俱樂部「硬核喜劇」一段關於「計畫生育」的演出錄影，更像是重新出發的號角，昭示社會議題類脫口秀重新回到中國的公眾視野。演員小蝶講述自己的母親遵循計畫生育指示進行輸卵管結紮 8 年後自己出生的故事：¹⁷



小蝶演出畫面。（截取自硬核喜劇微博）

本來超生還要罰錢，但我沒有罰錢。因為我媽太聰明了，他直接在我出生證明

15 李誕，2022 年 9 月 6 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 1 期（上）〉，《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9gNMJalGdF4?si=fzZo9HvBB-83K-J_&t=2398

16 程璐，2022 年 9 月 6 日，〈《脫口秀大會 S5 Rock & Roast》第 1 期（上）〉，《騰訊視頻 - 熱播綜藝》。<https://youtu.be/9gNMJalGdF4?si=GxZylhw4VtDnRqJ8&t=441>

17 完整文本可參見「中國數字時代」的存檔影片。https://youtu.be/neR7DS1_2lY?si=7jGbmXzjXRBVKITR

的性別的那一欄，他自己填了四個字「醫療事故」〔觀眾大笑〕，然後就沒有罰錢。我沒有罰錢，我就成了計畫生育的法外狂徒。〔觀眾大笑〕

這段表演迅速登上微博熱搜，詞條「#我成了計畫生育的法外狂徒#」引起廣泛討論。但幾個月後，相關影片已經從中國彈幕影片平台 Bilibili 上銷聲匿跡。

2024 年秋季，隨著由 10 多個脫口秀俱樂部聯合推出的兩檔線上脫口秀綜藝，《喜劇之王單口季》與《脫口秀和 Ta 的朋友們》的回歸，更多元的社會議題再次透過脫口秀形式進入公眾視野。除了《脫口秀大會》第三季以來日益擴大的女性視角外，¹⁸ 視覺障礙、雙向情感障礙、罕見疾病等身心障礙者的觀點，以及來自不同地域與流動身分的生命經驗表達，愈來愈常在節目中呈現。加上演員背景更多元，職業與年齡跨度更廣，都使得社會議題觸及範圍更加廣泛。

然而，國家的「缺位」依舊可見。剛從哲學系畢業的演員于祥宇，在文本中提到青年世代普遍面臨的求職與失業困境，恰恰揭示這點：

我學這麼多年從來都沒想到，一件事的存在它都不合法〔觀眾大笑〕，但他就合理啊。〔觀眾大笑〕

這些公司不要臉的地方就是裁員、撕 offer，只要給了點賠償金就合法，但你還是會本能地覺得不合理。大家想要的就是個確定感，你上學、上班，人生慢慢走向正軌。現在就是會有人突然把你正軌毀了，然後跟你說「那你現在自由了，你的人生不是軌道，是曠野〔觀眾大笑〕，那才是你牛馬該去的地方」。〔觀眾大笑〕¹⁹

這段文本中，看到了「法」，但沒能發揮作用；雖然隻字不提國家，反映的還是國家在這個議題上的缺位。這種「缺位」不僅是法律或制度未能有效解決問題，

18 如 2024 年 10 月，演員 Echo 在線上節目《脫口秀與 Ta 的朋友們》中談及二姐遭受家暴後「斷親」經歷後，微博熱搜上出現「難得」女性友好的詞條「#脫口秀女演員不斷拿起話筒#」，一段集結了多位女性脫口秀演員的影片，在短短數日內超過 400 萬點閱。<https://weibo.com/tv/show/1034:5083855691120666>

19 于祥宇，2024 年 9 月 26 日，〈于祥宇爆梗刷新郭麒麟認知 唐香玉吐槽年下男軟飯硬吃 | 喜劇之王單口季 EP5 下〉，《iQIYI 綜藝精選》。<https://youtu.be/HdgJfaZGqOI?si=2WZdDcq5xxqXOJT4&t=912>



2023 年 7 月上海脫口秀俱樂部演出前景象。

這些脫口秀文本似乎有意識地運用這種點到為止、躲避似地「遮」起國家，好像才能在笑聲中獲得掩護——似乎只有「把國家遮起來」，脫口秀才有機會把人的處境和社會議題帶回來，以文本抵抗。Lewis A. Coser 所提出的「社會安全閥」理論，²⁰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允許這些觀點得以承載了流量存在，也為脫口秀演員（如果可以更希望稱之為「抵抗者」）提供發聲的可能。

在 House 風波一個多月後的 2023 年 7 月初，以及 2024 年 8 月兩檔脫口秀線上節目播出前，我們實際到了上海與北京線下俱樂部觀賞演出。儘管「笑果工廠」因風波被停演，其他脫口秀俱樂部仍照常運營。

風波之後——線下能量仍大、避免變數出現

2023 年 7 月，我們選了一場週末冷門時段的演出購票觀賞。²¹ 正式開演前 10 分鐘，脫口秀俱樂部演出場地的現場情況火熱，據當日演出主持人透露，現場觀眾數達 500 人。由此看來，倘若此俱樂部平日每天 3 場、假日每天 4 場的演出皆座無虛席，那麼每週入場觀眾便能超過 1 萬人次。這是繼 House 風波後一個多月的

²⁰ Coser, Lewis A.,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孫立平譯，1991，《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桂冠文學。

²¹ 這場演出的特惠學生票為 1 張人民幣 39 元，普通票則是 1 張 69 元。之所以知道這場演出是冷門時段，是因為其他時段的門票大約在演出一週前就已經售罄。

線下演出情況，當時在中國娛樂票務平台「大麥網」中，上海仍有超過 10 家脫口秀俱樂部可以購票。根據《2022 脫口秀營銷白皮書》統計，截至 2022 年 5 月，中國共有 179 家脫口秀俱樂部；仍在疫情期間的 2021 年，全年脫口秀線下演出觀眾人數達 220 萬人。²²

作為觀眾，少數能感受到的變化之一是主持人隱晦提及 House 風波，並明確告知觀眾「不可以互動」。與 2024 年 8 月兩次觀演經驗相比，2023 年夏天的演出中，演員、主持人與觀眾間也少了許多互動。實際上，在 2021 年新華網的文章中就曾提及：「除了線上脫口秀節目需要審核外，線下演出的逐字稿也是需要經過審核。」²³ 然而，由於語言類活動審核週期較長，因此上海推出「劇本庫」的審核模式——「對已審核劇本進行電子存檔，後續申報的新劇本與『劇本庫』進行比對，實現存量演出內容經核對後免審、只審核增量演出內容的高效審核方法。」任何會帶來「變數」的互動，在 House 風波以後被言明禁止。但相隔一年，這個規定已放鬆許多，也表示「禁止互動」的規定並未持續太久。

不受統治下的變化？

從嘗試對線上節目做文本分析，到經歷風波後的線下演出，最大的落差來自於演員談論的議題。多數演員聚焦於個人生活體驗，「地域梗」（如山東考公梗等）最為常見，青年求職困境及伴侶的互動與催婚經驗如是。雖然地域笑話大多也伴隨著高學歷流動人口的處境，青年求職困境的自嘲也道出中國官方試圖掩蓋的青年失業率，生活中的性別互動段子也反映出中國社會女性的困境，但總覺得還是少了點「社會學的想像」，例如：「以理解較廣大的歷史場景對各種個體的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涯有何意義」、「個體可將本身的不安集中在明確的煩惱，公眾的冷漠將轉化為對公共議題的參與」。²⁴ 可能是受到風波影響，也可能是剛好沒有遇到這類型的表達，在我們所參加的三次線下脫口秀觀演中，沒有這類體驗。

22 騰訊線上視頻商業化部，2022，《2022 脫口秀行銷白皮書》。騰訊視頻。

23 王辰陽，2021 年 10 月 22 日，〈熱門打卡專案、演出一票難求，跨界公共事務、財政資金支援……國內脫口秀高地：魔都如何種出了「笑果」？〉，《新華每日電訊》。http://www.news.cn/mrdx/2021-10/22/c_1310261684.htm

24 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洪世民譯，2020，《社會學的想像：從「個人的煩惱」連結到「社會的公共議題」，歡迎來到社會學的世界！》。台北：商業周刊。

結語——以遮住國家作為抵抗的掩護

近年來，中國脫口秀蓬勃發展，但也經常因文本挑動政治或性別敏感紅線而屢受「陣痛」。張偉最新的文章更揭露，笑果文化經歷 2023 年 House 風波要正式開啟商演前，曾組成「政治正確」表演團隊至北京探路，「團隊還針對性地為北京各主管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舉辦了非公開的線下脫口秀表演。」²⁵ 從線上與線下的觀演經驗看來，「遮住國家」似乎是脫口秀演員討論社會議題的邊界。²⁶ 不過，隨著政權對脫口秀的監管力度變化，這些界線也處在浮動狀態。就連曾在「微博居委會」兼職的脫口秀演員孟川，都曾因在微博發文「希望我的軟肋能成為南傳孩子們那樣的硬骨頭」聲援白紙而被「禁言」。²⁷

或許與大規模直接指向資本主義或極權政府的抗爭行動相比，「只是說說而已」的脫口秀無法被歸類在任何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類型或「社會行動者的策略」之中，²⁸ 甚至大多數的情況下，脫口秀也不被視為「抵抗行動」本身。然而，當最積極參與的青年行動者也陷入以自我及社群療癒為主的「微觀行動」，逐漸轉向「去公共性」與「生活化」的困境時，²⁹ 這些仍持續在公開場合對社會議題「開玩笑」的人群和觀眾，也應該被看見。儘管這種抵抗可能顯得退縮或逃避，但在極權高壓統治下，多元聲音的表達與紀錄正在打破政權的單一敘事，每個微小的聲音都在奮力地抵抗著專制的吞食。

25 張偉，2024 年 8 月 30 日，〈中國脫口秀困境：當冒犯不被允許，如何在夾縫中游走？〉。《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830-mainland-stand-up-comedy-censorship-industry>

26 近期更爆出，脫口秀演員瘦子在線下演出調侃中國乒乓球國家隊員，而遭暫停演出。相關詞條「#脫口秀演員調侃王楚欽遭辭退#」也高掛微博熱搜榜。

27 名聲說娛樂，2023 年 3 月 15 日，〈脫口秀演員孟川遭禁言，大尺度言論引爭議，原定的線下演出被取消〉。<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416038111345020>

28 徐斯儉、張鈞智，2023，〈測量中國演化式治理當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檢驗現有文獻（2005-2015）〉。頁 71-108，收錄於徐斯儉、蔡欣怡、張鈞智主編，李宗義譯，《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新北：左岸文化。

29 2024 年 8 月 22 日，《中國青年行動者報告 2023：白紙、社群運營、女權、精神健康》。<https://matters.town/a/ccoirs9jf6r9>

身處以男性為主的商業世界 中國女性台商會長的獨特魅力

田野地點 | 廣東省*

撰稿 | 陳彙淳**

在 2024 年夏季，筆者前往中國廣東省進行論文的田野調查，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台商社群中的性別動態，以及女性領導者的角色和挑戰。調查期間，筆者有機會參與並觀察了一場由「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廣東片區」主辦的重要活動。這場活動不僅是經濟合作與兩岸交流的高層次對話，更是一個觀察台商社群內部性別動態的難得窗口。當天的活動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第六屆第二次全區會議，以及會後的「廣東助力粵東西北『融灣發展』」晚宴活動。

在這次田野調查中，筆者觀察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與會的台商協會會長大多是男性，女性會長僅占極少數。當天的 55 位與會者中，只有 3 位是女性。這樣的比例顯然與社會普遍認知的性別平等有著一定的差距。這引發了筆者的思考：「女性台商會長為什麼這麼少？她們如何在男性主導的環境中取得領導地位？她們的經驗和挑戰是什麼？」這些問題促使筆者在實地觀察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深度訪談和資料分析，以期揭示更多台商社群中女性的領導角色及其影響力的見解。

台商社群中的性別結構

名列海基會 2024 年「台商協會聯繫一覽表」的 155 名台商協會會長中，僅有 17 名為女性。在中國華南地區，廣東省是台資企業的重要集聚地，共有 22 個台商協會，這裡的交流活動十分頻繁，提供了豐富的觀察機會，可以深入了解台商之間的互動模式。廣東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長期吸引了大量台灣企業家前來投資設廠。然而，為什麼在眾多的台商協會中，女性會長卻這麼少呢？這是一個

* 田野日期 2024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 日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廣東片區第六屆第二次全區會議。

值得深究的問題。

首先，可以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探討這一現象。早期赴中國投資的台商大多是男性企業家，他們帶著雄心壯志和家族期待前往中國，女性在這個過程中通常是輔助性角色。根據 Rosabeth Moss Kanter（1977）的「相對比例」理論，在男性主導的組織中，女性屬於「極少數者」，她們的能見度和差異化往往使其面臨更多的挑戰。這不僅僅是因為性別本身，也是由於數量上的劣勢，無形中加大了她們的壓力和挑戰。

筆者：您認為為什麼女性會長會如此少呢？

B 會長：（思考片刻）人數怎麼會這麼少呢？我倒是沒想過。

G 台幹：我想應該是因為女性台商跟男性比，數量就差很多吧？自然會長都是男性。

女性會長的角色與挑戰

在廣東片區會議現場，與會的重要人物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台企聯的主桌中僅有一位女性——黃月美女士，她是台企聯婦女會的常務副理監事長，兼任廣東省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婦委會會長，並曾擔任過台商協會會長。筆者在此次觀察中，特別關注這位女性台商。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台企聯的多位領導者針對促進兩岸交流及吸引「首來族」年輕人提出了各種見解。黃會長不發一語，認真聆聽發言者的觀點。直到輪到她發言時，才沉著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並且介紹她主導的「飄洋過海來愛你」兩岸青年交流活動。該活動旨在邀請兩岸已婚的青年分享在婚姻、文化差異和子女教育方面的經驗，以增強未婚的台灣與中國青年的聯姻信心和對未來



台企聯領導、各地台協會長與領導。

的期盼。黃會長希望藉由這次活動促進兩岸青年相識、建立友誼、收穫愛情，共同書寫兩岸融合的青春篇章，並吸引更多年輕人到廣東交流。相較於男性台商的建議主要從資本角度吸引年輕人，黃會長的情感訴求與軟實力策略顯得格外突出，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廣東台商助力粵東西北「融灣發展」活動的晚宴上，各界商業領袖雲集。開場後，眾位領導致辭隨即展開簽約儀式。然而，簽約舞台上出現的代表全為男性，未見女性身影。筆者在會後的晚宴中，特意問候黃會長，並就她下午會議上的發言，與她進行了簡短交流。黃會長表示，在當前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的背景下，她認為廣東省婦委會能成為橋梁，為促進兩岸和平發展貢獻力量。她強調在任期內有許多工作需要完成，並堅持一步一腳印地實現目標。她採取開放的態度，鼓勵女性發展自身才能，並致力於修訂原有的組織規則，將入會對象從台商女企業家擴展至陸配，擴大了會員範圍，進一步提升婦委會的影響力，凝聚廣東省台商婦女的力量。筆者在與她的對話中，深刻體會到她卓越的領導和組織能力，這正是女性台商會長所具備的魅力。

筆者：您會覺得女性身為台商社群中的少數，而讓您遇到困難或障礙嗎？

黃會長：我想性別應該不是主要問題，而是做事能力。女性台商有自己個人的魅力與做事風格。

晚宴期間，筆者被安排與一位女性台幹相鄰就座。相互介紹後，才知道對方是○○協會婦女會的副主委，她在了解筆者研究主題後，分享了她的觀點。她指出，

當前中國台商的經營環境已有顯著進步，女性在這一領域的融入程度也有所提高。儘管如此，女性在某些方面仍然面臨挑戰，因此許多協會設有專門的婦女會分支，提供女性專屬的交流平台。她建議筆者多與婦女會成員交流，因為許多女性會長都是這些組織的成員，並且經常在平台上互相交流與分享資訊。

關於自身的個性與工作風格，C 會長謙虛地表示，她認為自己只是普通女性，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像常人一樣平凡地生活。A 會長則分享了一段早期經商的經歷，描述了一次令她印象深刻的交易過程。

A 會長：以前剛做生意的時候，對方以為我一個女生好欺負，不會算錢。當交易時，我發現與說好的價格不同，就堅持要他們調整到談好的價格，不然絕不買單。對方跟我僵持久了，怕貨銷不出去，最後才妥協。我平常可不會這樣，真的是對方太過分了！

根據筆者的研究，女性領導者在某些情境下可能表現出具有陽剛特質的領導風格，這種風格不經意地融入了企業界普遍存在的男性主導氣場。然而，女性領導者同時有獨特的個性特質，如剛柔並濟，這使她們能夠有效地進行商業經營。

成功的女性領導者

身為少數的女性台商領袖，能夠脫穎而出並擔任台協會長，無疑引人注目。她們的成功通常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而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

H 董：不要看 A 董現在風風光光的樣子，以前她可是吃了很多苦！一般人哪能過那種生活。

筆者：您之前曾想過要放棄嗎？

A 會長：有啊！甚至還跟老公吵著要回家呢！但為了事業，最後我還是堅持下來了，熬過來了！

晚宴後半，筆者跟著 G 台幹一同向 A 會長和 C 會長敬酒。筆者好奇女性會長的酒量及其社交能力。對於台商社群而言，飲酒文化是一種常態，儘管兩位會長並不愛好飲酒，仍表達了參與的誠意，同時也受到尊重。另外，台商社群中的 KTV 文化不完全符合她們的興趣，她們於是有很多的休息空間，偶爾也有男性台商前去交流，顯示出她們在社交活動中的靈活適應。



廣東台商助力粵東西北「融灣發展」活動簽約儀式。

次日，筆者跟隨 A 會長和 C 會長參訪後續行程，並且共進午餐。在此期間，兩位會長不時討論商業事務，例如即將參加的會議、協會的周年慶活動以及即將來訪的單位。筆者與兩位會長深入交談，對於她們在管理企業之際，還需負責台協會長的職務深感敬佩。她們對此展現出輕鬆的態度，強調身為會長必須盡力履行職責，並承擔相應的責任。一般認知中，女性能夠擔任企業商會領導職位，必然具備多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在與 A 會長進行先前的參訪行程時，她曾表示會長職位並非她的志向，主要是協會理事推薦她擔任，她才接受了這一責任。隨後，G 台幹在參訪過程中也分享了他的觀點：「A 董會當上會長的原因，我認為是因為在台協，她毫無疑問是最適合的人選。企業夠大、人脈廣、在地經營也非常久。」

女性台商會長在當地台商社群中通常擁有廣泛且深厚的人脈網絡，這使她們能夠有效地聯絡並組織各方資源，從而促進協會的運作與發展。此外，她們往往有豐富的企業經營經驗和一定的資本基礎，在商業運作和決策方面具有卓越能力，能夠為協會帶來更多支持。筆者詢問了 C 會長如何成為台協會長，她以「因緣際會」來形容。她笑言，在 C 區從事商業活動時，對於遇到困難的台商夥伴，她總是樂於伸出援手。或許正是這種熱心與能力獲得了台辦的認可，最終促使她被邀請擔任台協會長。女性台商會長展現了獨到的領導特質，包括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人際溝通能力；她們在協會內外建立了廣泛的人脈網絡，並展現了注重細節的管理風格和靈活應變的創新精神。女性台商會長能夠在多重任務之間找到平衡，營造出溫暖且凝聚的組織文化，這些優勢使她們在推動協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廣東助力粵東西北『融灣發展』」活動中，出席的當地領導包括國台辦經濟局副局長、廣東省台辦主任、雲浮市委書記、市長、市政協主席、省台辦副主任以及省台盟祕書長等。筆者觀察到，政府官員與台商之間的互動十分融洽，雙方在

談笑風生中表達了對於長期推動中台經貿合作和支持兩岸發展的感謝，並且強調中國近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筆者在晚宴桌上與一位中共當地領導交流，他對我的性別相關田野研究表示支持，並指出中國改革多年來兩性發展日益健全，歡迎我在中國進行更多研究和交流。

台協會長通常擁有優秀的政商關係，能夠有效建立與當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合作，推動兩岸交流及經濟發展。對於當前兩岸交流日益緊張的局勢，A 會長和 C 會長均表示，這是新上任的賴政府需要重視並處理的問題，她們身為台商會致力於履行本分，腳踏實地地工作和生活。每位成功的女性台商會長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和成功經歷，共通點則是擁有出色的商業能力、豐富的經驗、廣泛的人脈、堅持不懈的毅力和強烈的責任感。她們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個人努力、社會環境及時代機遇共同作用的結果。她們的故事和經驗對予筆者寶貴的啟示。

筆者在廣東省的田野調查中，研究了女性台商會長如何在以男性為主的商業環境中展現她們的獨特領導風格和卓越能力。儘管身處以男性為主的商業世界，這些女性會長卻發揮重要的影響力，推動協會的發展，並且促進兩岸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這些女性會長的成功證明了女性在商業領域中的潛力，顯示了如何透過智慧和堅持，克服性別比例不均的挑戰，建立自己的地位。她們在男性主導的台商社群中，不僅建立了穩固的人脈網絡，還與政商界保持良好的關係，彰顯出在商業世界中的獨特經驗和巨大潛力。

為什麼要讓我們知道這麼多？ 來自中國外送平台的真實數據

田野地點 | 上海市、北京市*

撰稿 | 羅琪玟**、小蝸**

從空氣裡趕出風／從風裡趕出刀子／從骨頭裡趕出火／從火裡趕出水／趕時間
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每天我都能
遇到／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

——王計兵〈趕時間的人〉¹

某日午後，北京天降暴雨，即使撐著傘仍無法阻止滂沱大雨將我們淋濕，當下緊握傘柄僅是為了守護一些體面。我們只要往前走一步，鞋襪中的雨水便立即被擠壓出來，發出滑稽的「噗滋」一聲。當我們終於狼狽地逃進地鐵站，以外送平台解決待會兒的晚餐，是我們迅速達成的共識。然而，「天氣不佳是否應該叫外送」成為當下的道德難題。一方面，考量外頭的傾盆大雨，以及不停滲水的鞋襪，比起在外「下館子」，使用外送平台「數位覓食」不只更加便利，也舒適許多；但另一方面，讓外送員代替我們在街頭櫛風沐雨，並且承擔雨天騎車送餐的風險，這樣真的好嗎？

美團外賣上的「打賞系統」成為我們消弭罪惡感的救贖。如同在台灣時的習慣，倘若訂購的生鮮雜貨多了，或是需要麻煩外送員步行的距離多了，便以給小費的方式感謝對方的辛勞。有些地方，小費文化被理解為「購買服務」、「肯定服務價值」的意涵，但在這次的情況中，從個人意義的層面來說，給予小費似乎更像是一種「贖罪券」。一股疑惑也因此油然而生：究竟要付出多少錢才足以購買這項服

* 田野日期 2024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2 日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¹ 收錄於王計兵，2023，《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



圖 1：台灣知名外送平台提供小費的頁面按鈕，左邊來自 Foodpanda，右邊則來自 Uber Eats。前者最高額小費限制為 100 元台幣，後者的小費預設額則以該筆訂單總額的百分比計算，平台使用者最高能夠提供該筆訂單總額 2 倍金額的小費。



圖 2：訂單完成頁面的打賞騎手圖示。



圖 3：美團外賣內的騎手主頁、榮譽主頁及打賞紀錄。

務？究竟要付出多少錢才能夠獲得救贖？

在使用台灣 Foodpanda 及 Uber Eats 兩大外送平台時，每當一筆外送訂單成立或完成，應用程式便會跳出明顯的「提供外送夥伴小費」或「評分並給小費」頁面按鈕，但中國常用的美團外賣訂餐平台不會主動提醒顧客「打賞」。在美團外賣的訂單完成頁面上，相較於置放於螢幕中央、寫著「再來一單」及「聯繫商家」的橘色圖示，「打賞騎手」四字以不起眼的灰色圖示出現在螢幕左側。在點擊「打賞騎手」圖示之後，訂單頁面便會跳轉進入「騎手主頁」，中間會顯示系統預設的打賞金額，顧客能依個人喜好挑選今日要「打賞」兩元的水、五元的雞腿，或是十元的漢堡；倘若覺得金額不夠高，還能客製化發送其他金額的紅包。然而，除了「打賞」功能之外，其餘在螢幕畫面中顯示的資料讓人不禁心頭一顫。

為什麼要讓我們知道這麼多？

面對相對陌生的外送平台，我們好奇地查看美團外賣的介面及功能，卻意外發現平台使用者竟然能夠隨意查看外送員的打賞紀錄與服務紀錄。在「騎手主頁」裡，除了可以點選打賞金額之外，還可以看到外送員的基本資訊，包括姓名、總里程、準時率、滿意度，以及平均配送時長。點擊外送員姓名旁的徽章及箭頭後，便會進入該名外送員的「榮譽主頁」，裡面揭露更多的外送員資訊，包括加入美團天數、累計完單數量，以及不同類型的「榮譽勳章」。² 若是點擊「騎手主頁」打賞處下方的一排小字「○○人打賞過」，則會進入「打賞紀錄」頁面，內有該名外送員獲得的所有打賞紀錄，包含打賞者的帳號名稱、頭像，以及打賞日期與金額。

回酒店的路程還很長，我們「偷感」³ 很重地在地鐵車廂內翻查這些資料，心中既興奮又忐忑，一方面驚詫於資料大大咧咧地展示的暴露感，另一方面暗自懷揣著窺視而生的侵犯感。在「發現」這些資料的當下，內心的不適部分來自於「監控資本主義」的具象化。Shoshana Zuboff 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一書中寫到：

2 外送員在符合一定條件之後，美團外賣系統便會在其榮譽主頁上自動點亮榮譽勳章。例如，外送員在獲得五千單的五星好評之後，榮譽主頁便會點亮名為「五星楷模」的榮譽勳章。在榮譽主頁中，最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名為「城市守護者」的榮譽勳章。當該勳章被點亮，下方簡介便會介紹：「感謝你在 2020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期間，堅持留守、感於擔當、傳遞正能量的城市擺渡人」。美團外賣系統顯示，目前點亮該勳章的外送員已有 12 萬名。

3 「偷感」是中國互聯網上的流行詞，指的是一種偷偷摸摸、暗地裡做某件事情，並且生怕引起別人關注的心理狀態。

「在馬克思的舊有想像中，資本主義就像一隻以勞工為食的吸血鬼。監控資本主義不僅展現了這種想像，還出現令人意象不到的轉折。監控資本主義吞噬的並非勞工，而是各式各樣的人的經驗。」⁴在美團外賣的使用經驗中，平台工作者與平台使用者的經驗不只單向地被吞噬，並且不知為何地被公開。

在這之前，我們一直試圖說服自己，可能只是剛好發現了外送平台的程式漏洞，例如工程師忘記鎖定功能，導致平台使用者能夠隨意查看外送員資料。然而，當我們嘗試在不同時間點、多次瀏覽美團外賣的頁面，竟發現外送員資訊會即時更新，而不僅是停留在平台使用者使用服務的當天。也就是說，只要這個設計及介面沒有更動，曾為我們提供過外送服務的外送員，他們的資料會連續且同步地在平台使用者端更新。我們始終想不通，為什麼美團外賣要讓平台使用者查看這麼多的外送員個人資料？

我們看見了什麼？

在得知這些資料的存在後，我們立即決定將資料整理下來。⁵具體而言，7月25日至8月11日間，我們分別在上海及北京訂過17次與8次外送，共計25次；不過其中有2次外送訂單是由麥當勞和肯德基的「商家自配」，因此未顯示外送員名稱，也無法查看「騎手主頁」。此外，我們也發現，外送員的配送經驗可能影響其資料公開程度。在23位能夠查看「騎手主頁」的外送員當中，有5位外送員的里程數低於5,000公里，並且無法查看其「榮譽主頁」，因此我們推斷可能資歷較淺者並無「榮譽主頁」。

如同前文所述，這些外送員資料會隨著時間前進而更新，我們以8月29日為資料登錄的截止時點，嘗試整理並呈現這些數據。這些資料一直到8月29日最後登錄時仍公開可見，卻在文章撰寫期間逐步流失。⁶

4 Shoshana Zuboff, 2020,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上卷）：基礎與演進》。時報文化。頁40。（原著出版年：2018）

5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點餐時無法指定外送員，因此接單的外送員有一定的隨機性，但如果加上我們居住的地區、點餐的時間及點餐的數量等，也可能造成接單外送員類型的偏差。因此，本文數據僅嘗試呈現有趣的資料，不具有推論的意涵。

6 大約在回到台灣一個月後，我們發現已經無法再次點開美團訂單中的外送員資料，原本我們以為是官方發現問題並決定不公開外送員資訊，但後來請身在中國的朋友協助確認之後，才發現朋友仍能從近期訂單中查看外送員資料，因此我們推估外送員資料可能僅會向平台使用者公開大約1至2個月的時間。具體而言，我們在9月14日時僅能檢視8月11日訂單的外送員資料，乃至在9月15

加入天數、完單數量與總里程

圖 4 分別呈現上海 17 位外送員及北京 8 位外送員的加入天數、累計完單數與外送總里程。在擁有「榮譽主頁」的 18 位外送員中，加入天數最短者為 120 天（約 4 個月）、最長者為 2,877 天（近 8 年），而上海外送員的加入天數平均較長。累積完單數最少者為 1,904 單、最多者為 88,601 單，上海及北京兩地外送員的累計完單數差異不大。此外，5 位資歷較淺、未有「榮譽主頁」的外送員都來自上海。外送總里程僅須進入「騎手主頁」即可瀏覽，總里程最低者為 1,593 公里、最高者為 183,866 公里；納入資歷較淺者後，北京外送員的外送總里程略高，上海則存在離群值。圖 5 呈現三筆資料兩兩數值散布圖，總的來看，三者呈現高度正相關，其中又以里程數與完單數最為相關（ $r = .9675$ ），由此可知，無論外送資歷深淺，平均而言每筆外送訂單所需配送距離大致相仿。

從兩天的連續紀錄中，部分外送員的外送數據並未更新、但天數仍持續增加大致可知，加入總天數僅代表外送員自加入日起計算至當下的天數，並非外送員真正上工的天數。若以累計完單數與加入總天數，計算平均每日完成單數來看，上海外送員平均每天 22.45 單、北京外送員則是 27.44 單。實際上，這些數字嚴重低估外送員勞動量，因為在 18 位具「榮譽主頁」的外送員中，有 5 位平均每日完成單數未及 10 單，同時也有 8 位平均每日完成單數超過 30 單，最多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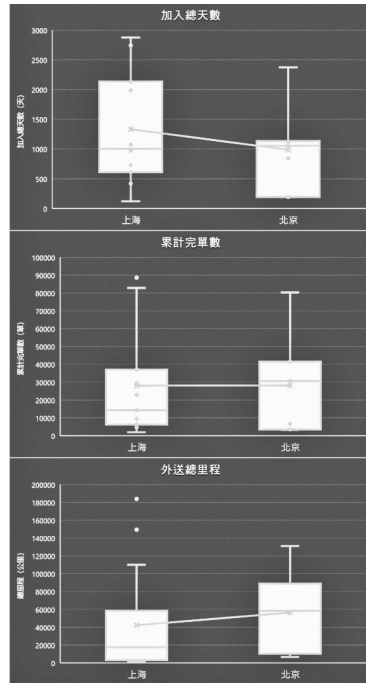


圖 4：加入天數、完單數量與總里程的盒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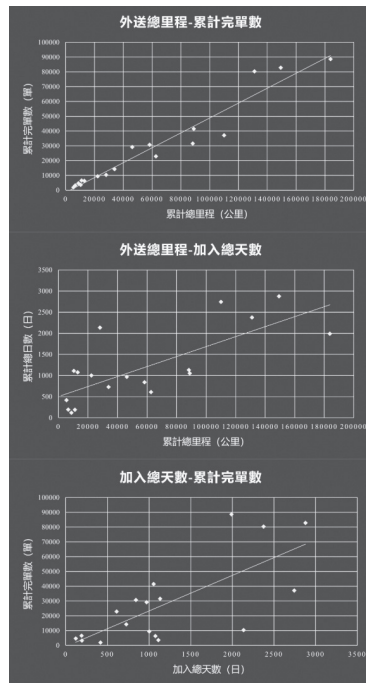


圖 5：加入天數、完單數量與總里程的散布圖。

日，所有訂單的外送員資料皆已消失。由此不僅突顯前段時間留存資料的可貴，更顯得這筆資料「被洩漏」的莫名。

至高達 44.55 單。

準時率、滿意度、配送時長

幾項與外送員服務相關的指標變異不太大。例如，準時率大多介於 95%-100%，低於 90% 者僅 1 人；滿意度亦如是，大多介於 96%-100%，僅 1 人低於 90%；但滿意度與準時率最低的並非來自同一人。平均配送時長上，介於 19 至 33 分鐘。

不過，此處的平均外送時長應該是以平台使用者為中心計算。以我們遇到的外送員中，完單數最高、加入美團外賣近八年的外送員來看，其平均每單配送時長 32 分鐘、平均每日完單數 44.55 單，如果平均外送時長是以平台工作者為中心計算，那麼他近八年來不僅全年無休，每日工作時數更高達 23.75 小時。也就是說，該外送員一天 24 小時裡只有 15 分鐘沒有上工，但這不太合理。雖然就此而言，無法從「洩漏」出來的資料一窺中國外送員真實的勞動處境，但這部分確實應該受到更系統性的關注。2024 年 9 月初，一名 55 歲的杭州外送員被發現猝死於電動車上，自稱曾與該名外送員互動的網友表示，該名外送員一天跑上百單、每天工作 16 小時以上。⁷ 有新聞指出，部分外送平台設有「接單 12 小時」的最高限制，但有外送員為了規避這項規定，以註冊多個平台帳號或借用他人身分證註冊帳號等方式提高接單量。⁸

打賞 vs 小費

想知道如何給小費而發現這些資料的我們，對於中國民眾給予小費的情況充滿好奇。我們觀察到，雖然中國外送平台在「騎手頁面」預設的小費金額偏低，實際上曾給予外送員小費的平台使用者僅占少數。在 18 位具有「榮譽主頁」而可知累計完單數的外送員中，總完單數為 504,747 單，但其中僅有 685 筆訂單得到小費，平均每 1,000 單中僅有 1.3 筆訂單給予小費；得到小費比例較高的外送員，平均要送 400 單才能得到 1 次小費（送 6,606 單得 17 次小費、送 80,294 單得 197 次小費）；即便加上 5 位資歷較淺的外送員，總共也僅有 704 筆小費紀錄。

⁷ 張旭，2024 年 9 月 10 日，〈杭州 55 歲外賣「單王」猝死，知情人：一天工作 16 個小時以上〉，介面新聞。<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9-10/doc-incnsiqn9211798.shtml>

⁸ 四環青年，2024 年 9 月 10 日，〈55 歲外賣「單王」猝死，每天接單 20 小時不是他的錯〉。<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1354.html>

由於外送平台明確記錄並揭露打賞時間，我們本來想就自己的經驗進一步考察外送員得到小費是否與天氣、雨量等因素有所關聯，但在嘗試取得北京與上海歷年天氣資料時，卻因為受到實名制相關限制而無法獲取所需資料。不過，我們仍嘗試整理這 704 筆小費紀錄。

我們從加入美團天數推算加入美團日期，發現最早加入美團的外送員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加入，但最早的小費紀錄始於 2017 年 11 月 20 日；為求時間完整性，我們以 2018 年第一季為起點，呈現至 2024 年獲得小費的紀錄。在圖 6-1 中，呈現 23 位外送員每季所獲打賞的總數，並且拆分成北京與上海。不過，從圖 6-1 可能較容易得到打賞人數持續增加，這個較不精確的解讀，因為雖然記錄到的打賞人數確實增加，但主要原因與外送員人數增加有關。

因此，同樣以加入美團天數推算加入美團日期來計算兩地每季外送員人數，並計算平均獲打賞數，呈現如圖 6-2。總的看來，北京外送員平均獲打賞的次數較上海高；上海外送員獲打賞次數略有上升趨勢，但北京外送員平均獲打賞次數卻非高點。⁹ 我們嘗試蒐集並整理北京與上海各季 GDP，¹⁰ 並計算兩者的相關性，北京外送員平均每季獲打賞次數與當季 GDP 的相關係數為 .3013，上海外送員的相關係數則為 .4611，兩者皆為中度正相關。換句話說，該地整體經濟狀況愈好，平均每位外送員獲打賞次數愈高。

中國外送平台上所使用的「打賞」一詞，相比於「小費」，從字面上即形塑出平台使用者與平台工作者間的權力位階，已令人感到不適。當我們給出小費之後，外送員竟然還特地回傳訊息表達感謝，再次加深了我們的惶恐。在天氣不佳時，外送員作為消費者字面意義上的衣食父母，冒著生命危險在街頭來回奔波，並得到「應有的」、甚是「不應僅有如此」的報酬。他們對小費所傳達的感謝，反倒讓原先的贖罪心理顯得更加不光彩。

9 圖 6-2 的時間僅更新至 2024 年第一季，是因為有 5 位資歷較淺的外送員資料並未呈現加入美團外賣時間，無法推估加入日期，以及 2024 年第三季亦尚未結束，本文因此呈現取資料完整的 2018 年第一季至 2024 年第一季。

10 北京 GDP 資料整理自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https://tjj.beijing.gov.cn/tjsj_31433/ydsj_31440/gdp_31750/2024/），公開資料區間自 2005 年第一季起至今相對完整；上海 GDP 資料整理自上海市統計局（<https://tjj.sh.gov.cn/ydsjbg/20190101/0014-1002932.html>），但公開資料區間僅從 2019 年第一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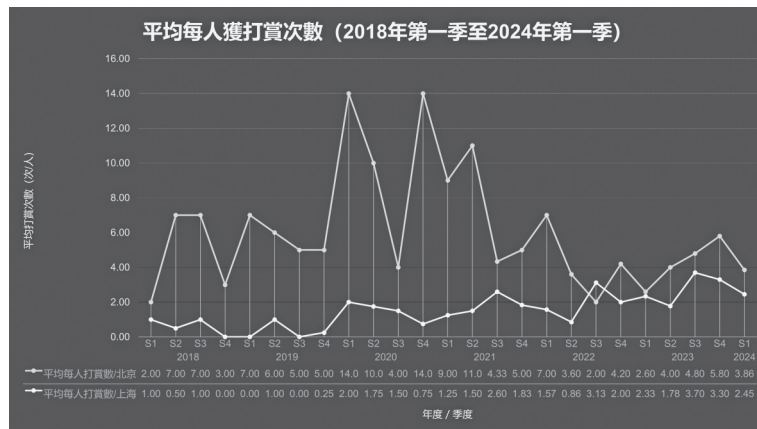


圖 6-1：外送員平均獲打賞次數（2018S1-2024S1，N =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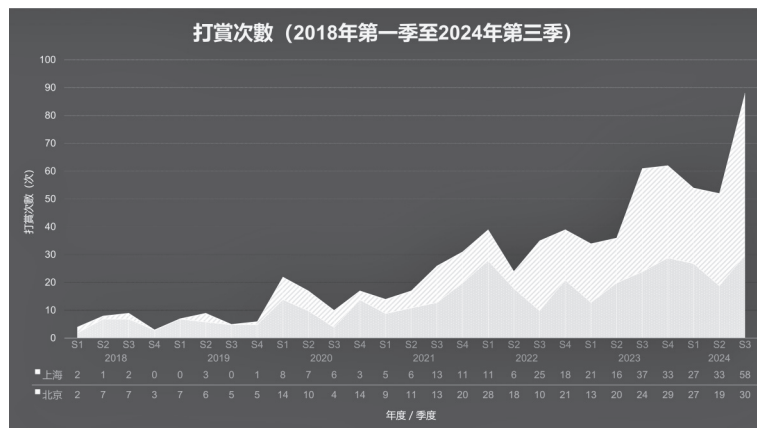


圖 6-2：外送員獲打賞次數加總（2018S1-2024S3，N = 23）。

結語——不只掙錢，還得掙快錢

近幾年，中國關於平台經濟的學術研究、文學及影視作品愈來愈多，除了書寫外送員、快遞員與網約車司機的勞動處境和經驗，偶爾也傳遞「正能量」。¹¹這似乎代表平台工作者正在被社會看見，無論是以何種形式。當我們看見了這群身穿黃衣或藍衣的平台工作者，我們在意的似乎不再只是「是否收到餐點」的最終結果，轉而關心「這些人正在經歷些什麼」。當美團外賣向顧客揭露每名騎手的資料時，我們忍不住想問「為什麼」。是為了讓平台使用者安心接受外送服務嗎？¹²或者是意圖讓平台使用者欣賞那些由數據控制得相當完美的楷模勞動者？由此衍生的問題

11 例如 2024 年暑期於中國院線上映，描繪外送員的電影《逆行人生》，便陷入「消費苦難」的爭議，以及「有錢人演窮人」、「緊跟正能量」的質疑。

12 中國社交媒體上常有外送平台使用者分享遭遇不良外送員騷擾的案例，我們推測因此導致美團外賣揭露外送員資訊。



準備將外送訂單送入上海老弄堂的外送員。

是，美團外賣提供給平台使用者的不僅是外送服務本身，還有其檯面下的精準勞動控制嗎？

孫萍指出：「所有來跑外賣的人，都有一個絕對至上的利益目標，就是一定是來掙錢的，而且還需要掙快錢。」¹³ 騎手每個訂單能賺 9 塊錢，跑得多便賺得多，看似「能者多勞」，但卻更像是蜜糖陷阱。例如，當騎手的出勤天數或每日單數不足，每個訂單的單價便從 9 塊錢降為 8 塊錢，¹⁴ 而騎手的配送時間也不斷地被平台的系統算法吞噬。¹⁵ 這些限制和苛刻成為一種篩選機制，騎手必須趕得上、跑得快，才能獲得繼續掙快錢的資格。外送平台透過按件計酬制度及智能系統算法，不斷為騎手「打雞血」，一方面鼓勵騎手內卷，另一方面強化了騎手的「虛擬自由意識」，¹⁶ 使其自主擁抱系統算法。

當電影銀幕上的片尾字幕冉冉上升，當從騎手手中接過外送餐點，當街頭上的騎手身影從旁呼嘯而過，縈繞我們心頭的一直都是：這些「趕時間的人」最終真的能像電影劇情一樣，「逆行人生」嗎？

13 申璐，2024 年 9 月 6 日，〈研究外賣騎手七年：一位社會學者的虧欠與自我重建 | 專訪孫萍〉。《新京報書評週刊》<https://mp.weixin.qq.com/s/mvylmeL6HkxVnooUcNCDwQ>

14 桑妍，2024 年 9 月 2 日，〈零工經濟下外賣小哥生存狀況調查〉。《農民日報》https://mp.weixin.qq.com/s/bBkDn_yljG4ve3S9m2hf0Q

15 賴祐萱，2020 年 9 月 8 日，〈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人物》<https://zhuanlan.zhihu.com/p/225120404>

16 關於計件工如何產生虛擬自由意識的相關討論，可見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農民工女性的二次流動 在台中國婚姻移民的跨國數位創業

講者 | 貝愛琪*

記錄 | 小蝸**

來自義大利的貝愛琪（Beatrice Zani）長年在法國求學，在中國短居期間與中國室友的相識引發對中國農民工的研究興趣，並下定決心要攻讀社會學博士。然而，一場美麗的誤會促使貝愛琪來到台灣尋找「打工妹」受訪者，意外開啟她在台中國婚姻移民的田野研究。貝愛琪在演講中以台灣與中國兩地的豐富田野經驗，¹ 分享中國農民工女性的二次流動：一是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二是從中國到台灣的婚姻流動。此外，貝愛琪從「數位移民連結性」（digital migrant connectivity）的角度，描繪中國婚姻移民如何利用微信（WeChat）創造出跨國數位經濟，連接她們在台灣與中國兩地流動過程中的時間、空間和情感。

數位移民連結性

為了概念化數位移民連結性，貝愛琪分別對媒體研究及移民研究中的學術文獻進行爬梳。在前人的研究中，早已概念化了兩者交織的連結性意涵，例如法國學者 Dana Diminescu 在 2008 年首度提出的「連結性移民」（connected migrant），意指能夠藉由使用網路、社交媒體、社群平台等工具，在經濟、情感、資訊或政治參與等面向，進行跨國連結的移民。貝愛琪結合「移民創業」（migrant entrepreneurship）的相關研究發現，最終形成數位移民連結性概念。另一方面，儘管在中國電商（如阿里巴巴、淘寶等）的快速發展背景之下，有許多關於「網紅」、「代購」及「微商」等諸多學術研究，但這些文獻的研究範圍往往僅限於中

*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1 演講於 2024 年 5 月 28 日進行。



講者貝愛琪和主持人沈秀華。

國本地，忽略了海外中國人也同樣使用類似的手法從事經濟活動。相較之下，貝愛琪的研究跨越了地理上的單一性，探討中國婚姻移民女性如何利用「數位創業」（digital entrepreneurship）來對抗在移入社會中遭受勞動市場的經濟歧視與邊緣化。

貝愛琪結合前人經驗，藉由在台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的移民生活、社會網絡與創業經歷進行案例研究，探討了數位連結性，性別、移民和不平等的數位經驗，以及數位移民創業，三者在跨國主義和全球化的日常實踐，並且提出兩個研究問題：第一，數位化的生活如何成為中國婚姻移民女性對抗社會孤立、不平等及經濟脆弱性的工具？第二，性別化的社會網絡及數位連結如何形塑跨越台灣與中國兩地的移民創業精神？

打工妹的流動——從農村到城市再從中國到台灣

出生於四川的福靜（音譯）在 2001 年離開老家到城市打工，成為全中國千萬名之一的打工妹，²並在 2008 年因為結婚而移居台灣。全球（尤其是亞洲）一直以來都有「移民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趨勢，但其背後成為何？貝愛琪指出，當年輕的福靜必須在外地工廠的流水線埋頭工作，她的經歷不僅體現了流動過程及之後的苦難與艱辛，還反映了她的想像和抱負，以及對現代化、

²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2023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中國約有 2.9 億名農民工，其中有 1.7 億名「外出農民工」，且在「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 30.5%，約 5,385 萬名。

消費主義，甚至是從農村移動到城市後渴望實現向上流動的殷切期盼。在中國有許多如福靜一般的年輕女性，在十幾歲左右便離開農村，她們起初對於城市都有「高大上」的想像，最後卻被迫每日於工廠及宿舍兩點一線來回奔波。她們一方面將微薄的工資寄回老家，一方面因為工作勞累無暇享受所謂的城市生活；她們沒有城市戶口，也沒有社會保險，她們的不滿無處宣洩。移居台灣一開始似乎是她們實現現代化、城市化、消費主義及全球化的第二次機會，福靜也帶著這樣的期望從中國移居到台灣。

然而，在台灣的日子並不如想像中美好。福靜的初中學歷及四川口音讓她在求職過程中屢屢受挫，只能安於傳統的家庭主婦角色，這意味著她必須全天照顧丈夫、公婆與孩子，並且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福靜於閒暇時外出散心，卻遭到街坊鄰居冷眼相待，並被貼上「大陸妹」的標籤，只能日日與挫敗感和抑鬱情緒相伴，甚至對於來到台灣的這個決定感到後悔。不過，中國人最普遍使用的通訊軟體——微信，之後成為了扭轉福靜在台生活的契機。

微信有一項功能，使用者只需點選應用程式中「附近的人」，便能輕易搜尋到裝置附近的其他使用者，包括微信暱稱、頭像、個性簽名及裝置距離都一覽無遺。換句話說，中國婚姻移民只要輕觸手機螢幕，便能連絡到住處附近具有相似生活背景的姊妹。微信聊天室逐漸成為中國婚姻移民在混沌生活中尋求慰藉的重要天地，³從抱怨老公及婆家開始，一路聊到哪裡能吃到地道的家鄉菜，乃至於最佳的離婚方法。她們從平凡的線上日常問候開始、逐漸變得親近，後來轉移到公園、咖啡廳等線下空間見面，一起吃飯也一起購物。

貝愛琪認為，微信為這些中國婚姻移民打造了線上的避風港，她們在這個數位性別空間中，得以分享生活經驗、相互扶持，並且躲避家庭生活及勞動市場中所遭遇的壓迫、不公平與邊緣化。由於微信除了通訊功能之外，也具備支付功能，部分中國婚姻移民便靈機一動，開始做起生意。貝愛琪在演講中，透過投影片展示數張女性貼身衣物的照片，一件件看似普通的胸罩，實際上正是福靜從過去打工過的廣東內衣廠進口到台灣，再透過微信販售給姊妹們的獨家商品，某些商品甚至能從台灣再賣回中國。

3 推出微信的騰訊公司並沒有明確公布「附近的人」功能的顯示範圍。一般來說，這個功能會根據地理位置、使用者設置而調整，普遍能偵測到距離兩公里內的使用者。然而，國際版本的微信應用程式並不包含這項功能。

微信創業作為抵抗的藝術

來自河南的艾華（音譯）15歲就前往深圳打工，同樣嚮往城市中的現代化生活。她告訴貝愛琪：「當我離開家時，我有三個願望。我想買一個包包，買一部智慧型手機，並且成為一名時尚的女人。」但她很快從現實生活中意識到，身為一名女性農民工，這一切都難以實現。艾華後來與工廠中的台幹相戀、結婚，並移居台北生活。正如同前述福靜的境遇，艾華來到台灣後同樣被「困」在家中，每日在家照顧公婆與孩子，以及打理家務。艾華的中國公民身分同樣帶來了求職困擾，無論是公司行號、路邊店家或夜市攤販都毫無機會。正當艾華對台灣的生活感到心灰意冷之時，一則來自朋友的微信訊息引領她找到新的生活動力。

某天，一名住在深圳的朋友請艾華從台灣代購奶粉，她答應後立刻從郵局寄了過去，朋友也心滿意足地收到了包裹。艾華能夠幫忙代購奶粉的消息傳開之後，吸引了大量「買家」。為了應付大量的代購請求，艾華開始前往不同商家四處比價，試圖尋找售價更低的奶粉，以賺取更大的價差。然而，當她再次前往郵局寄件時，才意識到奶粉是受進出口數量限制的商品，一次最多只能寄兩箱，倘若想要寄出大量的奶粉到中國，只能另尋他法。艾華接著與基隆港某些航運公司的老闆洽談合作，由她支付額外的費用，請航運公司攜帶數量超過規定限額的奶粉進入中國。這些奶粉會與其他商品放在一起，或者說藏在裡面，並寄送到指定地點；當客戶順利收到包裹後，艾華便能在微信上收到一筆五百元人民幣的紅包。隨著生意不斷成長，艾華除了將台灣商品出口到中國，也開始從中國進口一些商品（尤其是食物）到台灣，並販售給微信群組中的姊妹。

無論是推廣生意、接收訂單或收發款項，艾華全都透過微信一手打理，因此能夠一邊操持家務，一邊拓展微信生意。艾華的代購所得都藉由微信收款，這意味著代購費用會匯入她的中國銀行帳戶，台灣的行政機關無法得知這些商業活動，自然無從課稅。台灣與中國之間長期以來有非常嚴格的跨境流動限制，除了中國人民必須與台灣人具備婚姻事實才能移居台灣之外，奶粉、中藥材、各類食品的進出口，同樣受限於嚴格的規範。無論是個人或商品的流動，都遭到政府監控與限制，甚至禁止，因此格外容易引起爭議，或是被賦予特定的社會價值。貝愛琪強調，這些商品的流通是由尋求自主及經濟獨立的女性推動，她們藉由微信所發展的商業行為，正是對抗台灣就業市場中經濟不平等的一種方式。

因限制而生的跨國數位創業

在台灣的中国婚姻移民充分運用了社會資源及社會網絡，才得以形成往返兩岸的商品流通。她們將自己在兩岸所經歷的勞動經驗和流動經驗，以及對兩岸市場的物流知識、對市場結構的了解，轉化為商業上的優勢。除了前者對商業的成功至關重要之外，貝愛琪也強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跨國數位經濟，正是這些移民女性透過數位平台（即微信），作為新的商業基建（commercial infrastructures）而產生的。奶粉、雞腳、藥品及酒類等被以數位化的形式在市場中交易，其數位化的特性促使買賣雙方的身分、資金轉移的過程，在政府的商業管制中幾乎不可見。

綜上所述，貝愛琪透過研究移民不平等（migration inequality）及數位連結性之間的關聯，試圖描繪中國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的跨國數位創業現象。這些商業活動源於她們的日常生活，依靠她們在二次流動過程中所獲得的勞動經驗和社會網絡的支持來實現。跨國數位創業一方面來自於對抗不公平的移民政策、階層化制度、經濟不平等、商業管制及邊境控制，另一方面則促使僵化的移民制度被重新定義。儘管這些制度框架限制了個人與商品的流動，卻推動了新的商業模式，在全球化的邊緣藉由社會網絡與數位化路徑不斷地被創造、執行和發展。



貝愛琪與師生合影。



第 37 期 2024 年 12 月 31 日發行
2003 年 10 月創刊

發行人 | 沈秀華
主編 | 吳介民
副主編 | 陶逸駿
編輯委員 | 方怡潔、古明君、汪宏倫、林宗弘、歐子綺、陳至潔、陳志柔
陳明棋、張貴閔、黃兆年、黃克先、鄭志鵬、戴瑜慧
助理編輯 | 潘雅鈺
排版印刷 |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Publisher | SHEN Hsiu-Hua
Editor | WU Jieh-min
Associate Editor | TAO Yi-chun
Editorial Committee | CHANG Kuei-min, CHEN Chih-Jou Jay, CHEN Ming-Chi,
CHEN Titus C., CHENG Chih-Peng, FANG I-Chieh,
HUANG Jaw-Nian, HUANG Ke-Hsien, KU Ming-Chun,
LIN Thung-Hong, OU Tzu-chi, TAI Yu-hui, WANG Horng-luen
Assistant Editors | PAN Ya-yu

國立清華大學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tel: (03)516-5982
email: cfcc@my.nthu.edu.tw
website: <https://cfcc.site.nthu.edu.tw/>

歡迎來信或上本中心網站訂閱電子報。
本刊登載之全部內容為版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之轉載或複製。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No. 37, December 31
Founded: October, 2003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2, Kuangfu Rd, Hsinchu 300, Taiwan
tel: +886-3-516-5982
email: cfcc@my.nthu.edu.tw
website: <https://cfcc.site.nthu.edu.tw/>

Online subscription availabl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ortion of the contents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